

目 录

- 塞外烽火照青山……………姚喆口述
袁德录整理 (1)
- 绥南抗日战争片断……………石生荣口述
纵横整理 (15)
- 一二〇师六支队在绥南抗战……刘华香 (25)
- 在绥西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王建功 (57)
- 坚持绥中抗日斗争片断……贾长明 (61)
- 坚持绥中、绥南抗日
斗争的回忆……………宋克缙 (72)
-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武川县一、二联区
的斗争……………范建国 口述
帅志凯 张永昌整理 (98)
- 蛮汗山区游击
根据地斗争……………胡三民口述
郭振锋整理 (128)

蛮汗山抗日根据地

回忆片断..... 张光仪 (139)

追忆刘洪雄烈士..... 刘璧 (149)

忆红召二喇嘛支援

八路军抗日..... 李招龙 (165)

大青山根据地的开辟及

斗争史略..... 袁德录 (169)

与布利亚特旗匪军战斗

情况的回忆..... 郝秀山 (198)

林西地区革命斗争

的片断回忆..... 郭金榜 (205)

郭北宸在狱中..... 李丕才 (216)

塞外烽火照青山

姚 詒

(一)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以蒙奸德王、李守信的伪军为帮凶，很快占领了归绥、包头。日寇在绥远地区驻扎一个旅团，伪军三个师，另有汉奸王英的一些人马。乌兰花、陶林都是伪军驻守，没有日本人。乡村的地主武装和教会武装，都挂上了日本旗号。

绥远人口不多，地区辽阔，民族关系复杂，反革命统治薄弱，社会秩序不好，吸食鸦片的多，参加会道门的多，土匪多。土匪盘据在绥中的有康德胜、苟子臣、肖顺义（外号干豌豆）等；绥南有夏军川、李维业等；绥西有白山阎王（白洪江）、龙振之等。有些国民党军队，实质上也是土匪，如王贵兴、李维业、夏军川等都有国民党军队的招牌。抗日自卫军（全称是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民团、乡警是半土匪性的武装，老百姓说自卫军是“降日灭蒙亡国军”。杀人最出名的是苟子臣，一边杀人一边喝酒，还得意洋洋地谈论“温酒斩华雄”，自比关公。土匪的发展前途，一是当伪军，一是投靠国民党。实际上土匪就是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后备军。

归绥、包头失守后，在我八路军到达绥远以前，大、小股

土匪为非作歹，横行无忌；每到一处，要粮草，杀牛羊，还要强令良家妇女陪着过夜。老百姓说他们“人吃饺子马喂料，没有姑娘不睡觉”。夏军川在绥南绑票要钱，不论穷富，在荞麦皮里也要榨出几两油来。有个老百姓被绑后拿不出钱来，夏军川割掉他的耳朵，逼着他自己吃进肚里去。

那时候我们地方党组织有个绥蒙工委，党员很少。乌兰夫、郑天翔、苏谦益、王天明等同志都离开了绥远，留在当地工作的仅有杨植霖、刘洪雄、李大光几个汉族同志和贾力更、勇夫、高凤英等几个蒙族同志。社会上进步力量很小，群众基础差。

(二)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奉中央军委指示开到了晋西北地区。在同日寇的顽强斗争中，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春，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的首次围攻，收复了保德、河曲、偏关、崞岚、五寨、神池、宁武七座县城。接着，又根据中央指示，除以一部分主力继续巩固与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外，决定宋时轮支队开赴平西与第一一五师邓华支队会合，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三五九旅开赴恒山山脉的广灵、浑源等地区，配合晋察冀边区建立的恒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以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师部骑兵营一个连及劲委会领导的独立游击第四支队（由太原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组成大青山支队，由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和我率领（当时我是三五八旅参谋长）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样，晋西北根据地的东面可与晋东南，晋察冀相呼应，北面以大青山根据地为屏障，使敌人占领的平绥、同蒲铁路和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重要城镇，完全处于我各根

据地的包围之中。

七一五团按照上级指示，先在五寨进行整训。是时，傅作义组织他的部队从河曲、保德地区进攻绥远日军，收复了清水河、和林。后来日军进行反击，一度占领了偏关，把傅作义的部队赶回五寨。为了支援傅作义的抗日行动，三五八旅在八角（在神池县西北）和偏关的老营打了两仗，收复了偏关；又在平鲁附近袭击了敌人的汽车。旅部住在五寨，七一五团前进到靠近杀虎口的右玉地区活动，进行挺进大青山的准备工作。七月间，杨植霖、高凤英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派刘洪雄和我们取联系，要求我们早些开上大青山。恰在这时，关向应政委来了，对我们和四支队的同志讲了建立大青山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并决定迅速北进。大青山支队于七月二十九日出发，正迁敌人“扫荡”右玉南山。我们过了朔县到达平鲁的公路边。八月初，在右玉南受敌阻击，打了一仗，然后，向西北插，绕过敌人，在偏关附近休整了几天后，继续北进。经杀虎口，跨过长城，进入绥远省凉城县。八月下旬，我军一度攻入天成村（在凉城县东部）敌据点，消灭守敌。次日天黑出发，向凉城西北方向前进，经沙乎子、板城村到达蛮汗山脚下的太平寨（凉城县境内）。我警备六团曾在凉城地区马头山一带活动。绥远天气冷，为作过冬准备，李井泉留下我等待晋西北送来的皮衣（一千四百多件），他带两个营北进。我带第一营在大榆树、韭菜沟（今卓资县境内）转了五、六天。这时夏军川正在卓资山以南抢劫。群众见八路军纪律好，很受鼓舞，积极拥护我军抗日。归绥的敌人知道我们来了，立即出兵“扫荡”。我们在崞县窑子（在凉城县西部）附近和敌人打了半天，撤到马鞍山下才摆脱了敌人，返回平鲁境内住了几天，皮衣运上来了，有一百多头毛驴驮着。七一五团政治部主任彭德大也跟着上来了。我

们北进到凉城县厂汉营地区。我和警备六团孙超群、张达志研究，想打几个仗，决定他们去打红沙坝车站（在丰镇县境内），我带第三营把皮衣送到铁路以北。那些皮衣又长又重，都分给大家背上，从太平寨出发，打算经三道营（今卓资县境内）附近过铁路。敌人先搞掉我们的皮衣，埋伏在韭菜沟截我们。敌人在右边沟里，我们在左边沟里，相隔两、三里路，不知沟口的敌情，我们不便冒然前进。天黑以后，韭菜沟的伪军派人来与我们接头，给我们带路。走到沟口碰到一个日本人、两个汉奸，是作侦察工作的。我们派一个排把他们抓住了。当晚越过铁路，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五、六十里，碰上了我团侦察排，李文清也来了，把皮衣交给了他们。我们与李井泉同志会合后，九月三日先打陶林，歼敌一部；十日打乌兰花（今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俘获四子王府的一部分骑兵，二喇嘛来谈判，把人马枪全退给他们了。群众情绪很高，很快建立了动委会。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打击敌人，李井泉带二营、三营到绥西开辟局面，二营活动在井尔沟（在武川县南部山区）一带。三营活动在五当召（今包头市石拐区境内）一带。邹凤山带第三连去蛮汗山区（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凉城县西北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四支队和特务连留在绥中，由朱辉照负责。支队部住在乌兰不浪（在武川县境内），骑兵连活动在百灵庙（今达茂旗政府所在地）附近，邓家泰带侦察排在高台梁（在乌拉特前旗东北部）一带进行侦察。

我留在绥中，在大滩（在今察右中旗西南部山区）附近住了很久，这一带乡村秩序很乱，到处有枪声，老百姓要求我们去打上匪。我们为了争取土匪抗日，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群众一度对我们很冷淡。那些土匪本性难改，经再三争取，他们不但不抗日，仍然继续祸害老百姓，而且还拦路抢劫我们从归绥买回的洋布。

十一月，敌人来“扫荡”，我军没有回旋地区。土匪活动的地区敌人不太注意，我们乘夜开了进去，住在孔脑包、土城子（该两村均在今察右中旗境内）。村里边被土匪作害的就象清水洗菩萨一样光光的，没粮没草，我们的部队吃了一顿炒黄豆。敌人三路会合在大滩，没寻见八路军，伪蒙古军和伪军互相打起来了。日本人怀疑伪蒙古军反正了，把他们调回去进行审查，结束了这一次“扫荡”。

我们到大滩南面的塔尔坝住了一、两天，又返回大滩。我和朱辉照、李文清研究打不打土匪，不好下决心。又转移到哈拉盖图，四支队、特务连、侦察排都来了，才下决心打土匪。一边打，一边向李井泉和晋西北报告。土匪康德胜在土城子有千把人。我们也有千把人。我们把主力布置在塔布斯拉口盆地南面的小山上，四支队打迂回，信号是点起一个火堆。指挥所设在公胡同庙里。晚十一点打响，土匪很狡猾，马不下鞍，人不脱衣，枪一响就逃跑，落在后边的被我军包围在树林里。有个女土匪喊话说：“不要打了，我给你们当老婆。”这一次解救了被土匪抢劫的民间妇女有一百多人，俘虏男土匪三、四十个，缴获了一些马匹。把他们弄到公胡同庙里，很多老百姓来看热闹。我对老乡们说：

“这些女人，你们谁认识谁领回去。”这时接到李井泉指示，不让打土匪。我们把人、枪发还给他们，不准他们再刁人，把民间妇女也都放走了。从此，康德胜就向兴和以南逃走了。老乡们很高兴，几天时间给我们送来二千多石粮食，还有衣服和鞋袜。群众工作得到了一些开展。

有一些如苏玉龙、郭田基都是反复无常的土匪。我们上去，他们起义；敌人“扫荡”，他们就又举起太阳旗。对伪军，我们采取了打的政策。苏玉龙有一百多条枪，郭田基有二十条枪。郭是

地主，外号叫郭老财，在当地当阎长，我们利用召开阎长会议的机会把郭老财捆起来教训了一顿。然后我带第一营去解决苏玉龙。借我们的科长陈金龙常与苏玉龙接头的关系，我带两个警卫员去了他的大队部。第二天下午他把部队集中起来，对他的人说：“姚参谋长单枪赴会，胆子真大。”晚上开联欢会，我们一营也来了，他的人坐在前头，我们的人坐在后面，我讲完话下令缴了他们的枪。把他的人清洗了一半，只留下五、六十人，从我们六连抽出一个排当骨干，改编为第二大队。此后，形势有所好转，我们可以召开有五、六百人参加的阎长以上干部会议了。粮食、衣服困难也有缓和。这段时间我们把地方武装编了四个大队，建立了大青山工委。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一五团主力奉命开赴冀中地区，留下了三营营部、四个连队和四支队，共五百余人。由李井泉和我负责，组成大青山骑兵支队，继续坚持斗争。支队决定邹凤山带一个连到绥南，朱辉照带一个连和四支队留在绥中，彭德大带三营营部并两个连在绥西。这三支小部队于一九三九年扩建为第一、二、三营，一九四一年扩建为骑兵第一、二、三团。七一五团主力东调以后我们有四项任务：一、组织游击队，扩大抗日队伍；二、整编地主武装，改造地主部队；三、发动群众筹款；四、整顿部队纪律，纠正不良作风。

一九三九年春节，我们住在大滩。日军指挥下的伪军——东亚同盟军白山阎王、肖顺义、夏军川等人的部队一千多人，从固阳哗变向东跑来，窜到陶林以南地区骚扰百姓。群众坚决要求我们消灭这帮土匪，我们答应了。除夕晚上，夏军川的老婆请肖顺义吃饭。我们乘机冲进去，俘获五、六十个土匪，缴获一百多匹马。抓住了夏军川的老婆和一部分女土匪。把女人都放了，夏军

川的老婆给夏军川带回去一封信。后来夏军川写来回信，表示也要抗日，不再到根据地抢劫了。然而他到蛮汗山区仍然抢劫，邹凤山又打了他一下子，把他的马匹全部俘获了。他带着剩下的人到河西（伊盟地区），投奔了国民党的部队——何柱国部。

一九三九年三月，白如冰同志从伊盟来到大青山，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将原绥蒙工委、大青山工委合并为绥远省委，直接归中央领导，白如冰担任省委书记，省委成员有武新宇、李井泉、杨植霖等同志。四月，李井泉同志回了延安。建立省委之后，我们在归绥，在伪军李守信部队及伪蒙古保安队内部都发展了一些地下党员，建立了一些内部关系。

这时候，国民党骑兵第六师，何柱国的骑兵司令郭栖鹏以及抗日自卫军，共五、六千人都开到绥中来了，引起了日寇的注意。于是，敌人调集归绥、旗下营、武川、陶林的兵力五、六千人“扫荡”银官山、五塔布地区（今察右中旗境内），一个中队一路，平行推进。骑六师在大滩以南被敌咬住，损失一个团的兵力。我们避开敌人向陶林以东转移，在银官山（察右中旗西北部与四子王旗交界处）碰到了骑六师，该师王师长被敌人打怕了，他缠住我不放，要我指挥他们。我说：“不行，你们是正规军。”王师长说：“姚参谋长不能让我的队伍被日本人搞掉，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队伍带出去。”我无可奈何，让他们跟在我们后边，隐蔽地向东转移，郭栖鹏也悄悄跟在后边。然后，他们向东，我带着队伍向北去了草地。几支队伍都摆脱了敌人。这次反“扫荡”之后，敌人在陶林、武川之间增设了几处据点。我们打了几次，没有打下来，环境较前更艰苦了。

一九三九年底，傅作义从河套反攻包头。我们配合他反攻，破坏了归包段铁路。

一九三九年夏季雨水很多，部队行动困难，情绪也受到影
响。新扩编的部队在反“扫荡”时逃跑的不少。我派四大队到陶
林以东活动，一方面避开敌人“扫荡”，一方面开辟新区。四大
队有个任锦堂，会说蒙古语，他自称顾问，暗地与日本人通气，
和大队长张忠全密谋叛变。指导员和副大队长反对，与他们斗
争，在陶林以东的黑土坡把他们解决了，打死张忠全等十几个人。
二大队也有十几个人搞叛变，打死我们的大队长，带着十几
个人投敌了。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清洗了一些不纯分子，扩兵注
意了阶级成份和出身等，使部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敌人在“扫荡”绥中的同时，也“扫荡”了绥南。没有打着
我们的部队，却把抗日自卫军第六路军给打跑了。国民党军队在
绥南站不住脚，留下少数人建立专员公署，专员赵励师提出“绥
远人治绥远”的反动口号，建立游击队跟我们捣乱，杀过我们一个
排长，煽动我们游击队叛变，我们派人把他的游击队消灭了。

由于我们对政权建设认识不足，这期间省委决定取消大青
山区的动委会，使群众工作和部队供应遇到很大困难。那时我身
体不好，肺结核很严重，躺在炕上整天考虑怎样解决困难。考虑
的结果是确定抽出一些部队作地方工作，负责筹集棉衣、皮衣和
鞋袜。给各区布置任务，捐款买布，剪羊毛、絮棉衣，解决了一
九三九年冬季的冬装和粮食。李井泉同志从延安回来，带了几千
元法币，听说困难解决了，很高兴。他带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动
委会取消不得，要重新搞起来，还要建立专员公署、县政府，搞
统一战线，要斗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要精减部队，减轻群众负担，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群
众中生根。省委根据毛主席指示，重新布置了大青山根据地的工作
任务。恢复了动委会，筹备政权建设，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寻

找机会，打击敌人。战士们有个口头语，“不游不击，没有马骑”，武器装备要靠战斗解决。这段时间灰腾梁（今察右中旗南、集宁西北部山区）、白塔（今呼和浩特市城东）附近的工作都有进展。罗忠群在丰镇以东搞起一支游击队，开辟了新区。

（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晋绥事变，进攻八路军和新军决死队，晋西北形势紧张。中央调白如冰、武新宇回晋西北，留下了王廷弼。警备六团也调离了绥南地区，大青山支队的任务更艰巨了。晋西北事变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部分，大青山也不例外。抗日自卫军的一个连，我们部队的一个班，同到一个乡政府催粮，自卫军要活埋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跑回来报告，又去了一个连，把自卫军那个连给解决了。自卫军十二团前来交涉，要求把他们的人放回去。我们说，放也可以，条件是保证我们人员安全。正在交涉的时候，接到李井泉同志来电报指示不让放回，要我们赶紧准备反顽斗争。我与刘庸如等动委会的领导同志研究了反顽斗争的部署，决定重点打击顽军的主力 and 机关。他们有自卫军十二团、十四团、十五团，还有第二路、第三路。十二团是主力。他们的机关有绥西总部、绥南专署和绥中的陶林县政府。我们绥西有四个连，负责打自卫军总部；四支队负责打绥中的自卫军十二团团部；动委会负责打陶林县政府；其余连队负责打自卫军十二团的五个连队；在绥南我军负责消灭绥南专署。做好具体部署以后，我和刘庸如在指挥部下棋，等候消息。次日天明，各部的反顽战斗报告纷纷传来，绥西消灭了自卫军总部和第二路、第三路，搞掉了他几百人，缴获几部电台和自卫军总部与日

寇的来往信件，陶林县政府和绥南专署的人大都逃跑了，没有消灭。

一九四〇年三月，绥中的顽军在陶林地区集中起一千多人，要和我们决战，紧紧追赶我们。我带着四个连和他们兜了两个圈子，趁天黑从侧面揍他，一直打到天亮，消灭他两个连，其余向河套跑去。我们牺牲了一个连长。绥西的顽军也集中了一千多人进行反扑。我军虽只有三、四百人，但老基干多，战斗力强，彭德大、陈刚同志带伤和顽军打了一天，也把敌人赶到了河套。彭德大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四)

我们进行反顽斗争，日寇观战，看到自卫军失败了，他们又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开始“扫荡”。以前敌人“扫荡”没进过绥西大沟（在今土左旗西北部万家沟西面），这次却进了绥西大沟，把老百姓的房子烧光了。在绥中也烧了许多民房。敌人“扫荡”刚过，我带一个连到了绥西，看到大沟、磨石沟的民房成了一片焦土，日本鬼子真残忍毒辣。我安排了一下绥西的工作，经和贾力更商量，动员了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送往延安。五月底，我返回大青山时，敌人正搞“三光”政策，想把我们赶跑。

六月初，张达志同志来大青山担任政治部主任。他带来了贺老总、关政委的一封信。贺、关指示我们坚持大青山区的对敌斗争，注意隐蔽，作长期打算的准备，不要多打仗，要发挥政权的作用，建立绥察行署，叫我当主任，杨植霖当副主任。七月中旬，我和张达志到了绥西，地方干部埋怨军队没打仗，我们没作慎重考虑，就答应了地方干部的要求。察素齐（今土默特左旗）

的敌人来“扫荡”大沟，我们设下埋伏，打死了几十个敌人。我们一打，敌人就来报复，搞得我们更困难了。

八月，我们回到武川的西梁，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搭起了布棚作会场。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国民党抗日民主人士、工人、农民、抗日军人和蒙、汉、回各族代表六百余人。通过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制定了“绥察施政纲领”，批准成立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署，建立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集、丰凉等九个县政府。敌人得知我们开代表会议，又来“扫荡”、烧房子，增设了许多据点，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和封锁。在绥中增设的据点有拐角铺、三道沟（两地均在今察右中旗境内）、黑虎滩、三元井（在四子王旗境内）；在绥南增设的有崞县窑子（在凉城县境内）、大榆树和牛家川（均在卓资县境内）的几个村庄；在绥西增设的有乌兰不浪（在武川县境内）等。还在一些山沟口上垒了石灰墙。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军积极地进行对敌斗争，在绥中袭击了拐角铺，消灭敌伪军几十人，我们牺牲了一个指导员，名叫郑维伯。利用内线关系，袭击过陶林以北的三道沟，俘获伪军二百多人。陶林日军乘汽车增援，我军安全转移。四支队在西河子（在今四子王旗东南部）附近二、三道沟被敌人袭击过一次，三连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绥南我军袭击了大榆树，消灭七、八十个敌人，我军一个指导员负伤，把手锯掉了。绥西我军在磨石沟堵住敌人打了一天，敌人施放毒气弹才得以突围逃走。我军还在耳庆窑子消灭了李海龙伪军一部分。支队司令部在小公胡同遭受过敌人一次袭击，当时我的马正放在山坡上吃草，突然来了敌人，我只得背上马鞍子上山，备马突围。这个事被大青山的人传为笑话，说“姚司令背着马鞍子上山。”

(五)

冬天，大青山很冷，骑着马走一、二百公尺，就冻得手指甲发紫。饮马的时候脚下洒点水，很快就把鞋底冻在地上，抬不起脚来。行军碰上“白毛风”，会把鼻子、脸冻坏。机要处一个外号叫“雷震子”的小鬼，把鼻子给冻坏了。

敌人“扫荡”，气候恶劣，环境虽然困苦，但我们的队伍还是在逐渐扩大。到一九四一年六月，我军在绥南的骑兵第一营扩建为骑兵第一团；绥中的骑兵第二营扩建为骑兵第二团；绥西的骑兵第三营扩建为骑兵第三团；四支队扩编为骑兵独立营。

敌人为巩固与扩大其占领区，在绥远地区大搞“施政跃进”运动，活动愈加猖狂。在归绥、包头、集宁、陶林、乌兰花、百灵庙等处增加了兵力；在大青山十八条沟的口上都筑起矮墙，或者挖了封锁沟，禁止行人出入。对我军搞反复“扫荡”，分进合击，一处枪响，四处支援。大青山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一九四二年夏，支队部住在绥西，电台坏了，上下失去联络。在绥西的军政人员有七、八百人，冬装没着落，粮食和马草也很困难，最困难的是德胜沟（在武川县南部山区），没吃的，人们每天坐在沟门上，看对面山上有没有毛驴驮子来送粮。

刚刚把冬装备齐，敌人又开始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决定骑兵主力向北转移，支队部向绥中转移，由一个骑兵连掩护；地委、专署分散活动。我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寄放在德胜沟一个老乡家里，领着教导队，分散向东转移，走到毫赖召，二喇嘛掩护我们，在后山放了哨。二、三百名敌骑兵经东乌素图进了沟。这里离归绥城二十多里，坝口子是敌据点，离我们五、六里。我

带上李容玉小游击队绕过坝口子到红山口。刚过坝口子，就听到纷乱的马蹄声，我们迅速隐蔽起来。待敌人骑兵过后，又继续向东走，没在红山口停留，而是经哈拉沁到哈拉更（今呼和浩特市东北面）。在哈拉更附近，被一小股敌人打了一下子。哈拉更的老乡告诉我们，绥中的机关、部队就在附近地区。我们在一个山洞里隐蔽了一天，次日与主力会合，一起到前后白旗、东沟、红召沟（在今卓资县西北部山区）转了两、三天，派人找绥中地方干部，一个也找不到。原因是敌人据点多，活动频繁，老乡们家贫如洗，情绪低落，地方干部无法出来活动。过了几天，我带十几个人又返回绥西。第一天到魏家窑子，因敌人打埋伏，第二天又跑到红山口（今呼和浩特市北郊），老乡给搞了一顿稀粥喝，然后跑到武新窑子，老乡把我们隐蔽在一个石洞里。为了忘掉饥渴，大家唱了一上午小调，后来老乡给送来些粮食才作了一顿饭吃。到井尔沟以后，老乡们见我带的人少，说：“老班长，你回来了？”从此我落下个“老班长”的名声。似乎大“扫荡”时，我们的队伍只剩下一个班了。其实，队伍并不少，但不能集中活动。在井尔沟，碰见三团政治部主任。刚住下，敌人就过来了。我们隐蔽起来，敌人从离我们二、三百米的地方过去了，去袭击德胜沟。三团仓促应战，没打好。第二天我们到关沟子，敌人又来了。我们远距离跑到西梁，住在大塔（在今土左旗北部山区）的窑洞里。日本人一路一路的上来了，爬到西梁搜寻我们，他们采用穿梭式的战术：今天上去，明天下来。在群众掩护下，敌人没找到我们。绥西德胜沟住下伪军一个营，配合日本人在大沟里“扫荡”了一个多月，但我军并未受到重大损失。

那个时候环境艰苦，生活困难，机关、部队情绪很高，没有逃亡的。一九四二年的春节是在石虎子洞山上渡过的，办了个小

合作社，买些东西互相拜年道贺。

我们和晋西北的联系断了两个月。我派黄厚和姚殿训带一个连到晋西北联系，晋西北派姜文华带一部电台到大青山，这才重新沟通了与上下级间的通讯联络。

一九四二年八月初，晋绥分局指示大青山党政军机关以及绥中地委、县委等机关和部队向绥南转移，保存革命力量。八月中旬，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骑兵第二团掩护下撤到绥南地区，以后又转移到偏关地区。晋绥分局根据当时的形势，于十月二十四日决定，将大青山根据地领导机关与雁北军分区（五分区）合并为塞北工委和塞北军分区，统一领导塞北地区的对敌斗争。一九四三年冬，我们派骑兵第二团团团长黄厚同志率三个连进至蛮汗山区活动，待机开回绥中地区。

一九四四年以后，随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全国抗战形势好转，大青山区的对敌斗争形势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就不细说了。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最困难时期，蒙汉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卓资县红召二喇嘛掩护伤员出过很大力。陶林阿毛胡洞蒙族老乡包全胜，每当日本人一出动，他就先送来情报，还让他儿子巴图送给我们几十排子弹。铁疙旦沟（今察右中旗西南山区）有个老乡叫张三毛，为我军保存电台，被敌人抓到乌兰花，受了不少刑法。他托人买了一台破烂油印机埋在家里，领上敌人去挖出来。说：“人家给我的就是这个东西，老百姓也不懂得是不是电台。”哄过敌人，保护了真电台。那时候地方干部大都是隐蔽地作群众工作，在东河子（今卓资县西北部），有个干部被敌人抓去，老百姓出二百多块钱把我们的干部保释回来。人民群众掩护党政军人员的事例很多，对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贡献很大。

（袁德录整理）

绥南抗日游击战争片断

石生荣 口述 纵横 整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之后，大举进兵攻占华北各地。正当中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全市共产党员及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最前线。”随后，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在陕北神府苏区的红军独立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祥、政委张达志），将要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杀敌。这时我正在中共神府特委党校学习，听了党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要到敌后去的动员之后，心里充满了阶级仇和民族恨，毅然要求随军东征。

在冰封大地、风雪交加的一九三七年底，我们跟随一二〇师警备六团渡过黄河，向晋西北挺进。当时警备六团千余人，只有二、三百枝步枪、两挺轻机枪。我们随军的地方工作干部、大多没有枪、每人斜背着一个布书包，腰里插着两颗手榴弹。尽管缺少武器装备，但是我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沿途人民热烈欢迎八路军。步行六、七天，到达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雁北地委所在地偏关，稍事休息，继续北进，于一九三八年初到达右玉县境。党分配我担任右玉西山一区区委书记。从此，我和长城内外

的蒙汉人民一道，向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展开了生死搏斗。

一

右玉与和林、清水河之间，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地，古长城自东北向西南蜿蜒穿过这片丘陵，成为山西和绥远的分界线。当地人民习惯的称长城为“边墙”。进出“边墙”，只有从杀虎口、白兰口、大沙口等关口方能通过。所以又有口里、口外之称。右玉西山，地处长城口里，站在“边墙”上可以听到两省（山西，绥远）、四县（右玉、平鲁、和林、清水河）村庄上的鸡叫狗咬。长城内外，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山川秀丽。

日寇于一九三八年初攻占右玉前，长城内外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东北军和地方杂牌部队，一齐拥挤在“边墙”内外，有的投敌当了伪军，有的打着抗日旗号抢劫勒索人民财物，鱼肉乡里，破坏抗战。如绥远国民自卫军第六路军，察绥游击支队等，有的公开当土匪。出名的土匪头子有夏军川、“干豌豆”、“红公鸡”（土匪头子的绰号），大股千余人，小股十几人，也有三、五成群手持棍棒拦路抢劫的，被称为“棒浪”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各阶层人民迫切要求抗日救国，要求剿灭土匪。

当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进驻右玉境内不久，当地开明人士侯维成（宝三）等，即主动派赵英、冯学才到右玉南山与警备六团联系，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随后他们从县城里拉出了二百多枝步枪，组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武装。赵英、冯学才、赵凯、贾建业、贾守中、朱明、党可均、杨敏珍、王安义等地方知识青年，也随之参加了抗日队伍。这对动员群众、团结抗

日起到了良好作用。

我们执行党的“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的抗日救国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抗击敌伪，保卫人民利益。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右玉西山很快就组织起三十多人的游击队，但都是赤手空拳，没有武器，只有我腰里插着两颗手榴弹，可是没有拉线，不能爆炸。我到右玉南山向县委汇报了游击队有人无枪的困难情况，县委给了我们一枝湖北造步枪、并指示我们自己想办法武装自己。同时宣布将右玉西山游击队编入雁北挺进支队第三大队，由我任大队长。回来后，我立即动员大家收集武器，武装自己。先后找到了一枝没有枪托的晋造冲锋枪和一枝没有子弹的俄国造老毛瑟。然后去杀虎口找王铜匠打了十几枝“独角牛”（也叫单打一）；又从群众中找到了几枝乌枪。经过东拼西凑，还有不少队员没有枪。我找铁匠照着手枪的形状锻打了一个铁片假手枪，用布包上插在腰里。当时有人用顺口溜来形容我们的武器装备：“一个冲锋枪没底子，一个老毛瑟没子子，三个手榴弹没线，队长背着个铁片。”尽管武器差，但是绝大多数人的抗日救国热情很高，特别是有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撑腰，使大家增强了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信心。我们游击队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时刻以人民利益为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村，除了向群众宣传抗日、还主动帮助群众干活，离村之前给房东担水扫院。因此，群众称呼我们是“咱们的游击队”。

有一天，我们住在刘家窑村，山上的哨兵报告，远处沟里有几个穿黄军装背枪的人正往这边走来。我马上集合队员，到沟里路边埋伏起来。等他们来到跟前、出其不意将他们包围缴械，缴获一挺轻机枪和五枝捷克式步枪。这些俘虏自称他们原是东北军，在左云投降日寇当了伪军，觉得认贼作父没有出路，因而携械逃出。经

过说服动员，他们又交出腰藏的一枝德造二号驳壳枪。释放前每人发给五十元大洋，并开了路条。队员们得到这批武器，如获至宝，精神振奋。县委书记王恩惠同志闻讯，也于当晚赶到刘家窑来看望。

翌晨，哨兵发现一批国民党骑兵向刘家窑包围过来，我们立即布置迎战。那些骑兵赶忙喊话说他们是察绥游击队，不是敌人，不要打枪。大队长郑维清进了村要求和我谈话，他说昨天被我们缴械的伪军是他们做工作争取过来的，伪军带的枪枝应该交还给他们。我当即指出，那些伪军根本没有透露这个情况，显然是你们编造的。双方争执到下午四点钟，郑维清提议他们撤回陈家窑，明天到新旺庄继续谈判。他们撤走后，王恩惠同志指示我连夜把部队带到右玉南山，靠近警备六团和雁北支队，由他去新旺庄谈判。我们经过一昼夜行军，来到右玉南山的小庄洼。过一天，王恩惠同志也赶来了，并说他在谈判中拒绝了郑维清的无理要求，估计郑维清还会再纠缠。果然郑和他的参谋长带着三个卫兵，骑马追到了小庄洼。根据王书记指示，我们作了战斗布置。正当王书记和郑维清及其参谋长谈判时，我突然闯进屋里，用枪口对准郑的参谋长，收了她的短枪，王书记也同时下了郑的短枪，然后把他两捆起来。郑的三个卫兵也被我们的队员缴械扣押。由于逃脱了一个卫兵回去报讯，郑部又派人到警备六团向张达志政委告状。张政委当即严厉指出：你们察绥支队不抗日，专门破坏抗战，以前收缴了我骑兵蔡支队派出征收草料的五个战士的步枪，现在又来逼要我们缴获伪军的枪支，如果你们不赶快归还枪枝，撤回河西防地，我们就要采取断然措施。察绥支队在张政委面前碰了钉子，为了赎回他们的大队长郑维清，只得乖乖地又送还了五枝步枪。接着我们把郑维清连同其枪马放走，随后察绥

支队全部撤往黄河西岸的伊克明盟。经过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我们游击队的实力大为加强，已有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枝。加上以后缴获零星土匪的枪枝，我们已有了步枪三十余枝。便将原有的十几枝独角牛组成了便衣班，专门侦察敌伪活动情况。

一天，我带着警卫员到杀虎口去了解便衣班的活动情况，进了杀虎口街里，迎面碰见两个穿着打扮十分怪异的人。当我从他身旁经过时，只听其中一个人对其伙伴说：“前边就是石生荣”。我立即回转身来，掏出短枪喝令“站住！”，把该二人押到老乡家里审问，便衣班的同志闻讯赶来，把这两人捆住。经过搜查，每人身上都藏着步枪上的撞针和螺丝。为了弄清他们的底细，我和警卫员押着他们返回驻地。途中要涉渡一条水深齐腰的小河，刚涉及河心，不料一人转身向我猛扑过来，用力将我按进水中，我极力争脱，举枪击毙了他。另一个家伙看到同伴被打死，才如实交待他们是土匪，两枝步枪埋在山坡，每天夜晚出来刁抢。

经过一年来反顽剿匪、锄奸斗争，这一带局面稳定下来。我们三大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三八年底，已经拥有机枪两挺，步枪六十多枝。根据上级命令改编为一二〇师六支队二营五连，成了正规军。县委指示我仍留地方任区委书记，继续打游击。这时上级为了加强这里的武装力量，从警备六团派来营级干部张志远同志任区游击队长，我任指导员，随同张志远同志来的还有四名战士，这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加强。

日寇占领右玉县城之后，残酷地屠杀中国人民，右玉各个城门都有日军站岗，中国人出进城门，必须向日军门岗脱帽行礼，不论男女老少都要脱光衣服检查，特别是妇女被迫脱光衣服之

后，不准穿衣，听任他们玩弄污辱。有个老汉送女儿进城，父女两人都被脱光衣服检查，女儿正值月经期，日寇伸手抓了一把月经拍到老汉的头上，然后哈哈大笑。这位老汉气得含恨而死。杀虎口有个老乡从独木桥上过河，刚走到河中心，站岗的日军举枪就把老乡打死。日寇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打。一九三八年底，日伪军步骑兵千余人，配合飞机，袭击我南山县委驻地，我县级人员及当地群众牺牲百余人。鬼子的残暴罪行，激起了我军和广大群众的愤恨，决心和这批野兽血战到底。

二

一九三九年底，上级调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一年底，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姚喆同志到延安汇报工作，向党中央提出原来在晋绥抗日的干部，仍回晋绥边区工作的要求。当我同姚喆同志回到平鲁时，右玉西山与平鲁北山已合并为右平县，康庄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任县游击队指导员。我离开右玉西山近两年来，这里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原来日军只在县城内驻扎，现在日伪据点增加到二十多个，各地普遍设立了乡、保、甲政权，成年人都有一张贴着像片的良民证，否则就当八路军、游击队抓起来。在这两省、四县东西四百里，南北百余里的范围内，经常驻扎有日军五、六百人，伪军五千多人。这么多敌军所需粮食给养，全靠向当地征收摊派。日伪军还经常出动扫荡，群众的牲畜、粮食、财物往往被他们洗劫一空。日寇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买不到布匹、针线、火柴等日用品。妇女没裤子穿，人们吃野菜、草籽度日，群众生活极端困苦。我们必须首先积极想法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通过骑兵支队从河北省和组织群众到偏关

购运土布，又设法从敌伪据点里买回针线，初步解决了穿衣问题。我们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一九四二年秋，日寇对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大青山支队及绥察行署等领导机关撤回偏关后方。这年底，为适应新形势下斗争的需要，塞北区党委（这时绥远区工委已改为塞北区党委）决定设立绥南工委。张云峰同志任工委书记、委员有肖黎（活动在和林马厂）、侯作贵（活动在凉城马头山）、安正福（活动在和林白花窑子）、石生荣（活动在托和清边界）。根据上级指示、我们斗争的策略是：团结群众、争取伪军、孤立打击日寇。工委各委员身边只有一两个警卫、通讯人员，携带短枪，白天潜伏、夜晚活动。群众同我们的关系真是鱼水情深，亲如一家。

和林新店子据点，住着两个伪乡长，一个是新店子伪乡长许存，另一个是黑沙图伪乡长徐凤鸣。许存靠开赌场发财成为地主，雇长工二十多人。当了伪乡长以后，让他女婿贺清当警察队长。他俩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徐凤鸣却不象许存那样顽劣。我们决定争取徐凤鸣，孤立打击许存。当徐凤鸣的儿子结婚时，我们工委委员联名送去贺礼，徐凤鸣对我们的态度更为好转。原来我们每到黑沙图乡活动时，各村必须及时向他报告，此后徐凤鸣即不要各村再报告。遇到日伪军扫荡，情况紧急时，我们就到据点附近、与放马的伪军闲聊天，等扫荡结束后再离开据点。清水河韭菜庄据点，与平鲁交界，驻扎伪军五十多人，严重阻碍边墙内外的联系，我们决心拔掉这个据点。经过调查了解，伪军里有一个姓张的青年，陕北米脂人，其兄参加红军，国民党军便把他和父亲抓去，后来父亲病死，母亲被连长霸

占，张便流落包头当了伪军。我们派人和他联系，指明出路，教育他待机反正。后来他串连了六个伪军，秘密商定了起义方案。每个星期日伪军们都到街上寻欢作乐，把枪械子弹锁进库房，留下一人站岗。在一个星期日，他们七个人都借故留在据点里，等其他伪军上街以后，便把岗哨捆绑起来，打开库房，挑选了七枝步枪、一挺机枪、一个掷弹筒，骑上七匹马冲出了据点，中途打死了伪军队长，安全到达游击区。

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斗争最艰苦的一年。我们这些分散潜伏在各地的地方干部，大都是日伏夜出，一夜间走遍几个村庄，到堡垒户（最可靠而又能掩护我干部的群众）家里，召集可靠的群众了解情况，布置任务。有时吃不上饭，许多天洗不上脸，到了伏天还穿着棉衣，身上的虱子滚成蛋。只有借到偏关塞北区党委汇报工作的机会，才脱下衣服抓虱子，烫衬衣，休息几天。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志们都能愉快地坚持斗争。

三

一九四四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日寇的军事力量日渐削弱，几个县城里的日军明显减少。为了虚张声势，他们把穿上军装的橡皮人放在卡车上驶来驶去。日寇又定出赏金指名捕捉我抗日领导干部，妄图扑灭抗日烈火。工委的领导同志都加倍警惕，活动更为隐蔽。这年春节的除夕之夜，我曾经连续转移了十一个村庄。尽管如此，仍不免与敌伪突然遭遇。塞北区党委为了加强绥南各地的通讯联络，决定在工委委员活动的地区设立秘密联络点，选择可靠的堡垒户作为通讯站，区党委定期派出武装人员到通讯站取送情报。一天夜晚，我和警卫员石建峰带着区党委

派来的两个武装同志（张恒义和另一个同志）到通讯站去，途中路过姜家坪村，望见云石堡伪军班长的院里有灯光，我当即决定到这家去吃顿饭，进了房就向伪军班长的家属说明，我们吃了饭就走，要求她快些做。待她把豆面条做熟，我们刚吃几口，突然听到院外有人骚动，接着枪声大作，子弹穿门而入，区党委的一个武装同志立即从炕上跳到屋门口，准备还击，不料中弹身亡。我马上吹灭油灯，把伪军班长的哥哥推向门外，跟着我们三人一齐冲了出去，趁机翻出墙外。我们刚冲出包围圈，就听见屋里大哭大喊：“你们不要打了，把你大兄哥打死了。”顿时一片寂静。事后我们才知道这出乎意料的情况，是我们进伪班长家之前他的妹夫带着十几个伪军正在这里，发现我们进村，便隐藏起来，趁我们吃饭功夫，来个突然袭击。

一九四五年春，正当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突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绥南工委书记张云峰同志壮烈牺牲了。几天前，他还主持工委会议，我们讨论分析了绥南抗日斗争形势，展望日寇必败、抗日必胜的前景，决定积极组织武装力量，攻夺敌伪据点，进一步打击和孤立日军，为大反攻作好准备。工委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即分赴各地，开展斗争。这天我正在印子沟召集党员和武工队员开会，突然听见南边枪声大作，派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张云峰书记、秘书黄健和警卫员，在半沟子村与云石堡的日军遭遇，黄秘书当场牺牲，张云峰同志受伤被俘。当天日军用牛车把他拉到羊坡村，进行审问。云峰同志自称是八路军的事务长，被派来催草料的。日军当即把他刺死。

我们赶到羊坡村埋葬了云峰同志。工委委员们齐集在他的墓前，沉痛地悼念这位长征干部，党的忠诚战士。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希特勒德国已经灭亡，日本帝国主义在

南洋，在中国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大反攻的时刻就要到来。在我军的打击下，敌人为收缩兵力，撤出许多据点。七月，和林新店子敌据点被迫撤退，我们立即进占。首先打开仓库、将库藏粮食万余斤分给周围的群众。同时捕获了伪乡长许存，发动群众对他进行了清算斗争。根据群众要求，将这个铁杆汉奸处死了。

八月，传来了右玉城里日军溃逃的消息，我们立即带领干部、群众急速奔向右玉县城。我和王志凤、王达仁等同志带领游击队、民兵和群众进城后，首先扣捕了伪县长和伪警察局长，收缴了伪军长短枪五十余枝、骑马五十多匹、立即把枪发给群众，扩大游击队，维持社会秩序。然后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枪决作恶多端的伪警察局长裴克功。

这时，上级任命我任右玉县委书记，王志凤任县长、王达仁任城关镇长。不几天，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绥蒙区党委（塞北区党委此时已改为绥蒙区党委）书记高克林，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内蒙古自治运动领导人乌兰夫、王铎等同志，由偏关北上，途经右玉县城，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当送走了继续北上的领导同志以后，我们立即投入了建设政权，组织生产的斗争。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忆一二〇师独立六支队雁北绥南抗战

刘 华 香

独立第六支队是一支在抗战初期诞生的地方人民武装。从它创建的那天起。就在一二〇师首长贺龙、关向应以及晋绥边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密切配合一二〇师三五八旅、警备六团、宋时轮支队和大青山支队，活跃在平绥铁路以南、雁门关以北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坚持八年抗战，消灭日伪军约万人以上，为保卫祖国大好河山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它的队伍中，涌现了女英雄李林、“王老虎”、“胡子连长”、“模范敌工工作者王宝”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和烈士。他们的名字和六支队的的光荣连结在一起，有如灿烂的群星，永远闪亮在当地人民的心头……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六支队的斗争却好象是不久前刚发生的一样，常常引起我内心深处的一阵阵激动。

现在，我就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将这支队伍的创建、发展及主要的事迹回忆、记录下来。

“流亡”到太原

在芦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我党中央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要求我们立即给进攻的日寇以坚决的抵抗，立即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这时我正在延安的抗大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它刚从保安迁到延安。我所在的第二期第二队，多数是从红军各个部队里抽调来的师、团级干部。大家都很年青，都很好学；但此刻却都坐不住了。要求提前结业、返回战斗部队的报告，象雪片似地飞到队部。不久，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并立即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最前线。我们抗大的学员经过认真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温习和讨论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并结合时局分析研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在掌握了思想武装以后，准备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八月的一天，副校长罗瑞卿同志把我们去山西的八个同志叫到一起，介绍了山西的基本情况，交代了路途中应当注意的事项，让我们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做掩护，去太原和薄一波同志接头。

翌日，我们化了装，坐汽车，抵西安；换乘火车，出潼关；前望黄河，心潮滚滚。我的耳际又响起了“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战歌。

第三天，我们抵达太原，见到了省牺盟会政治部主任薄一波同志。他，三十多岁，身体结实，面目和善。一见面，又是递烟，又是斟茶，显得很热情。他简单的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五一十地向我们介绍起山西当前的形势和我们今后的任务。握别时发给我们每人一百五十元国民党的票子，作为活动经费，并安排我们分散住到几个旅馆里。谁知，当天晚上就有警察来查店，检查每个房客的证件。一个警察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来这里干什么？因我是江西口音，不便和他们搭话，就摸出“牺盟会员证”给他看，并说：“我是薄一波叫我到这里住的。”这几个警察，一听说我是薄一波的客人，就再也不查问什么了，转身走出去。这说明薄一波同志在山西享有很高的威信。

过了几天，山西省委书记李卓然同志（曾在中央苏区红三军任过政委），戴着大礼帽，穿着长马褂，好象一个大学者，操着浓厚的山东口音和我们谈话。那是一个大院子，房间里摆着一套沙发，几把木椅，还有几个老式茶几，四面墙上挂着几张古字画和对联。看上去，室内陈设和主人的穿戴十分相称。李卓然同志和我们亲切地握手问好，了解我们的革命经历。我们八人来自四面八方，有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问我时，我说：“李政委，我们见过面啊！”他略一沉吟，说：“哦，想起来了，你是红三军八师的指导员吧？”，“是的”。我真为自己能在这里见到一位老首长而高兴。他问我以后又担任过什么工作？我回答：“当过连长、营长，一九三三年瑞金红大毕业在三师七团任团长。后来三师编入九军团，还是在七团。长征途中，当了一阶段九团团长，以后调九十六师任参谋长。”他对我的成长和斗争经历很满意，宣布叫我独自到山西雁北地区去开展游击战争。握别时他告诉我：雁北有十三个县（含现在的和林、清水河、凉城、丰镇四个县），各县都有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特派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你走的时候，和五位地方党员同志见见面，一起动身。他们是赵仲池、任晨、柏玉生、梁雷、王萍。

第二天下午，省委就派了一个做地下工作的联络员，拉了一辆黄包车，把我送到原来阎锡山办过“反省院”的一个四合院。赵仲池等几位同志前一天就到了。一见面，大家说说笑笑，问长问短，就象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晚饭后我们就开会研究去雁北的行动计划，并组成临时党支部，推选了赵仲池同志为支部负责人。准备妥当后，我们就带着省委发给的一部五瓦电台和随机的台长、译电员、摇机员，共计九人，乘坐一辆租用的汽车，于中秋

节后由太原出发，经原平，过雁门关，奔朔县，去开辟雁北抗日根据地。

挺进雁北成立晋绥边特委

中秋的雁北，格外凉爽。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现在已到了收获季节。但是，正当人们迎接中秋佳节的时候，噩讯频传：国民党晋绥军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九月六日，放弃天镇，九月十三日放弃大同；九月二十九日，日寇突破长城隘口大举南犯。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铁蹄践踏，勤劳善良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九个人在这个时候远离领导，去开展一项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每个人都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第一个落脚点是在朔县。朔县位于同蒲铁路上，紧靠内长城，是雁北关外的第一个县城，战略地位重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宋将杨老令公就是在这里鏖战辽兵壮烈殉国的。如今，日本鬼子的兽蹄已践踏到平绥线上，这里显然成为它们沿同蒲铁路进入山西腹地的必经之路。我们一路上看到雁北这个本来就很贫瘠的地方，由于日本鬼子的入侵，国民党溃兵、土匪趁机烧杀、抢掠，搞得人心惶惶，哀鸿遍野。一提起日本鬼子、国民党溃军和汉奸土匪，老百姓骂不绝口，恨之如骨，有的泣不成声地说：“国民党逃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在哪里呀？你们共产党、八路军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因此，我们一到朔县，马上亮明旗帜，召开了宣传抗日的群众大会。公开宣布：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八路军，是来同雁北人民共同打鬼子的。并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战争方针政策，

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主张；联合各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一致抗日。号召群众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凡是愿意抗日的一致欢迎。这些宣传得到了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热忱拥护和支持，许多人跑到我们的住地要求报名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游击队。

在朔县开展了几天工作，我们考虑到形势的急剧变化，为尽快建立抗日根据地，于九月二十一日到了平鲁。在平鲁城南门口，我们受到了牺盟会特派员屈健同志和平鲁城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奔走相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把我们簇拥到旧县政府的大院里，久久不散。赵仲池同志不顾旅途劳累，对群众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即席演说，他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深深打动了人心，大家不断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把鬼子赶回老家去！”。

在平鲁，我们召开了各县牺盟会特派员会议，也就是我党在雁北地区的第一次党组会议。会期五天。主要是听取各县汇报，分析研究斗争形势，统一思想，明确今后任务，在继续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组建工作。

会后不几天，八路军一二〇师抵达平鲁县境，十月一日收复平鲁；二日，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攻占井坪镇，缴获坦克、汽车28辆；五日，我八路军配合忻口作战，于雁门关歼敌百余人，烧毁汽车百余辆。雁北人民第一次亲眼看到杀敌英勇、纪律严明的红军、八路军，欢欣鼓舞，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这时，从绥远撤出的郑林、胡一新同志也来到了平鲁。根据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晋绥边特委，由赵仲池同志担任书记，郑林同志担任组织部长，田仲同志任宣传部长，我任军事部

长，屈健同志任边委会主任（相当于行署专员）。在特委领导下，平鲁、右玉、山阴、左云、偏关、和林、清水河、丰镇、凉城以及朔县的西北山，怀仁的西北地区，很快掀起了组建抗日武装的高潮。仅平鲁一县，不到十天，游击队就发展到几百人。

组建独立支队

我军主力开赴雁北后，主动寻机作战，迎头痛击立足未稳之敌，打了许多胜仗，给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的游击队一方面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一方面继续发展队伍，扩大根据地，为人民杀汉奸、打土匪。

当时的雁北，土匪成灾，溃兵横行。他们兵匪一家欺压百姓，经常成群结伙地骑着马流窜抢掠。百姓们恨透了这些家伙，把刚刚组建的游击队当成了自己的队伍，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带路，期待我们铲除灾祸。记得有一次，老乡报告说，平鲁七墩去了百八十个土匪骑兵，我们连夜摸了去，将其包围。趁这些家伙们没有察觉，先控制马匹，再占领房顶，然后喊口号，扔炸弹，发起冲击。土匪们都是乌合之众，平时象个凶神，此刻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纷纷缴械投降。不久，我们到平鲁西边的八墩又和土匪打了一仗。缴获步枪八十多支，战马上百匹。我们把土匪抢来的东西还给老乡，用缴获的枪支马匹武装自己，短短的三个月就发展到四百多人，枪、马配齐，组成了一个骑兵营。

我们在围捕剿灭土匪的同时，坚决镇压破坏抗日的汉奸卖国贼。平鲁城里有个姓李的大地主，父子都是汉奸。他的二儿子李树德，在“七七”事变前，曾当过阎锡山的石楼县县长。因其反共有功，受到阎锡山的嘉奖。事变前夕，他回到平鲁掌握“刀把

子”，亲任县公安局局长，兼管县警察队。这个警察队有一百余人，枪弹齐全。李树德仗着地熟、人熟、手头有家伙，暗中与绥远省的大汉奸李守信伪蒙军勾结，多次向我党政工作人员挑衅，捆绑扣压我领导干部，对我损害很大。我们坚决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缴了警察队的枪。对于各县的警察队也都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一改编，二缴械遣散，三打击的办法，巩固了抗日政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党的号召下，各地群众性自发的抗日武装组织，一呼百应，蓬勃发展。平鲁城东南的胡山一带，有个叫陶小峰的村庄。村里有个远近闻名的老医生，名叫蒙蔚。他早年在旧军队里当过医官，因和欺凌士兵的军官不和，主动辞职回乡。他的医术高明，既能医人，又能医兽，号称“人兽良医”，很得人心，他年轻的时候到过大同、北京，是当地走得最远的人。他识字看书，知道一点国家大事。本乡的人们都称他为有智有谋的“先生”。“红军是些什么人？”人们去问蒙先生。红军还没有来，蒙先生就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不必害怕”。“亡国奴是什么意思？”蒙先生是第一个解释这个名词的人。他说：“当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象蒙蔚这样有见识、有威望的当地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同情者、拥护者，很快就成了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得力助手。他最早支持他的大儿子蒙养正，担任了我抗日村长；他又送二儿子蒙亦民参加了宋时轮支队；他全力支持他的女婿王宝脱产闹革命；把他出嫁多年的女儿和几个外孙从平鲁城附近的大坡村接到山上养活起来。

更可贵的是，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没到陶小峰一带的时候，由蒙先生组织的一支六、七十人的抗日自卫队，已经行动起来，他们从国民党散兵、土匪手里夺取武器、马匹装备自己。他们主

动给警备六团、宋支队送情报、带路，配合作战。后来，蒙先生组织的游击十一队和他的女婿王宝组织的游击十队，分别编入我步兵二营的四连和五连。蒙先生任五连连长，是全雁北最老“胡子连长”。尽管他年高体弱，不惯行旅，但他是当地人民觉醒的标志，是当地人民抗战到底的象征。每遇困难，我们的战士就说：“连蒙先生都当兵打仗，我们这些年青人还能怕死、怕苦？”蒙蔚同志1939年入了党，他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荣誉。象他这样的土生土长的连排骨干，为后来六支队的组建出了大力。

到了1937年底，随着斗争形势发展，上级派人帮助进一步加强了晋绥边特委的领导。翌年，特委决定：从各县游击大队中抽两个中队，组成一个独立支队。支队设支队部、司政后机关，成立了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等直属分队，加上一个骑兵营、两个步兵营共一千三百余人。各营的编成情况是：

骑兵营，辖三个连。营长王零余、石膏山。一任教导员张生瑞，二任教导员谷奇峰。

这支骑兵在抗战初、中期，经常奔袭于长城内外，在绥南、绥东和晋北一带，作战频繁，屡建战功，敌伪十分害怕。

这支骑兵部队，是由赵英领导的五支队、傅生麟同志领导的七支队、李林和王零余同志领导的八支队组建而成的。由王零余同志任骑兵营营长。他是我党早年派进国民党东北骑二军何柱国部队的地下党员。该军在偏关驻防时，正值我党建立抗日武装迫切急需骨干。经组织决定，先调其任我游击八支队副支队长，后编入六支队任骑兵营营长。本人军政素质较优，骑射、劈斩，样样精通，且有智有谋，作战勇敢，指挥上很少失误，深受雁北绥南人民喜爱；敌人畏称“王老虎”。1947年任补充团长时，

在神池县指挥部队防空，遇敌机扫射牺牲。

步兵二营，辖三个连，营长张福来，教导员张宗文。

该营绝大多数是平鲁、朔县、右玉、山阴人。有着广泛、良好的群众基础。作战顽强，纪律严明，是我晋绥边根据地的游击主力之一。

营长张福来，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我苏区红军的排级干部。但他从不考虑个人职务的升降，兢兢业业地指挥这个营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他富有作战经验，在许多危急关头，都能巧妙运筹，胜敌脱险。

步兵三营，辖三个连。这个营的前身是晋绥边牺盟游击队。营长钟志清，教导员李登瀛。后来康庄接任钟志清当了营长。

三营打仗特别勇猛，多次袭击同蒲线上的重要据点岱岳。每战都能带回武器、布匹、药品、火柴等根据地奇缺的大量战利品。他们的装备较好，多是缴来的“洋货”，士气高涨，在根据地显得很“洋气”。

随着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到1938年秋季，支队各营都发展到了团，每团有三个营。各县的游击大队也充实到了三个中队。这时全地区共有抗日队伍八千余人，武装齐全，是一支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人民子弟兵。

贺龙师长命名一二〇师独立六支队

支队组建基本就绪后，我就带领一个骑兵连，冲破敌人数道封锁线，到晋西北的岚县（当时一二〇师司令部住址），向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汇报雁北的斗争形势和游击队的组织发展等情况，申请为我们支队正式命名，授印。

贺老总一听说我们赶到了，当天就让我陪他到各班看望战士们。他对大家讲：“你们是从前线回来的勇士！你们一路上昼夜兼程，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辛苦了！”他还体贴入微地向战士们问寒问暖，和蔼可亲地同大家啦家常，高兴地拍着战士结实的肩膀，发出爽朗的笑声，嘱咐战士们要吃好、休息好、学习好。第二天，关向应政委、甘泗淇主任也来看望战士们。不少同志议论说：“这么大的首长还在百忙中看我们，我们回到前方去一定要努力作战，多打胜仗，以实际行动回答首长和兄弟部队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在师部的日子里，我向贺、关、甘首长及周士弟参谋长详细地汇报了我们的开辟雁北根据地，组建和发展人民武装的经过。我汇报说，中共晋绥边特委把武装工作摆在首位，根据斗争形势决定建立支队，雁北人民群众对我们组建工作给了很大的支持。汇报中，我还将雁北绥南地区敌我态势作了详细说明。当时，在那块地方，我们虽有八千多人的武装力量，但武器并不齐备；而敌人，力量比较雄厚。在雁北方面和绥南方面，厚宫的第二十六师团部带第十联队驻大同，伪军一个大队驻朔县，一个大队驻左云、右玉，一个大队驻丰镇，一个大队驻凉城，一个大队驻岱岳、怀仁，另一个大队、两个联队约八千余人驻绥远地区。其中厚宫第二十六师团约七千人驻守包头、归绥城；另外，还有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的部队，以及“东亚联盟军”汉奸部队和雁北各县伪警察等乌合之众，总计在雁北地区约有一万余人（不含归绥、包头等绥西的日伪军）。……他们在数量上超过我们好多倍，武器也好，因此对敌人的力量不能低估。接着，我又汇报了支队的情况。

贺龙同志对我们的汇报表示满意，他指示说：雁北这个地方很重要，它是延安和晋西北通向绥远大青山根据地的一个要道，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要很好的建设这个方圆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使它成为一个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争取和大青山连起来。你们这个地区有十几个县，几百万人口，你们要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当前要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要加强同地方党政和抗日群众的密切协同，狠狠打击汉奸、特务、卖国贼，要争取打一些小的胜仗，提高部队战斗力，增强群众的抗战信心，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关于部队的一切供应，靠你们自己自力更生去解决。只要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这点困难就算不得什么。你们还要想办法，造地雷、手榴弹、炸药，修理枪械等，以便长期坚持游击作战。要用多种战法，如游击战、地雷战、袭击战、破击战、伏击战、小规模的运动战等我军传统战法，破袭敌人交通运输，打击抢掠之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贺老总还予见到将来敌人要在乡村设据点、修公路，企图控制乡村，我们面临的困难可能比现在更多一些。他要求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把工作做到敌人的前面，迎接最严重的考验，取得敌后游击战的最后胜利。

关向应政委补充说：“你们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这对于新建部队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工作；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严格组织纪律，认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搞好部队内外团结，齐心协力，这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希望你们在特委领导下，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努力作战，成为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

一周以后，贺、关首长正式任命我们支队为一二〇师独立第六支队，亲自颁发了印章。任命我为支队长，姜胜、胡一新为政委，李传珠、胡亦民为政治部正、副主任。

从此，我们支队前进在一二〇师的战斗序列里，在贺、关首长的直接指挥下，揭开了雁北绥南抗日武装斗争新的一页。

长城内外铁骑扫敌

晋绥边抗日根据地，位于雁北绥南黄土高原上。东有洪涛、云中两山为屏，西有黄河天险作障，南下桑干可抵雁门，北逾长城可达平绥铁路。在这辽阔的大地上，我一二〇师六支队，一诞生，就经历了战斗的洗礼，刚学走路，就开始了与敌人拼搏，在战斗的烈火中，它成长起来了！

下面记叙六支队英勇抗战的几个片断：

（1）凉城脑包村战斗。

六支队骑兵营成立后，在凉城西南方向的脑包村，打了个漂亮的袭击战。

这个村敌伪设有一个据点，有百余人，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1938年正月，支队得悉据点一个头头死了亲人，估计送葬出殡时，敌人必然放松警惕，就决定在他们出殡那天袭击敌据点。那一天，正下雪，雪片狂舞，寒风刺骨。人们说，出殡正碰上这种鬼天气，是恶人自有恶报。骑兵营的指战员们按预定计划，顶风雪、冒严寒，快马急驰，越过土围墙，冲进脑包村，以机枪做掩护，迅速攻占了警察署。空荡荡的大院里，留守的几个家伙象耗子似的钻了洞，指战员们迅速从墙上、地下收拾起枪支，从马厩里牵出马匹，立即撤出战斗。正在参加送葬的伪警察，听到乒乒乓乓的枪声，慌做一团，有哭的，有叫的，还有的扯过别人的孝帽赶紧往自己头上戴，生怕八路军来了丢掉狗命。这一仗，缴枪六十余支，缴战马百余匹，我方无一人伤亡。

(2) 厂汉营战斗。

厂汉营是凉城外周比较重要的村镇，敌人为了控制凉城以南地区，在这里设了据点，派骑兵一个连队，计百余人驻守。

敌人利用这个据点，四处抢劫，弄得老百姓不得安生，群众纷纷要求我们打掉这个据点。为了更好的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巩固游击根据地，保护群众利益，我们支队党委经过研究下了决心，拔掉这个据点。

一九三九年二月，快过春节了，可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使这个欢乐的日子，笼罩了莫大的忧愁。在这个时候，厂汉营据点的敌人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把据点里的情况摸清楚，我们先派出侦察员，扎上白毛巾，穿上破烂的羊皮袄，装扮成赶马车的老百姓，趁老百姓给据点送粮的机会，混进去，查明了据点的内部情况，还把据点里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布防情况绘制了草图。侦察员回来后，我们详细研究了敌情，决定采取偷袭的办法。

一天晚上，我带一个骑兵营和一个步兵营，利用夜幕隐蔽，把部队调到据点附近，凌晨四点，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一声令下，尖兵班首先摸掉了敌人的哨兵。接着部队按预定作战方案兵分两路，从东西两条街突然发起进攻。这时候敌人正在酣睡，我们冲进院，向营房扫射，打手榴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这时，整个村子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响彻云霄。敌人在我们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有的扒在被窝里吱吱哇哇高喊求饶，有的还没有从梦中醒来，便迷迷糊糊当了俘虏。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此时，天渐渐亮了，东边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映照着漫天红霞，象是为我们的胜利披红挂彩。

这次战斗，打死了敌人五十余人，打伤四十余人，俘虏六十余人，打死一名日本指挥官，缴获战马一百五十余匹、步机枪一百一十余挺（支）、子弹一万余发。我们只有六人受伤。

这次战斗除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外，还缴获了大量的“年货”。我们把缴获来的油、肉、白面，都分给了群众，军民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胜利的春节。

（3）杀虎口战斗。

杀虎口，位于右玉县与和林县之间的内长城上，是雁北通往绥南的要道，也是晋西北通往大青山地区的必经之路和重要的关隘。镇子周围有一道古城墙，三丈多高。东西有城门，北面是大山，城南面三百多米有一条苍头河，水深五尺左右，河床是淤泥和流沙，人马不易通过。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有七个日本鬼子带着二百多伪军，来到杀虎口设置据点。白天敌人在东西城门各设两个哨兵，晚上城门关闭，哨兵就放在城楼上头。由于地势比较险要，不利于我们发起进攻。我们根据地形和敌人布防情况，仍然决定采用偷袭战术。

晚上，支队部率领部队利用夜暗，隐蔽地向敌人接近，在离城很近的地方埋伏下来。先派出两个便衣侦察员，装做给敌人送情报的，大摇大摆地走到城门下。城楼上的哨兵看见只有两个人，便下来开门。刚打开城门，我侦察人员迅速将敌人的两个哨兵抓住，用毛巾堵住了他们的嘴。在这同时我们的先头部队一跃而起，冲进城去，抢占了城头上的主要工事，掩护后续部队进城。

两个营的部队全部进城以后，各连接予定的目标向敌营冲去。此时，敌人还正在睡觉，枪都挂在墙上，冲进去的战士高

喊：“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屋子里的敌人吓得直打哆嗦，乖乖地投了降。由于敌人分散住在十所院子里，战斗一打响，城西有三个院子的敌人发觉我们进了东门，慌乱地拿起武器同我们抵抗，我们一面加强火力进攻敌人，一面采取政治攻势，瓦解他们。顽抗的敌人看见实在没办法了，只得打出了白旗。还有一部分敌人向西门外逃跑，哪知道我们早有埋伏，他们一出西门便被我们缴了械。

此时，三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夜空，宣告战斗结束。各连打扫战场，清查统计，共击毙敌人三十余名，七名日本鬼子全部被打死，俘虏敌人一百七十余人，缴获步枪一百六十余支，机枪七挺，子弹二万余发，战马一百余匹。

战斗中，我伤亡十二人。支队政委胡一新同志负了重伤，虽然急送晋西北军区后方医院，终因伤势过重，医药条件差，光荣地牺牲了。

（4）鹅毛口战斗

鹅毛口，位于怀仁县西北，距县城仅十五华里，是洪涛山外围的一个重要口子。我们八路军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下山到平川铁路沿线活动，都要经过这里。敌人在这里设了据点，据点外围有城墙，城墙外围有铁丝网，还修了一个三层炮楼。敌人的炮楼在咽喉要道上，我们出山进山受到严密控制，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一九三八年九月间，我们决定拔掉这棵钉子，恢复山区与平川，山区与铁路沿线的联系，以更好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活动。

可是，拔掉这个据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是地势险要，二是守兵众多，三是工事坚固，要想强攻，难以成功，必须智取。如何智取？我们突然想起据点附近有一个“两面村长”，此人

能说会道，应变能力较强，他既给鬼子办事，也和我们有联系。他觉得，哪头都不好惹。因此，我们把他找到，对他晓以利害，让他帮助我们攻打鹅毛口据点，并明确指示，这是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一天，乘这个村长派人给敌人据点送东西，我们侦察员趁机混进了敌据点内。经过侦察，我们弄清据点里大约有一百二十多名伪军，一部分住在围子内，一部分住在炮楼里，伪军队长住在炮楼上，炮楼的火力很强，能控制周围一大片地方。围墙周围构筑了好多明暗火力工事，大门盘查很严，一般难以进去。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决定派步二营担负主攻任务；骑兵营机动能力强，部署在去怀仁的公路上，准备消灭增援的敌人。

九月十日，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的十几个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赶着十多辆马车，明里是朝据点送粮送肉，实际是车上暗藏着炸药。走在最前面的车把式，是当地的老百姓，叫王大明，三十多岁，大高个子，家里很穷，因为常被派给据点送东西，和伪军们混得很熟，能跟他们说上话。马车一到据点门口，哨兵问：“送东西来啦？”王大明用手一指，说道：“你看，十几挂马车哩，有油、有肉、又有粮，足够你们吃了！嘿，还有纸烟哩！”说罢，他把一条纸烟打开，分给了哨兵，哨兵高兴地把手一挥说：“统统进去吧！”这下，敌人正好中了我们的计。“车把式”们从车上给敌人往下搬东西的时间，天已经黑下来了，趁敌人不注意，迅速把炸药口袋靠到炮楼跟前，他们迅速点燃导火线，马上撤到安全处。只听一声巨响，敌人的炮楼顷刻间变成烟尘土块，四处飞散。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二十几个家伙负隅顽抗。早在外面待机的部队，一听到炮楼被炸的巨大声音，闪电一样往围子里冲，“缴枪不杀”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大

部敌人被活捉了。此役，毙伪军队长以下三十余人，俘敌八十余人，缴步枪六十余支，我们只有三个战士负伤。

（5）曾子坊战斗：

曾子坊是洪涛山区，左、右、平三县边界的一个较大村子，往南便是我右南县的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春，敌人在这里设了一个据点，他们想依托这个据点，进一步深入我根据地内布防，以达到他们挤走游击队，挤垮根据地的目的。如果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那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雁北地方党委要求我们，要想方设法去破坏敌人设点的阴谋。怎样落实地方党委这一要求呢？曾子坊是右玉县的一个村子，可是距右玉城一百多华里，离左云较近，有五十多华里。敌人想在曾子坊站住脚，勒逼群众修公路。如果破坏敌人的修路计划，就能击破敌人的毒辣阴谋。于是，我们就从破坏敌人的筑路开始，展开了斗争。

为了不让敌人修成公路，我们派人到敌据点附近的村里做工作，动员群众不给敌人出差。这里的群众受鬼子残害很深，对敌人恨之入骨，原来还不愿意去哩，经我们一宣传，都表示不给敌人出差。敌人来抓差，想尽办法溜出去，躲起来。敌人在曾子坊附近抓不到人，便在左云城附近抓一些老百姓，用汽车拉来干活，每天只能修一小段路。晚上，我们就发动民兵进行破路，并在路旁埋设地雷，使鬼子们大吃苦头。后来，敌人又想出了个坏主意，他们让老百姓坐的汽车跑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的汽车里。怎么办？我们研究出了个办法，就是在敌人押着老百姓出工的时候，我们不理睬他们，在他们回来的时候，等老百姓的汽车过去了，专打鬼子和伪军的汽车。这样，每次至少能打死或炸死几个敌人，这就使修路的速度大大减慢了。

但是，敌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罪恶计划，反而更疯狂地抓人

赶筑公路。为此，我们决定狠狠打击一下敌人，教训教训他们！

六月二十九日拂晓，我支队骑兵营和一营步兵，在一百多民兵的配合下，埋伏在左云到曾子坊途中。我们进入阵地后，指战员和民兵都进行了伪装，密切地注视着公路上的动静，等待着敌人“上钩”……。

一直等到上午八点多钟，才看到一辆一辆汽车驶来，我数了一下有二十多辆。前面十几辆车，拉的是老百姓，中间的几辆，坐着鬼子，后面的几辆是伪军。当拉着群众的十几辆汽车，走出我们的包围圈之后，我便发出战斗命令。随着三声信号枪响，我军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把敌人一下打懵了，有的在车上就被打死了，有的跳下车，躲在车轮后，图谋顽抗。此时，我命令机枪火力掩护，全队出击！随着冲锋号声，指战员们象猛虎一样冲下山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经过将近一小时的拼杀，打死打伤敌人九十多，俘日军十多人，毁敌人汽车二十余辆，缴获歪把机枪六挺，步枪百余支，王八盒子三支，子弹万余发。在战斗中，我连长贾连成和李胜同志牺牲，一名排长和十名战士负伤。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召开了庆功大会，中共晋绥边特委书记赵仲池、边委会主任屈健、支队长刘华香、政委姜胜、各县县委和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及二千多群众参加了祝捷大会。会上，敲锣打鼓，为立了战功的指战员和民兵们披红戴花。

（6）左小峰战斗：

一九四〇年三月间，我们得悉平鲁县井坪镇日伪军二百余人，加上朔县调来的一百余人，共计三百余人，集中到一块，准备到南汉井一带抢粮。这天（三月二十日）晚上，支队党委开会研究，决心消灭这股敌人，当即下令调骑兵团（营升为团）和步兵

三营，于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到达左小峰山上待命。我们支队部带领支队直属警卫连、通信连、侦察连和司政后部分人员，亦于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前赶到左小峰山上。部队到齐后，我立即布置步兵三营正面占据左小峰山，挖掘工事，骑兵团在左小峰东南山占领阵地，支队部指挥所设在左小峰山上。当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做好临战准备时，我用望远镜一望，见敌人已经到了我们设伏阵地前面五、六公里处，大约有一百名伪军走在前面，二百名日军跟在后面，成一路纵队，拖着三门山炮，大摇大摆地向我们埋伏的方向来了。他们要到南汉井，这里是必经之路，必须翻过左小峰山，才能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我们隐蔽在山上，没被敌人发现。当敌人爬到半山坡上，走进我们伏击圈内之时，我命令通信员发出三颗信号弹，各营同时向敌人开火，敌先头部队一下就乱了。后边的日本鬼子大喊大叫，大概意思是不准乱跑。此时，我们的机枪、步枪，已打死敌人七十多名。日本鬼子小队长亲自指挥日伪军向我阵地反扑，我步兵三营凭着简易工事，坚守在阵地上，沉着勇敢地向敌射击。当鬼子冲到距我阵地三、四十米处，我军的手榴弹象雨点般扔到了敌群里，炸死鬼子三十余人。这时，我骑兵团从侧后方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无处躲藏，击毙了敌指挥官——日本小队长，顿时敌人象掉了头的苍蝇，乱冲乱撞，逃窜开来。我骑兵团用强大火力堵住了敌后路，步三营居高临下，向敌人扫射。敌人被我火力网团团围住，只得乖乖的跪下投降缴枪。这个战斗，从上午九时，打到十一时半结束，只用了二个半小时的时间。经过打扫战场，共计毙敌百余人，俘敌百余人，缴获山炮三门，机枪四挺，步枪一百五十余支，王八盒子三支，子弹一万余发，山炮弹六十余发，战马十四匹，战刀一把。

(7) 黑老窰子战斗

一九四〇年六月间，驻大同日军宫本师团长，调集了一万多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法，从大同、左云、右玉、平鲁、朔县、山阴分五路，向我洪涛山、黑驼山根据地进行了扫荡，企图一举歼灭我有生力量，摧垮我抗日根据地。

为了避其锋芒，寻机歼敌，我们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和营为单位，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到右玉、平鲁、朔县以西地区与敌人周旋作战。

我们支队机关带了一部电台，率通信连、警卫连、侦察连到右玉县的西山地区活动。

敌人的进攻开始了。六月三日，敌军从集结地出发，象饿狼似的直扑向我雁北根据地中心——洪涛山。为了阻滞敌人的进攻速度，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敌人向我前进的路线上早已埋下了伏兵，敌人每天都遭到我民兵小分队“麻雀战”、“地雷战”的袭击，路上到处都能听到枪声和地雷的爆炸声。当敌人还没有到达我们游击队活动的中心，便炸死了不少。敌人白天在路上挨打，夜间只能龟缩在村子里不敢出动，害怕遭到民兵小分队的袭击。

由于我们事先得到了情报，通知群众进行坚壁清野，把牛羊赶到敌人无法发现的山沟里，粮食埋在地窖里，就连水井也掩盖了起来。结果他们围攻了七天，既担惊受怕，又没捞到东西，甚至连八路军的面也没见，反倒将四、五百鬼子的尸体扔到了山沟里。最后，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返回了据点。

由于敌人集中兵力围攻游击区，只剩下一小部分兵力守卫据点。我们趁虚而入，夜袭黑老窑子，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

这个据点在和林和凉城县之间，当时只剩下五六十个人看家。六月五日夜晚，天空一片漆黑，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支队骑兵营在营长王零余、政委张生瑞率领下，由右玉县宝泉村出

发，经过六个多小时急行军，部队巧妙地绕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大约在凌晨四点多钟赶到了黑老窑子外围。黑老窑子有两丈多高的土围子，外边还有一条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壕沟。按预定计划，一连副连长张德带领五个战士换成便衣，伪装给敌人送信，大摇大摆地接近了敌人的哨兵。

“什么人？”敌人的哨兵惊慌地吼叫。

“给大队部送信的。”张德同志沉着地回答。

“先过来一个，举着手过来！”敌哨兵唯恐不测，往后退了两步。张德一个人走了过去，那哨兵刚要搜索，张德嗖一下从腰间摸出一个明晃晃的匕首，喝道：“别叫，叫一声宰了你！”这时，便衣组蜂拥而上，缴了哨兵的枪，逼他交待了防守情况和当晚口令，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包围了敌人。

这时，土围子里的敌人还蒙在鼓里。有的抽大烟，有的赌博，有的在嫖女人，他们作梦也没想到八路军竟会在这雨霖霖的深夜来到他们的窗下。当一阵阵激烈的枪声、爆炸声响起，敌人马上乱成了一锅粥，有的喊，有的嚎，有得吓得发呆，当然也有人想负隅顽抗。可是那如同用鸡蛋撞石头，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就胜利地结束了，五六十个敌人全部落网。缴获了机枪九挺，步枪六十多支，手枪四支，子弹二万余发，留声机四部，掷弹筒六具，战马一百多匹，还有一些别的物资。第二天早晨，部队吃得饱饱的，带着缴获的战利品，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被捣毁的据点。

破袭同蒲路

1940年8月20日开始，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自组织和指挥下，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百团大战”。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给了日寇以狠狠打击，大大的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上气，也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企图。

八月初，我们接到贺龙司令员的电示，命令我支队所有部队，积极配合华北八路军主力开展破袭战，彻底破坏同蒲铁路北段，切断敌人交通线，坚决孤立和打击敌人。

我们接到指示后，立即同特委研究制订具体计划。特委指示民兵游击队配合我们共同行动，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主要目标，能炸的就炸，能扒的就扒，以达到彻底破坏的目的。部队则以掩护民兵游击队破坏铁路，打击敌人为主，负责袭击敌人的车站、仓库、据点等。

临战之前，我们组织了民兵、游击队和地方干部，进行临战训练，使他们都学会了炸药包的捆绑，学会了一般破路炸桥的方法。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支队和民兵开到了大同至朔县的同蒲路北段。那天晚上，在我支队的统一指挥下，袭击车站、据点，爆炸铁路桥梁，同时展开。霎时间，雁门关外，同蒲路两侧，枪声大作，爆炸声不断轰响，整个同蒲路瘫痪了，电话打不通，火车开不出，指挥又不灵，吓得日本鬼子只好躲在据点里。有的刚一出来，就被我们打了回去，有的干脆有来无回，被我们打死或当了俘虏。有的俘虏说：“我们只听见铁路沿线枪炮声、爆炸声连成一片，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队伍，从那里打过来，……”

破坏同蒲路北段，我们分为四次，每次搞四个地段，每个地段负责破袭十公里，一次就破坏四十多公里，四次将朔县至大同的铁路全部破坏。每次破路，民兵们都要将铁轨抬上山去，运转到晋西北军区后方兵工厂，做为修理枪械的材料，并把

割断的电线和锯倒的电线杆都分给了群众。

这次破袭战一开始，就完全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切断了敌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支援，使敌人的一个个据点孤伶伶的，都变成了“死王八”。

在参加“百团大战”的战斗中，我们共消灭敌人四百余人，打伤五百余人，俘虏三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三百一十多件，子弹三万余发，烧毁敌人车站五处，炸毁大小桥梁十座，拆除电线数百公里，锯断电线杆一千多根，并袭击了岱岳、鹅毛口、孤山、凉城、井子沟等五个敌人据点。

我支队死亡共百余人。一次我支队二营，在破坏了神头的铁路以后，撤到附近的高村，阻击由岱岳出来的敌人，不少同志光荣牺牲了。我的通信员贾祥伍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

百团大战胜利后，日寇由于损失惨重，撤换了华北方面的日军司令官。日军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的占领统治，从华南调集了众多的部队，对华北地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扫荡，仅雁北地区敌人就调集了数万名日伪军，从此，雁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更加艰难困苦的岁月……。

抗日反顽两面作战

独立六支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机智勇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雁北绥南坚持抗战的军民，也狠狠打击了日伪以及反动顽固派的气焰。但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向我长城内外、晋绥边区的军民清剿、扫荡，从1938年起，到1939年底，就进行了七次大扫荡。面对着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国民党内的投降派“阎锡山长官”部下的

“英雄好汉”，不思谋挺起胸膛来做人，奋勇投身抗战，却死心塌地的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甘心为虎作伥，处处与我抗日军民搞摩擦，分裂统一阵线，破坏抗日斗争。我抗日军民，起初以为全民族的大敌当前，摩擦不至于大动干戈，谁知，他们愈演愈烈，欺人太甚，欠下了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为了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了保护晋绥边根据地人民的基本利益，我独立六支队不得不采取一面抗战，一面反顽的特殊斗争方式。雁北地区的反顽斗争是从1938年的冬天就开始了的。

从1937年秋到1938年冬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和我们六支队，用鲜血开拓了晋绥边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牺盟会、动委会为名义的抗日县、区、乡政权机构。这是雁北军民血战一年所获得的最宝贵的抗日成果。可是不久，阎锡山任命的“十一专署专员”杨集贤，带着阎锡山任命的一批县长，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在我们经过浴血奋战恢复了的土地上，大搞“接收”，成立所谓县政府，要我们承认他们这些“专员”、“县太爷”。对外，他们向日寇献媚；对内，他们扶植土豪劣绅，迫害我抗日工作干部，限制我抗日工作，妄图把八路军、动委会削弱，最后一举歼之，建立一个与日寇“共和”的阎督军天下。这显然是强盗行径。可是在当时，重庆坐着“委员长”蒋介石，隰县住着“阎长官”，延安还有一个从苏联回国不久的“领袖”（王明）。王明写的《抗战胜利的唯一保证》，说是“要一切通过……一切服从……”这可把人们搞糊涂了。于是，当“县太爷”们一个个走马上任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没有足够有力的“武器”可以抵抗他们。具有政府权威的“动员会”，便奉上级之命取消了。平鲁的“县太爷”蒋思恩，一到任就宣布取消抗日团体，解散基层组织。幸好被我们抵制了。出任大怀左县

的“县太爷”李进，对我提出了同样的反动无理要求，竟被我当地一个负责人完全接受，甚至同意遣散游击队，把枪支弹药交给李进。他以为这一下就可以安然无事了。不料这种投降磕头政策，带来的是顽固派的得寸进尺，最后就对我县动委会的干部下了毒手，有的被杀，有的被抓，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的部队当时不论在供给上和思想上，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个别连队甚至出了叛徒暗杀我连长（朱子清）的事件。

幸好在年底，我们接到了贺、关首长关于坚决反击顽固派的指示，在地方党委的安排下，统一部署各部队四处出动打顽固。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就把顽固分子掌握的武装全部缴械，并把反动“县太爷”李进等二十多名犯有汉奸罪行的反共分子执行枪决。当根据地人民选出自己的区、县、专署领导，在山阴县境内的东短川召开庆祝专署政府成立大会的时候，我六支队一边派出部分营连设防，保卫大会，一边派部分骑兵到会助威。当时我们的心情就象是久旱的小苗遇到了甘霖，别提有多么畅快了。

在反击顽固派的斗争中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傅作义部五路军，于一九三九年在樊库（绰号樊皮裤）带领下，窜到凉城南曹碾一带抢掠作恶，竟围歼了我大青山游击支队护送作战资料的一个排战士，甚至杀害了东北军骑三师十一个官兵，夺走了他们的枪支。接到贺、关首长指示后，我支队骑兵营与老八连及四中队马上研究，做出计划，协同配合，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凉城县曹碾、火泉、十二滩一带，对樊库率领的五路军，展开了围歼战，击毙顽固派一百余，俘三百余，缴获步枪二百余支，轻机枪十挺，手枪三十余支，望远镜两个，子弹一部分。

一九四〇年一月，我支队骑兵营三个连加上老八连，配合警备六团三个骑兵连，共七个连队，在左云县郭家窑村消灭顽固派

的左云县公安局及四中队，活捉其县公安局局长简万中、四中队长贾进宝以下官兵三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轻机枪八挺，手枪三支，战马四匹。

历尽艰辛百折不挠

六支队的前进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有坎坷，有曲折，有血雨腥风的残酷，也有刀山剑树的险恶……每一个胜利都来之不易，有时甚至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作为支队长的我，缅怀往日的斗争，既为自己在贺、关首长及晋绥边特委直接领导下取得过一些胜利而欣慰；也为因自己水平有限，发生过指挥作战上的失误而内疚；更为那些勇于为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豪烈士们而悲痛，而骄傲！

还是从日寇对我晋绥边根据地的疯狂围攻来说吧。因为晋绥边这块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象个巨大的活火山口，经常爆发。使敌人的朔县、山阴、怀仁、大同、集宁等北同蒲铁路和平绥铁路沿线重镇经常挨打，中断交通，直接危及北平、张家口、归绥、包头一线的占领。侵华日军的这条“右臂”，如果从晋绥边这个缺口上被打断，其后果是不难预见的。所以，早在1939年秋天，日寇就兴师动众，开始了对我晋绥边的第七次大围剿。他们的企图是这样实施的：日军总指挥井首接受了前几次扫荡找不到我支队主力，反而惨遭伏击、偷袭、一再重挫的教训。这次围攻前先不声张，偷偷将朔县城内之敌调至马邑、神头，控制住我洪涛山的南端；又把怀仁、左云之敌大部调集于大峪口、吴家窑、马道头，控制住我洪涛山的东线；再将平鲁城内之敌暗暗运进井坪、曾子坊，由此完成了对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平

东、右南、左西、山朔北)的严密包围。然后兵分七路向我杀来。

我六支队经过较详尽、周密的侦察，制订出反围剿作战的策略和部署：选择薄弱环节，首先打出敌人的包围圈，然后趁敌城内空虚，分头以小股兵力作攻其据点，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牵着鼻子把敌人拽回来，半道上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歼灭敌人，打下他们的嚣张气焰。这次反围攻斗争中，由女英雄李林和柏玉生同志亲自指挥的一部分游击健儿们，突袭了同蒲铁路北段的重要车站岱岳。我骑兵营夜袭了沙城之敌，击毙了敌人指挥官一名。我步兵二营和步兵三营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后，按预定作战方案，跟在敌人的后面伺机出击，亦获全胜，战果累累。敌人损失惨重，第七次围攻以失败告终。我趁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开展了闻名于当时的“南山游击运动”，“破坏电线、公路运动”，搞得敌人坐卧不安，十分狼狈。

但是，敌人在又一次的失败面前采取了本能的反扑。时隔不久，在1940年春季开始了第八次规模浩大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我们在刚刚赢得的胜利面前没有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及时地做好应变准备，结果在敌人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围攻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地委、平鲁县委的十二位优秀的妇女干部，被日寇包围、汉奸告密，在平鲁县东南方向张崖沟的一个旧煤窑下中毒牺牲。

在这十二位烈士中，有地委妇联主任李桂芳同志。桂芳同志是陕北定远县人，中学毕业生，与当时的地委社会部长李登瀛同志一同从延安调来雁北。她个子高大，鸭蛋形脸，性格要强，工作认真。当时雁北军民物质生活虽很困难，但是用缴获敌人的战利品装扮的女同志还是不少的。桂芳同志虽然比别的女同志有

更多的机会获得战利品，但她生来俭朴，不贪享受，一年当中常有六七个月穿着一条白茬子老羊皮皮裤，由此而得名“皮裤姑娘”。她精明强干，做妇女工作很有办法，用歌声召唤妇女姐妹们做军鞋、送公粮，支援六支队打胜仗，也是她拿手的招。她这样唱过：

“羊肚肚手巾齐眉眉罩，隐蔽起来打岱岳（窑），

“六支队打仗真厉害，鬼子兵见了抱脑袋……”

“做好军鞋种好地，巩固咱们的根据地……”

李桂芳同志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多么年轻有为的革命战士啊！

与桂芳同时遇难的还有：武云英、邢培兰、张华、何茹、穆秀花、于洪茹、张桂兰、曾洪文、郝秀兰、曹科等。

这起惨案发生于1940年的三月末。

张崖沟事件发生二十多天以后，日寇调集一万多人，采用“分进合围”的战术，发动了第九次围攻。当我和地委的一些领导人，率领步二营从山阴县的水头村出发转移，走到屯港村的一个山头上瞭望时，已见敌人完成“合围”，我部正处在敌人的一个狭窄的包围圈内。骑兵侦察员骑着头部流血的战马回来向我报告，说：“周围二、三十里的村庄和制高点都有了鬼子。”情况紧迫，我当即命令二营为第一梯队，支队直属连和骑兵营为第二梯队，向屯港之敌发起冲击，为我军突围打开缺口。

屯港之敌是一个炮连，有六门山炮，一百多人。我二营战士以急风暴雨之势，高喊杀声，冲下山去。激战中，前面的同志倒下了，后边战士又冲上去，官兵上下，无所畏惧，展开了殊死的拼搏，掀起的尘土把太阳都遮暗了。二营终于打开了缺口，部队急速突围。可是两侧的日寇疯狂地向我猛烈射击，一发子弹突然打中了我的右肩上，血顿时象泉涌一般，我倒在了突围的路上。

警卫员孟增和护士魏光明两位同志赶上来架起我就跑。当我们三人顺着一条小山沟，在老庄窝山南的旧煤窑里隐藏下来时，枪炮声还在不停地鸣响着。就在这个阴暗潮湿的洞穴里，两位年轻的战士精心地护理、保卫着我，甚至将仅有的一口干粮留给我，凭着惊人的战胜饥饿的精神，坚持隐蔽四天四夜，掩护着我度过了险关。不久后我得到了就医，动手术挖掉伤口的烂肉，取出里面的碎骨，以一只右手的残废保全了生命。就在我倒在窑洞里的时候，优秀的共产党员李林同志却壮烈地殉国了。

李林同志是南洋的华侨，从小到中国念书，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七年春天被派到雁北大同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大同失守后，她到平鲁县参加了我们支队，担任过连指导员和营教导员。这个同志爽朗、活泼，能歌善舞，而且作风朴实，打仗勇敢，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因工作需要，三九年调中共晋绥边委员会任秘书长。这一次，她主动带领一个警卫连，留在后边掩护边委机关突围。当时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不少战士英勇地献出了生命。李林同志打得枪中只剩下三粒子弹，这时敌人包围了她，狂叫着“活抓这个女共党”！李林同志临危不惧，沉着镇定地用两发子弹击毙了两个鬼子，在敌人扑上来的最后时刻，壮烈地以身殉国，为抗战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当时的《抗战日报》、《新华日报》都对于李林同志的英雄事迹做了报道：“1940年4月26日，雁北游击队女英雄李林，在敌残酷扫荡中英勇殉国，享年24岁。”

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我步兵二营五连的“胡子连长”蒙蔚（此时他已改做支队部的副官工作），左前额负伤，也几乎殉难。后来我听人说，他骑马回到陶小峰家乡去养伤时，发现他辛勤大半生制作的药橱和他的十几间房子，都被日本鬼子烧毁了。

他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伤未痊愈，就带着纱布返回了部队。又过了三个月，他由乱道沟随部队转移，在平鲁县的榆林村被敌包围，壮烈牺牲。在抬运他的尸体时，人们发现他的身体上竟有四个刺刀捅出的血窟窿！我二营五连全体指战员，以及我右南县县委书记夙诚等负责同志都到陶小峰村为老英雄送葬，军民同哭共哀，万分悲壮！

这一年，我们的许多子弟兵戴着黑纱和孝布去打仗。几乎在每一个山岗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血迹。群众在掩埋烈士的遗体时看到，有的被鬼子把肚子打破，肠子从肚子流出来了。而在英雄的肚子里存有的却是一些没有消化尽的野菜和黑豆……老乡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十分心疼，于是就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一点点粮食省出来，送给自己的子弟兵。

可是，在敌人反复围剿、扫荡的凶焰下，面对着极端困难的情况，一些意志薄弱者们便开始了动摇，甚至有的变节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边委秘书耿平，右南县委书记王润（李易山），就是在这个时期叛变投敌的。这些家伙一投敌，就为虎作伥，把我党、政、军情况统统供给敌人，甚至带着敌人打我们。敌人也就依靠这些家伙们，在政治上大造反共舆论，大肆破坏和离间我党的地下组织；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加剧围攻，采取筑碉堡、修工事、设据点、铺公路，步步为营，向我蚕食的策略，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使我雁北抗日根据地遭受了空前的苦难。党的组织被迫转入了地下；我们六支队除了留下一些便衣工作队，保护我党政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外，主力转移到偏关、清水河一带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种困境之下，我平鲁县城工部部长王宝同志，仍然冒着很大的风险，化装进城，在日伪部队中进行策

反工作，把一些稍有民族觉悟的伪军，三三两两地拉出来，投入我军，搞得敌人内部互不信任，惊恐万状。这年夏天，王宝同志亲自进城，与伪军的一个小队长面谈了我方接应投诚人员的计划，深夜趁日本鬼子睡熟之际，在王宝同志亲自指挥下，把伪军的一个小队（十儿人）拉出城来。计带出机枪一挺，步枪十五支，短枪一支，子弹两骡驮，手榴弹十枚。这是雁北处于困难时期做敌军工作所取得的一个可喜的成果。遗憾的是，我们这位敌工工作模范王宝同志，不久竟被潜伏的敌特给暗杀了……

我六支队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后，密切配合野战部队主力，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伏击敌人运输队，捣毁敌人后勤供应点；而留在根据地内的游击队和民兵，不屈不挠，积极阻滞、袭扰和消耗敌人，开展麻雀战、地雷战、游击战，和敌人巧妙周旋，使敌人寸步难行。这样一来，弄得敌人腹背受敌，进退两难，最后不得不狼狈地撤出我根据地。

截至1941年底，我六支队取消番号，支队部为“晋绥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所取代。我支队先后经历了敌人十三次大围剿、大扫荡，历尽艰辛，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经受了考验。事实证明，我一二〇师独立六支队不愧是一支在贺、关首长及晋绥边特委（雁北地委）直接领导下，不断成长发展的一支抗日劲旅。

当我将要结束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我感到应该把那些在六支队的组建、发展过程中，付出巨大心血，为雁北、绥南人民做出过贡献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敬告给读者，他们是：赵仲池、郑林、李林、李登瀛、梁雷、胡一新、柏玉生、李林枝、武养民、屈健、康庄、苏谦益、张福来、王零余、姜胜、傅生麟、田仲、

胡亦民、胡全……恕我不能全数写上。

还应该特意提出李井泉、姚喆等同志，他们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在指挥军民与我雁北根据地连结的过程中，大力地支持我们的斗争，积极有效地策应和配合我们的作战，给我们六支队指战员和雁北广大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还应该提到警备六团、宋时轮支队……

再提到雁北、绥南的人民群众……

只是时隔久远，自己年纪大了，当时的资料又很难搜集，只好先写出这些，“抛砖引玉”，敬请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和其他读者，原谅我这篇东西“挂一漏万”的缺点，并指出其中的失误。

一九八二年六月于北京

（郝建军整理）

在绥西抗战的艰苦岁月里

王建功

一九四一年夏，根据组织的决定，我由晋西北调到大青山地区工作。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相持阶段。敌人为了保证京包铁路西段的畅通和维持对归（归绥）、托（托克托）、萨（萨拉齐）等县广大平川地区的控制，对我绥西地区积极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企图造成无人区，将我抗日战士困死或逼走。绥西地区，本来就是个人烟稀少的贫瘠山区，经过敌人的数次骚扰，就显得更加荒凉和破败了。当我到达绥西的时候，我们党政机关驻地井尔沟、万家沟、一前响等村子，只剩下残壁断垣。原来的村民，都一户两户地住到沟沟岔岔的窝铺或窑洞里去了。情况不熟的人，游击一天，也很难找到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绥西的党政机关，区党委、地委、专署等机关干部，只能在万家沟的大火烧、一前响的大南沟、井尔沟的德胜沟等几个有山林的地方，这里三天，那里五日地宿营和工作。遇到敌人扫荡的时候，就躲到沟沟岔岔里的峭壁悬崖底下露营，而且还得天天转移，以免敌人发现，遭受损失。我们吃的粮食，都是京包铁路两侧和沿山一带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给我们送粮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必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动身。离村时，要极端秘密，以避免敌人耳目。稍有不慎，

就有粮食、牲畜被没收，人员丢掉性命的危险。群众给我们送粮，行动是如此的困难，当然就不能保证经常及时送到。遇到没粮吃的时候，就得想法向群众借。可是群众的粮食也少得可怜，只能借给我们一少部分，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将借到的一点点粮食——莜面熬成糊糊，大家分着吃。到实在借不着粮时，就只好吃点干粮袋中的救命炒面。那时每人身上都带着个搪瓷缸子，早晨用它刷牙，平时用它喝水吃饭。勤务员比干部多带个搪瓷面盆，洗脸、洗脚、盛菜、打饭都用它；敌人扫荡时，还用它来煮饭。那时，从首长、干部到一般战士，大家都是吃的一锅饭，住的一样的窝铺，穿的一样的衣服，每人每月领的都是一样的津贴——约合现在的一元钱。

我们除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外，还要经常提防敌人的扫荡或奔袭。从一九四一年夏到年底的几个 月里，我就五、六次遇险。一次是在五月间，我带着绥察区委机关，从晋西北的河曲县石人村，到大青山的苏计沟与区党委的组织部长白成铭同志会合，参加区党委、行署、骑兵支队负责同志的联合会议。会议刚结束，我们正吃饭的时候，就听到机关枪嗒嗒嗒地响起来了。出门一看，人们正纷纷骑着马顺沟往梁上跑。我们幸亏马没有卸鞍子，赶快将机关的文件箱搬上了驮子，解开马缰就上马加鞭，随大家跑上梁去，脱离了危险。事后了解，是哨兵疏忽，敌人骑兵奔袭，已经进了沟才发现的。六月间，我到绥西不到一个月，就赶上敌人扫荡。区党委机关由万家沟转移到石湖休息。还不到两个钟头，绥西专员李维中同志带着警卫员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顺着河沟跑来了。到面前一看，他光脚丫子，脚板被河沟里的石头扎了个稀巴烂，直流鲜血。原来他有个习惯，一上炕就要脱袜子挠痒。这次突然发现敌人奔袭过来，来不及穿鞋袜，跳下炕就

跑，虽然扎烂了脚板，却脱离了危险，真是大幸。在八月间的一次扫荡中，我们转移到离井尔沟不远的五岔沟休息，还未来得及烧点水喝，发现敌人离我们不到三百米的距离了。在这危急的时刻，人的安全是主要的。于占彪同志一面指挥警卫排阻击敌人，一面命令机关人员甩掉所有的乘马，以保证人员的安全撤走。结果人员虽未损失，但领导干部的二十多匹马，连同马上驮着的行李，全被敌人虏获。从此，我们除身上的衣服、袋里的干粮外，几乎一无所有。十月底，区党委社会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王巨德同志，两个秘书丁云、李陟，蒙古游击队长高凤英同志及十余名战士，被敌人包围在万家沟的大火烧，全部英勇牺牲。这是我党坚持绥西斗争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一次。

总之，坚持绥西的斗争是极端困难的，其艰难和残酷的程度，是今天难以想象得到的。而且随着敌人“强化治安”的逐步深入，我们的处境也更加恶化。到九、十月以后，敌人对万家沟、白石头沟、井尔沟等山口封锁得更严密，完全断绝了我们的给养和其它物资的来源，扫荡、奔袭也更加频繁。所以从下半年开始，为了保存干部力量，准备形势好转后进行反攻，绥西多数干部陆续回后方学习去了，只留下区党委组织部长白成铭同志、绥西地委书记杨叶澎同志、宣传部长郑朝珍同志、土默特旗工委书记奎璧同志，以及我和靳崇智同志。当时我是副专员，靳是专署的民政科长。另有一个班的战士，是警卫杨叶澎同志经常到外线活动的。还有归武县政府及归武县的八区政府，仍然坚持在绥西。坚持在万家沟、一前响等地活动的我、奎璧、郑朝珍、靳崇智加上四个勤务员，别的困难不说，吃饭问题就很难解决。经常是吃了今天的，没有明天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九四二年元旦，我们一天都没有吃上一口粮食，幸亏归武县长王威同志在

平川活动，买了几条鱼捎给我们，才没有饿倒。晚上睡觉没有被子盖，要把炕烧得滚烫，才能睡着。睡时，大家还得轮流放哨。

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抗战斗争是极为艰苦的、困难的，但是同志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没有消极悲观情绪。大家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每个人别无他想，有的就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仇恨，为了祖国和人民坚持战斗，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同时，那时环境虽然极端艰苦，但同志们学习抓得很紧，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联共党史》等著作，都是随身带，一有空就学起来。此外，那时党的组织生活也是很正常的，每星期坚持上党课，开党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使有个别同志有点不健康的思想露头，通过教育也就解决了。因而同志们都能在斗争中健康地成长，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的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九八一年七月

坚持绥中抗日斗争的片断

贾长明

一九四〇年六月，晋绥分局党委派我到绥蒙地区工作，任绥中地委书记兼骑兵二大队政委。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在绥蒙区党委的领导下，同绥中人民并肩战斗了三个春秋。当时的一些斗争情况及绥中人民的革命精神，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绥中抗日概况

绥中地区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地区，当时包括陶林、武川、卓资三个县。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的驻军是国民党的部队，“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寇占领了绥、包等城市。傅作义部撤守太原，一九三九年又经晋西北退到五原、临河一带。卖国贼德穆楚克栋鲁普、王英、李守信之流，组成所谓蒙疆政府，公开投降了日本。绥远地区的大片土地沦陷敌手。千里草原被践踏，百万人民遭蹂躏。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挺进绥蒙，开展了敌后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秋，李井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个团，在绥蒙的广大农村和山区，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抗日组织和抗日政权，点燃了绥蒙的抗日烽火。

但是，在汉奸、蒙奸、日特的配合下，日寇加紧了对绥蒙的

疯狂侵略和严密控制，在日寇占领的地方，建立了日伪政权，从军事上、经济上对我实行封锁，并依靠他们所豢养的走狗，大肆破坏我地下抗日组织。到处修炮楼、建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对我抗日根据地经常进行扫荡。日寇所到之处，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血腥地屠杀抗日群众，绥蒙的抗日斗争正处在一个艰苦的时期。

我来到绥中地区时，这里经过大青山支队一年多来的工作，专署、县、区人民政府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由于到处都有敌人活动，工作十分困难，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地方党组织，连各个县委也接不上头，甚至能够站住脚也很不容易，只好跟着部队一起活动，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一切服从于部队。白天行军，忙于作战；晚上宿营，人不脱衣，马不卸鞍，一有情况就立即随部队行动，工作非常被动。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把地方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是摆在我们地委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陶林县委的做法启发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些适应艰苦环境的地下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又重新打开了局面。

到群众中去

当时的陶林县委书记严刚同志，是火车司机出身，从小参加革命，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当我们跟随部队一起活动的时候，他就感到地方工作不能老跟上部队到处转。于是，他脱下军装，化装成老百姓，在群众之中扎下根来。除了几个可靠的熟人知道他的身份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吃在群众家，住在群众家，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做活，晚上走门串户，宣

传群众，组织群众，使陶林县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步地开展起来。

地委及时总结和推广了严刚同志的经验，要求所有地、县机关的党政工作人员，都要用“群众化”（穿上便衣）、“社会化”（在群众中认亲拜友）和“职业化”（以职业为掩护）的活动方式，到群众中去，扎根于群众之中，开展“二线工作”。于是，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更名改姓，编造了一些假的社会关系，分散在群众中间。我就曾化名为兴明子，在薛二沟认了薛海成的儿子做干儿子，还送了礼；我们程专员的爱人张×同志，改名英英，在太二沟认薛寡妇为干妈，还认她的女儿做干姊妹。

这样一来，不但我们牢靠地站住了脚，而且很顺利地开辟了工作。凡是我們深入的地区，都很快地恢复了党的组织，还逐步地建立健全了“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和“锄奸小组”等抗日组织，并依靠这些半公开的群众抗日团体，逐步地扩大了我们的活动范围。到后来，我们不仅在敌我争夺的地区坚持斗争，还深入到敌占区去开展工作。在武川县敌人占领区内，有个村子，过去曾建立过党的组织，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但后来被敌人破坏了。根据斗争的需要，我们决定派新任陶林县委书记高增贵同志去那里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高增贵同志就拜杨家沟木匠老三为师傅，到那个村子以做木工活为掩护，秘密进行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就重新组建了党支部，发展了党员，整顿和加强了各种群众抗日组织。还有一个区委书记也深入到敌占区工作，他会补鞋手艺，就冒充补鞋匠，白天在敌人的据点附近摆摊补鞋，晚上到村里发动群众抗日，为我们最后拔掉这个据点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群众化”、“社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同

群众逐步建立了鱼水之情。我们事事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之所需；群众则处处关心我们、支持我们。当我们物资困难的时候，群众把自己的马匹、粮草送来；当我们急需补充兵员的时候，群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队伍中去；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群众就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地解救我们。有一次，我在米家湾正和雇农老刘在门外谈话，突然来了三个骑马的伪军，大叫大嚷地向群众要粮草。当时我身上还带着文件和武器，一旦被敌人发觉就不得了，我必须马上设法走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叫我给他遛马，群众都很着急，不约而同的走上来，有的装做看马；有的“主动”和伪军拉长道短；有的还“自告奋勇”要领着他们去见村长。目的都是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但敌人非常狡猾，两个去找村长，一个监视我遛马。一些群众便继续同这个伪军拉话，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迅速地将我的手枪和文件转走了。有一个老汉为使我脱身，破口大骂那个伪军，说把他家的粮草给抢走了。这一下激怒了那个伪军，动手就朝老人打来，老人也不示弱，死缠住他不放，非拉他去见长官不可。趁这当儿，另一个老乡和我换了衣服，代我遛马，让我赶快跳墙逃走，使我安全地摆脱了敌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确实很多，使我深刻地感到，真正的英雄是群众，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我们的事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满天飞”战术

那时的地委，除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之外，还要领导群众进行军事斗争。我们既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皇军”，又要对付汉奸卖国贼的伪军，还要防范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国军”。而敌

我力量众寡悬殊，武器装备又不堪相比，处境非常困难，只能利用和发挥我们的群众拥护、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开展游击战争。因为游击战没有固定地点，来去无踪，流动性很大，我们就形象地把它称为“满天飞”战术。称“满天飞”的含义，从对敌人来说，是因为敌人当时的据点星罗棋布，比做“满天星”，我们就把到处活动的游击战，针对性地叫做“满天飞”。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化整为零，到处活动，不主动与敌人打仗，更不能轻易地打硬仗，敌人来了能打就打一下，不得打就躲起来，灵活机动地和敌人捉迷藏。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又拖得敌人晕头转向。一有机会，我们则出其不意地集中兵力，消灭小股敌人。一度搞得敌人惊慌失措，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

二是设点布网，处处皆兵。我们在各村都设有秘密联络点，组织起“村联防”，暗中监视敌人的活动。虽然那时没有电话，但敌人一有行动，各村很快就知道了。这种依靠群众处处皆兵的办法，使我们耳灵眼明，行动主动。

“满天飞”战术，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九四二年秋季，日寇突然调来两、三万日军和伪军，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包围了绥中地区，在沿主要交通线的大村庄、大山头，都驻满了日、伪军，并实行戒严，不许行人来往，还组织搜山队搜查，妄图把抗日力量一网打尽。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主力迅速突围，撤到了敌人包围圈以外的绥南一带；专、县、区各级政府和大队游击队，也被敌人挤到了绥南的蛮汗山区。只有地委、县委和区委及小股游击队仍留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在和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利用日伪矛盾和日军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弱点，依靠群众，发挥“村联防”的作用，同敌人周旋。敌人

经过四十多天的封锁搜捕，始终没有找到我军和游击队，最后只好撤军。所谓“铁壁合围”战术，彻底失败了。

“两面派”政权

在政权建设和斗争上，当时绥中分为三种类型，敌人据点附近的乡政权，主要是为敌人服务，对我们取应付态度；我党政军活动的地方，乡政权是我们的，但必要时也应付敌人；敌我双方争夺的地区，乡政权是两面的，敌人要争取为他们办事，我们要争取为抗日服务。做为我们搞二线工作的同志，把两面政权争取过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两面政权中的主要人员，一般是由当地的地主、绅士等地方实力人物组成。在国破家亡、民族危机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刻，他们出于民族气节，大多数不甘心当亡国奴，愿意抗日。这就是我们能够争取他们的最基本条件。只要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讲清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还是能帮助和支持我们抗战的。即使有少数人觉悟低，只要耐心地进行教育，给他们一些利益，也能为我们办事。只有对个别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经教育不改的，才采取惩罚措施。总之，我们根据具体情况，主要通过说服教育，辅之以其他办法，把两面政权逐步地争取过来，为我们服务。

陶林县有个叫圪都尔户的村政权，是“两面派”政权，有一条公路从那里通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敌我双方都在激烈争夺。我们为了控制这个村子，几次建立过村政权，但都被敌人破坏了，连村长也被抓走。过了一段时间，敌人在那里搞了一个政权，让韩包琪当了村长。这个韩包琪在外面做过事，见过一些世面，办事圆滑，很有手腕，据了解他多少还有点民族自尊心。开

头我们去试探了几次，他还比较热情，表示愿意同我们接近。鉴于这种情况，为了争取他，我们承认了这个政权。后来，经过反复做工作，他基本上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可以说主要是给我们办事。敌人来了，由韩包琪出头露面应付一下；我们去了，韩包琪则同群众一起，积极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有一次，我要更换“良民证”，没有像片，需要马上拍照，那时只有敌据点三道营有照像馆，但到那里出入检查很严，韩包琪把我化装成老百姓，亲自领着我去了，又安全地把我带回来。

“两面政权”，在绥中地区是很多的。在我们收税、收公粮、征集兵员和掩护我方工作人员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绥中是民族杂居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是一项重要任务。那时，我党非常重视这一工作。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总的精神是除了孤立和打击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要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共同抗日。绥中地区的统战工作，主要对象是蒙族人民和敌伪军政人员两个方面。

在蒙族人民工作方面，由于受国民党搞大汉族主义、歧视蒙族的反动政策的影响，加上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王英之流的挑拨煽动，有的蒙族人民对我们很不信任，甚至有对立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深入到蒙族群众中，做

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大讲我党反对大汉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的政策，揭露卖国贼德、李、王之流的罪恶。另一方面，我们实行了一些尊重蒙族人民风俗习惯，保护蒙族人民利益的具体政策。例如对纯蒙族地区不征税，不收公粮，不征集兵员，不侵犯蒙族人民的利益。对上层人士，除极个别顽固分子外，我们都尽量争取，指明他们应该走的道路，欢迎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广大蒙族人民逐渐地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他们抗日。因而相互间的关系逐渐亲近起来，按照蒙族的习惯，彼此经常互赠礼品，赠哈达，表达了相互爱慕之情。许多中上层人士也同我们有了较多的来往，并愿意给我们办事，支持我们抗日。在纯蒙族的大南沟村有个村长，名叫理格金香鸟，与伪蒙疆政府有联系，可以随便出入敌占区，他利用这种方便，为我们搞过不少布匹和药品。在我们控制区的转山子村，有个蒙族知识青年叫卜布，汉名韩文彩，他的舅父叫毕里共，在敌据点任职，相当一个七品官，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了争取这个人，我同卜布结拜为兄弟，住在他家里，向他宣传抗日道理和党的政策，又通过卜布说服他的舅父。后来，毕里共逐步觉悟了，还偷着回家接见了我们，表示支持我们抗战。以后，卜布家里成了我们活动的据点。大青山支队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到过他的家里，并和毕里共有过交往，从他们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

在对敌伪军政人员工作方面，我们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和抗日前途，争取他们不要为敌伪政权卖力。他们很多人的家属住在我们控制区内。我们对其家属，不歧视、不侵犯其利益，还尽量保护他们的安全，并通过家属捎话、带信，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为了家属的安全并给自己留条后

路，因此，很多人听了家属的话，不再做坏事了，只是暂时呆在敌人那里混日子。有的还同我们秘密联系，给我们办点事。有个叫米庚为的地主儿子，在敌据点里任警备队长，长期不敢回家，怕我们杀他。我们向他父亲讲明政策，通过其父做工作，才敢回来。他父亲领着来见我，一再保证不再做坏事，还要立功赎罪。以后他老实多了，还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一九四二年春，一天晚上，我们为了争取国民党的中上层人士，在圪都尔户村请了一次客，客人中有两个总乡长，六个小乡长和傅作义的一个团长。我方作陪者有我，地委组织部长曹振之，总务科长刘金虎。宴会上，那个团长和一个姓石的乡长，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解答，如汪精卫投降日本是曲线救国；共产党、八路军是要赤化中国等等。曹部长文化较高，马上站出来严肃地逐条据理反驳，最后把他们辩服了。会毕我送他们一些宣传品，带回去张贴了。以后，我们几次通过从三道营到福生庄间的铁路时，他们再不找麻烦了。那个姓石的乡长，还跑到厚和市（今呼和浩特）为我们买了油印机和布匹。

由于我们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各族人民，各阶层爱国人士，都争取和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逐步地发展壮大抗日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

防奸除奸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抗日力量，利用其特务机关，千方百计地破坏我抗日组织，并利用暗藏的奸细、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成积极的面貌，混入到

我们的党里或抗日团体中，进行破坏捣乱。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必须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坚决打击那些反动分子。因此，我们非常重视防奸除奸工作。在各抗日组织和抗日团体中，都建立了防奸除奸小组，发现坏人，则毫不手软地予以狠狠打击。

一九四二年冬，粉碎了日寇的“铁壁合围”扫荡以后，伪蒙疆政府派防共第一师进驻绥中。他们变换了疯狂扫荡的手法，派遣特务、叛徒打进来，用金钱、美女和封官许愿等，收买我方人员。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斗争的考验，向敌人屈膝投降，成为可耻的叛徒。一天晚上，圪都尔户村支部书记叛变了，带领伪军，突然包围了十多个村庄抓我们。在群众掩护下，我们安全脱险。一个叫高洪的工作人员也叛变了，出卖了我们地委武装部长兼游击大队长张志远同志。地委几名主要负责人的活动范围也被敌人掌握了，出布告缉捕我们。扬言抓到贾长明赏一千五百元金票，给个大太君做；捉住刘金虎，赏一千元金票，给个小太君做。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一、整顿和加强防奸除奸小组，清除可疑分子和动摇分子，开展反破坏斗争；二、坚决处决罪大恶极的叛徒、汉奸。我们首先巧妙地利用反间计，把叛徒高洪除掉了。办法是通过地下工作关系，向敌人散布说高洪是假投降，暗地给八路军办事。敌人本来疑心很大，于是，三人成虎，就信以为真，警备队就把高洪拉出去枪毙了。这给叛徒、汉奸敲了警钟，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除奸斗争中，许多同志为了党和民族利益，忍痛割爱，大义灭亲，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优良品质。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共产党员，他的一个亲属是敌特，曾多次向敌人告密，破坏过抗日组织。当他知道这些情况后，义愤填膺，立即向

我们报告。以后他还帮助我们处决了这个特务。

以上所叙，是我在绥蒙区党委领导下，在绥中坚持抗战的一些片断。坚持绥中抗日斗争的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斗争中使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同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学会了骑马打游击，摸索到了一些地方工作的经验，领略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斗争逼出来的，也是绥中人民教会的。我将永远铭记绥中人民为抗日斗争所做的重大贡献。在那难忘的年代里，绥中地区专员程仲一、骑兵团长王巨光等同志，为了民族的利益，血洒疆场，骨埋塞外，为革命献出了一切。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坚持绥中、绥南抗日斗争的回忆

宋克缙

大青山根据地的创建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青山支队，于1938年10月开创的。大青山支队以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为主体，并由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抽调干部组成的大青山动员委员会总会以及晋绥总动员委员会所属的第四支队（由太原市成城中学师生组成）所组成。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1938年8月由山西五寨县出发，途中与日本鬼子经过多次战斗，于10月初到达大青山，开辟了绥南、绥中、绥西等抗日根据地。当时715团团团长是王尚荣，政委是朱辉照，参谋长是李文清。大青山总动员委员会由武新宇任主任，组织部长是武达平，宣传部长是张寒石，分配部长是乔峰山，武装部长是李维中。第四支队支队长是刘庸如，付支队长是宁德靖，政治部主任是曹振之。

十月初到达绥南（现京包铁路以南蛮汗山地区），除留下少部分部队和干部外，主力即开赴绥中地区（现京包铁路以北地区），不久又开辟了绥西地区（现呼和浩特市到乌兰花公路以西地区）。支队司令部及总动员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即住绥中地区。在绥中先开辟了武川县二、三、四区三个区，组成了区的动员委员会（以下简

称动委会)。二区动委会主任姓吕，此人到大青山后不久因怕苦逃回老家。三区动委会由郭英任主任，龚仁寿任第一副主任，我任第二副主任兼分配部长，樊建斌任第三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分配、武装等部。郭英、樊建斌都是当地的开明绅士。我们为了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因此注意了对他们的团结工作。郭英为了对付土匪保卫乡里，曾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民团，自任团长。三区动委会成立后，他就把民团全部交给了动委会，改编为三区动委会直属游击队。他年老多病，不久就病死。区动委会除分配部由我兼管外，组织、宣传、武装等部都由当地的三个中学生担任。区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扩大补充抗日军队，组织地方武装，清剿土匪等。两个多月后，动委会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

1939年春，组成了县、区政府，根据地也有所扩大，龚仁寿调陶林任县长，我任武川县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武川县没有成立县政府，区政府仍直属总动委会领导。本年二、三月间，李井泉政委和武新宇主任调回晋绥，715团除留部分部队和干部外，主力即离开了大青山。四、五月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派白如冰为绥察区党委书记，白成铭为组织部长，于占彪为武装部长，组成了区党委，并派王建弼为大青山总动委会的副主任。不久武达平任绥中专员，武川县仍没有县政府。绥南地区由程仲一任专员，绥西地区由李维中任专员，托和清地区由杨国兴任专员。1940年春，我即调任陶林县长。五、六月间，中共晋绥分局派张达志为骑兵支队副政委，苏谦益为绥察行署主任，带领一批干部来到大青山。程仲一由绥南调任绥中专员，我仍任陶林县长。武川县分为东、西两县，李康为武东县长。武东县归绥中管辖，武西县归绥西管辖。绥中地委，由贾长明任地委书记，曹振

之任宣传部长，马国栋任组织部长，张志远任武装部长。陶林县委由高增任书记，王云任组织部长，冯铭任宣传部长，我兼任武装部长、县大队长、县政府党团书记。

李井泉政委调回晋绥后，姚喆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这时骑兵支队已发展成为三个团，骑兵一团活动在绥南地区，由邹凤山任团长；骑兵二团由王先光任团长，王牺牲后由李国良任团长，活动在绥中地区；骑兵三团由黄厚任团长，后由蔡久任团长，活动在绥西地区。

清 剿 土 匪

日本侵占绥远后，地方盗匪蜂起，一些国民党散兵也沦为土匪。群众怕土匪打骂、抢劫、奸淫、因而逃匿深山。1938年秋，我军到达大青山以后，看到很多土地荒芜，村庄冷落，满目凄凉景象。因此，我军每到一地，先得到山里寻找和动员群众回家。天气寒冷，老弱妇孺饱受冻饿之苦。土匪专门以扰害地方为能事，群众惶恐万状，社会秩序混乱。土匪有十几股，大股一千多人，小股也有二、三百人。他们每到一地，进村之前，先来个大包围，抓到群众以后，便打骂搜身，强迫男人给他们遛马、铡草、喂马、做饭。年青妇女则被他们轮流奸污，有的女孩子被奸污得起不了床。这些人都有两杆枪（步枪和大烟枪），他们行起军来，更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当官的有空马多匹，专备驮抢来的财物和供奸淫的妇女，或是绑票来的财神爷（把有钱的人绑来，要他的家人交钱赎人）。在马身上唱起话匣子，就走就唱。有些人嘴里还唱着淫词乱调，队伍拉得很长。我军所到之处，群众纷纷向我们诉苦，请求清剿土匪。我军为了解救群众，使群众

能安心生产和生活，安定社会秩序，随即展开了清剿土匪的斗争。群众高兴异常，积极向我们报告土匪的活动情况。

1938年冬天，有一次我们在五塔布的铁圪旦宿营，群众跑来向我们报告说：有一股土匪约五、六百人，正由山后向我们驻地袭来。而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多人，要对付五、六百土匪，力量悬殊很大。但是时间不允许再犹豫，我们随即将队伍拉上山头，控制了制高点，正在此时，有一个老乡气喘吁吁的向我们阵地跑来，说他昨天去二区某村探亲，被土匪抓住，打着叫给喂马、做饭，听土匪们说，他们队伍里老油子（就是当土匪多年的人）最多，有什么“当一面”、“不脱空”的外号。意即这些人是神枪手，一支枪可以抵挡一面，百发百中。但是土匪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最怕死，只要你们拦腰对他们突然猛冲，一定能把他们冲垮。我们就用了这一战术，果然生效。在突然猛冲下，土匪十分惊恐，同时我们又虚张声势地高喊，二连向左，三连向右，四连包抄。就这样把这伙土匪冲了个七零八落。打死了十多人，缴获了部分枪枝马匹，解救了十多个群众，其余土匪四处逃窜。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匪患基本平息。

反 顽 斗 争

1939年春，国民党见我军在大青山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巩固起来，便从五原、临河一带派鄂友三带骑兵向我绥西、绥中、绥南解放区侵扰。他们不抗日，专门与我军搞摩擦，争夺地盘，凡我们成立县、区政府的地区，他们也派县长、区长向我军收复所谓“失地”。我军活动的地区，也是他们活动的地区。鄂友三的骑兵就住在绥西，派乔汉魁为绥南地区专员。

绥中地区虽没有派专员，但派赵淑普为陶林县县长，带领二、四两连自卫军到绥中地区活动，同时代替武川县政府管辖武东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我根据地内活动的军队，号称自卫军。自卫军是国民党在抗战前扩充的保安队和警察。抗战爆发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包头，他们即退往河套，现在又改编为自卫军重返旧地。他们几个月的活动，对群众扰害很大，群众称他们为二土匪。这些人都是双枪将（步枪、大烟枪），他们祸害群众，与我军搞摩擦，群众纷纷前来诉苦，要求为他们除害。当时我带武川县三区游击队一百多人，配合我骑兵支队主力在东河子乡前六号村等地，将自卫军十二团二连全部歼灭。在我陶林县长龚仁寿协同下，我骑兵支队二团的一部，拟围歼国民党陶林县县长赵淑普及其所带部队，结果赵淑普闻讯撤离，自卫军四连受重创。反顽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大青山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

反顽斗争胜利以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巩固和发展。群众基本上被组织起来，生产和生活也比较安定，抗日民主政府的基层组织也建立起来，建立了民兵和游击小组，很多乡还建立了两面政权（表面上应付敌伪，实际为我工作）。陶林县当时组织起来的游击小组和民兵有二百多人，民兵和游击小组的任务是除奸、放哨、侦察敌情、传送情报、联络、伏击敌人以及破坏公路电线、配合游击队袭击敌人等活动。做得特别出色的是除奸活动，不管日寇的密探特务如何乔装打扮，都逃不脱人民的巨掌，尤其是遭过敌人烧、杀的村庄，群众对敌人更是恨之入骨。有的甚至用石头把密探、特务的头打碎，有时群众怕我们实

行宽大政策，竟把经过我们教育释放的特务处死了，我们还不知道。日寇见我根据地开始巩固，便对我根据地军民展开了“扫荡”。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者就把大青山根据地划为“防共第一线”，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一齐进攻的所谓“总体战”、“治安强化运动”、“联环保甲制”、“联保联座”等反动措施。1941年初夏，日寇又在大青山周围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建立了大批据点，仅从归绥到陶林、武川二百多里的地区内，就增设了据点几十个。如陶林五区的拐角铺，武川三区的大滩、恒巨川，四区的土城子等地。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对我根据地实行残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村并乡，制造无人区。如对绥西的井尔沟一带就是这样。敌人妄图消灭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但是他们只能是妄想，敌人虽建立了那么多据点，但除拐角铺驻有伪蒙军李守信部第八团四、五百人外，其他很多据点只住几十个伪军或警察。他们很害怕我们，大多只敢在据点附近活动。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争取下，很多伪军和我们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拐角铺的伪蒙军团长就同意给我们送情报，卖子弹。当日本鬼子强迫他们对我军进行扫荡时，他们就在离我们住的很远的地方打枪，给我们报警，让我们躲开。有一次，我们在圪都户尔乡的牛扣哈达村宿营，日本鬼子和伪军出发扫荡，伪军在灰腾梁上就发现了我们的哨兵，即鸣枪报警。我们随即撤离。当我们的队伍快到圪都户尔乡的土围子时，伪军八团正在圪都户尔的围子，他们立即朝天打枪，也不向我们追击（当时我们只有一百多人）。我们当即转到铁路附近隐蔽了一天。与我们有关系的伪军朝天打枪后，趁空把子弹埋在附近的土里，让我们按事先约定的记号去取。我们子弹的来源，除向敌人缴获或用大烟土向伪军购买外，这也是来源之一。

在党中央、毛主席、晋绥分局、绥远区党委的领导下，大青山的党、政、军、民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频繁扫荡，根据地逐步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从1940年春，在绥中区南面从平绥铁路沿线的旗下营、平顶山、三道营、福生庄、灰腾梁一线，东面从平湾子以东地区，北面从陶林北区的土城子到后草地，东北面直到察哈尔省交界处的商都县（解放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我们都可以进行活动。西面隔归绥到乌兰花的公路与绥西区相接，西北部可活动到乌兰花、四子王旗一带。

夜袭三道营

为了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41年初夏，我们决定袭击平绥铁路上的三道营火车站。参加袭击的有绥中专署，陶林县政府的武装和游击队，还有地委武装部长张志远同志，共一百多人。三道营车站西距归绥六、七十公里，距旗下营车站十五公里，东至卓资山车站三十公里，离福生庄车站三十公里。站内驻有日军三十多人，站长是日本人。还有伪军六、七十人，驻在距三道营车站半里远的一个有土围子的大院里。

三道营的伪军与我们也有一点关系，为了进一步分化日军与伪军的关系，我们决定只袭击日军，对伪军只派游击队进行监视，以便进一步争取他们。对日军的袭击，决定在夜阑人静以后进行。这天我们进到大毫赖乡的一个山村隐蔽下来，该村离三道营车站十多华里。为了准确掌握敌情，当天就进行了三次周密的侦察，每次侦察都由游击组长边伍同志进行。因为他对三道营车站很熟悉，同时他表弟是三道营火车站的工人，管扬旗的。在黄

昏的一次侦察中，边伍同志把他表弟也带来同我们见了面。他向我们介绍了三道营车站的详细情况：三道营车站的站房一进去有个小过道，西面一大间是通铺大炕，日军的两个班住在这里，为了搞好内务，他们每天把枪都挂在墙上。东面一大间，分里、外屋，外间是站长的办公室，里间是寝室。还说：因为他是铁路工人，进出车站很方便，晚上八点多钟，有一列从北平到厚和（即今呼和浩特市）的火车，在三道营只停五分钟，过去以后直到早晨才有火车开进。在他临走之前我们让他等八点多钟火车过去后，再去车站侦察一次，看敌情有什么变化。九点钟过后，我们在三道营北山附近的山洞隐蔽，等他来向我们作最后一次敌情侦察报告。是晚八点多钟，我们集合出发，九点多钟到达了约定地点。一会儿，他同边伍同志来了，据谈敌情没有变化，日本鬼子在九点半就都睡了，步枪共三十二枝挂在墙上；日本站长有一枝王八盒子（日本式手枪）。当他报告完情况以后，我们随即按预定的计划进行部署：由张志远、程仲一、我和游击队两个排长，还有县武工队的队员邢三，六人组成了偷袭领导小组，由张志远同志任组长；由成风涛同志带十多个游击队员在车站旁接应；县游击队长刘存禄，带领游击队设伏在伪军驻地通车站的路上，以防万一；尽可能不打枪或少打枪解决战斗。万一被敌人发觉车站打响了枪，伪军知道后，上了围墙时，游击队可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我们是八路军，只打日军，不打你们，要他们老实地呆在围墙里边，不许乱动。

我们随即由铁路工人带路出发了，当他（边伍的表弟）把我们带到三道营车站日军住房西侧时，为了不使他暴露，就再没让他露面。我们很快进入了车站走廊，先去收缴西房内日军两个班的枪。当进入日军的住房时，他们早已脱光衣服睡下了。我们六

枝驳壳枪一齐对准他们，并喊不许动，举起手来，都到墙角集合。我们四个人上到他们的铺上，从墙上取下所有的枪枝子弹抱到走廊，我们举枪退到门口监视他们，三个人往外运枪枝弹药，张志远和邢三随即转到东面站长室。开始站长室里间的灯光还亮着，此刻就熄灭了。我与程仲一等三人把枪枝子弹送出去交给了成风涛同志后随即返回，听到站长室内喊了一声，打了一枪，我们从喊声处望去，只见一个日本鬼子朝我们扑来，我与张志远同志随即一闪身，向扑来的鬼子打了两枪，鬼子大叫一声倒地死去。我们从他身上取下一枝王八盒子。这个鬼子是军官装束，肯定是站长了。

这次战斗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只打了三发子弹，打死日本站长一人，缴获日造三八大盖步枪三十二支，子弹数千发，我们没有伤亡。撤退时，伪军哨兵还对我们刘存禄队长很客气地说，你们走了，再会。

当我们远离三道营车站后，伪军才鸣枪数百发，然后听到敌人的铁甲车向三道营方向开来，并打炮十数发，紧接着又是密集的机枪声。我们凯旋回到大毫赖乡后，稍稍停留，估计敌人要来报复，随即分别隐蔽。我游击队和绥中专署的同志越过旗下营到陶林的公路，到六、七十里外的聚宝庄后边，一个山村里宿营，并在这里休息了三天。以后听说：厚和市的敌军指挥部在接到三道营车站遭八路军袭击要求派军队迅速增援的电话后，一个多钟头，铁甲车才从厚和市开出来。这时我们早已远走高飞了。第二天敌人又调集了一千多名日、伪军，在大毫赖乡，灰腾梁一带搜索扫荡了三天，一无所获，扫兴而归。

一九四二年的反“扫荡”斗争

日寇根据德、日、意法西斯军事同盟的需要，配合希特勒进攻斯大林格勒和外高加索，企图北上从东面包抄莫斯科。日寇准备一路从我国的东北境内进军西伯利亚；一路从大青山地区进攻蒙古共和国，然后与德军会师于莫斯科城下。因此，我大青山根据地成了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加以扫除以解后顾之忧。

日寇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于1942年七、八月间，调动了三万多日、伪军并配有机械化部队，对我大青山根据地发动了空前的大扫荡。敌人来势很凶，把重兵集结到我绥中地区武川、陶林一带，实行大规模的所谓“铁壁合围”、“篦梳式推进”的“扫荡”。在山前山后布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安下了大量的临时据点。靠山的村子都驻扎了军队，没有房子的地方，搭起了临时帐篷驻守。甚至重要的山头上也建立了临时据点。封锁了通向公路的山口，用轻重机枪组成了交织火力网。在重要据点设置了炮兵阵地，配备有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迫击炮、小钢炮等。据点与据点之间，都有巡逻队来回巡逻，用无线电互相联系，把每一条进出根据地的道路和山沟都严密地封锁起来。然后，敌人以密集的队形把根据地分片包围、搜索、压缩，甚至一树一木，一条石缝都成了敌人的搜索目标。晚上敌人在通向山区的主要山口设伏，妄图一网打尽我抗日力量，摧毁我根据地。这对我根据地党、政、军民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

但是穷凶极恶的敌人根本不可能懂得，他们所谓的“铁壁”，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面前，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当敌人

不可一世、蜂拥而来的时候，我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群众组成游击小组，侦察警戒，传送情报，打冷枪，扔手榴弹，惊扰、伏击敌人。

在绥中地区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我们根据侦察和群众送来的情报，冷静地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发现敌人在边沿地区据点附近防守有疏忽的空隙地方，我们随即乘机转移到旗下营车站以北的山区进行隐蔽。我陶林县政府机关和县游击队骑兵一百多人，白天上山到正沟、麒麟沟一带隐蔽，晚上下山到离旗下营火车站只有七、八华里的西坡子村吃饭睡觉，准备第二天上山带的干粮。我们早就把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争取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暗中为我们工作，通过敌人的联络员（实际是我们的情报员）向敌人送假情报，造成敌人的错误判断。这样，日本鬼子的部队在我根据地内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弄得晕头转向，处处扑空，而我们对敌人的行动却了如指掌。我们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下到西坡子村时，群众纷纷前来报告本日所了解的敌情。旗下营镇公所和伪保安队内都有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员，送来了敌人当天活动和宿营情况的报告。几方面的情况对照之后，再以我们的判断分析，每天对敌情都能洞若观火，确定我们的行动。就这样我们在这一带隐蔽了十多天。

大青山七、八月间正是雨季，气温骤降，阴雨连绵，衣服和鞍具全部湿透，有时雨下大了，雨水顺着身体往下流，每天黎明冒雨上山隐蔽，寒气侵骨。我们在半山腰发现一个石洞，可容纳二百多人，大家便把马放在树林内隐蔽，只留下少数同志看马，其余的人都到石洞内避雨。在此期间，了解到绥中专署的同志在敌人开始“扫荡”时，在我们转移的前两三天，骑兵支队司令部和二团，在张达志政委的带领下，已从旗下营附近突围出去了。

只有绥察行署和武川县、区政府的同志还没有突围出去。当敌人知道我骑兵支队司令部和骑兵二团突围出去以后，加强了警戒，旗下营伪军中与我们有关系的人送情报劝我们赶快突围，并提出要从旗下营围墙外通过，他们一定只朝天打枪，保证我们突围出去。我们在准备突围。但绥察行署苏主任和武川县、区政府的同志下落不明，我非常着急，便派人四处侦察寻找。一天得知，八洞梁山上有我们的哨兵隐蔽，但不知是哪一部分的。这天晚上我们在聚宝庄宿营，进村后，群众向我们报告说：离这村八里多路的大同营子住有敌人炮兵五百多人，西罗家营子住有敌骑兵五百多人，拐角铺伪八团仍未动，上、下官道住敌步兵三百多人，敌人每天搜山，明天可能到我们村来。为了弄清八洞梁上的隐蔽哨是我军那一部分的，当夜即派侦察员侦察联络，据侦察报告就是行署，并带回了苏主任写给我们的纸条，上面写着：“老宋，天黑后希到李天寺窑子集合，以便一起突围，余面谈！苏。”天大亮后，我们把马放在马群里，交由老乡带到一个山沟里隐蔽放牧，武装同志都到山上树林里隐蔽。太阳出山时，有敌骑五百多人经聚宝庄村向后山去了，不大一会儿又有敌三百多步兵到聚宝庄村内，并沿山搜索前来，我们就在树林内与敌人捉开了迷藏，敌人向东，我们就向西，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敌人才撤出沟外。傍黑我们来到李天寺窑子，与绥察行署会合了。为了迷惑、调动敌人，我们在离开聚宝庄前告诉群众天快明时向敌人告密，说我军有数百人在他们村待了半夜多，天快明时向麒麟沟、正沟、旗下营北山一带去了。第二天敌人果然被调往正沟、麒麟沟一带搜山去了。我们与行署安全地又隐蔽了一天。正沟、麒麟沟在聚宝庄大沟的西面大山以西，李天寺窑子在聚宝庄大沟的东面大山以东，中间隔了好几座大山。

我到达李天寺窑子进入苏谦益主任的住房时，看到苏主任正与李康、成风涛、田心、夏阳、吴广荣等同志围座在炕上研究敌情，他们见到我来十分高兴。我向苏主任汇报了几日来知道的敌情和绥中专署、骑兵支队司令部和二团都已突围出来的消息。敌人这次调集了人马号称几十万人，并扬言要把大青山的八路军肃清。看来鬼子是要大规模地、残酷地、连续不断地“搜山”、“扫荡”，短期内不可能结束。苏主任沉静地对我说：“为了执行中央的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战斗，我们决定突围，打出去就是胜利。”关键是什么时候突？从什么地方突？如何突出去？如果当晚突围，武川县和三区政府已分散的干部尚未集中，可能会遭受损失，如果再等一天，可能错过有利时机。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苏主任最后决定再等一天。当晚先转移到高木窑子，明晚突围。这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密集队形的搜山队伍，正在向我们所在地移动。如果暴露目标或明晚不出重围，就有全军复灭的危险。为了突围成功，领导同志再三嘱咐，要严密隐蔽，绝对不能暴露目标。如果敌人过路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按兵不动；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扑来，就和他决一死战。同志们都很慷慨激昂，时刻准备着战斗，时刻准备着牺牲。第二天细雨蒙蒙，七、八里外都是敌人，下午有一股日本鬼子从高木窑子北山上经过，这时大家都非常紧张，由于隐蔽严密，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各处人员都已集合齐全，马匹也都备好，并派出了侦察人员。突围的准备工作在积极进行。

两天来，给养已经绝断，有的战士挖生土豆吃，有的挖野菜吃，问题是今晚要突围，不吃点东西怎么能行呢？大家集中了粮袋里的最后一把炒面，干部让战士，战士让领导，领导又让给了

伤病员。正在这艰难的时刻，高木窑子的雇农主动地把他们仅有的两只羊支援了我们。大家分到一小块羊肉，分着喝了一碗羊肉汤。这真是情深似海，军民团结一家人，阶级兄弟心连心。

就在这严重关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塞北工委时刻惦念着我们，四处侦察探听我们的消息。

夜幕来临，雾气迷漫，正是有利于突围的好时机，突围的队伍由高木窑子的青年高四带路，静悄悄地向大西沟奔去。当尖兵班搜索着进入了向死寂般的残破村落大西沟村时，突然，一只狗汪汪地叫了几声，紧跟着附近的狗也乱叫起来。村里的地下工作人员闻声出来探密，他告诉我们，沟口子有日军的两个军事哨所，配备有轻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沟口拐角铺村驻伪蒙军两个骑兵团，严密封锁，由此突围，不易通过。这一带属陶林县五区，地形、群众我都比较熟悉，因此我主动向苏主任提出尖兵班由我带领，指挥突围。经苏主任同意后，我即带尖兵班先向西南方向折去。翻过山岭，奔向铺格庆村，进村以后，群众告诉我们，这村口两边山上也有两个敌哨所，驻着日军两个排，架着轻重机枪。山沟窄狭，敌人火力强，由沟口冲不出去，从这里突围又不行，究竟哪里才是突破口？我们只好在村里停下来研究敌情。正在这时，这个村的共产党员、游击小组成员王三娃侦察敌情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向西翻过山去瓦窑沟口只住敌人一个排哨，沟口比较宽，敌人戒备比较薄弱。东罗家营子驻伪军一个骑兵团，上下官道村由敌人炮兵驻守，这沟口和东罗家营子的公路上只有鬼子的三个游动哨。根据王三娃提供的这些情况，大家作了研究分析，认为东罗家营子虽有一团伪军，都是大烟鬼，如果突然发生情况，他们夜间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一出沟口，从东罗家营子村外越过旗下营至陶林的公路，就进入了直通平顶山的大

路，上、下官道村的敌人炮兵离我们较远，夜间没有目标，炮兵也无法发挥威力。经研究后决定，我带领尖兵班为前导，一排长带领一个排一挺机枪，打击敌人的排哨；薛连长带领一个排一挺机枪，等打开突围缺口以后，先越过公路设伏在东罗家营村东，以防伪军出动。行军次序是：尖兵班为前导，接着是陶林县游击队，行署和县、区政府工作人员两个班殿后。不许掉队，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让马叫，听到前面打响，立即向前冲。规定第一集合地是平顶山，第二集合地是蛮汗山十八台。请王三娃和补格庆村的贫农张千岁及常家沟的王月明分别带路。

时近午夜，经过侦察敌情没有变化，队伍随即出发，尖兵班一出沟口，迂上了敌人的流动哨，我们的战士先发制人猝然攻击，突围的缺口打开了。紧接着薛连长带领一个排一挺机枪，越过公路埋伏在罗家营村外的田坎里。我随即高喊，同志们冲啊，霎时我们阻击敌人的机枪也猛烈射击。打得鬼子手忙脚乱，晕头转向，在尖兵班的带领下，我大队人马紧紧跟上，经东罗家营子村外向通往平顶山的大路冲去。一口气奔到第一集合地平顶山。稍稍休息和整理清点人数以后，越过了平绥铁路，安全地到达了蛮汗山地区，与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部胜利会师。这次突围战斗，我们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人掉队，只丢了一匹空马。

突围后的第三天，敌人才匆匆忙忙派出了两千多人尾随迫来。我骑兵支队司令部在归绥（日伪时改称厚和市）通往凉城县的公路上的袋形山区——卧牛山布置下伏击阵地。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决心让日本侵略者尝尝反“扫荡”的味道。当鬼子大摇大摆地进入我伏击圈时，所有的轻重机枪、六〇炮、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猛射。战斗到黄昏，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之后，我军全部安全转移到托、和、清地区。不久，我们都撤到了偏关。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

我们突围以后，敌人又大肆搜索“扫荡”了好几天。这个时期是大青山和蛮汗山地区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敌人的所谓“治安强化”更加紧了，严格实行了保甲制，联保联座。小股队伍的存在也十分困难。敌人在长城以北，从绥南的托克托县黄河边到同蒲铁路，挖了一条所谓“防共沟”，以防止我军再向绥中、绥南地区挺进。这条沟有一丈多深，八、九尺宽，每个大路口都筑起了木栅栏，设卡盘查。敌人的这一措施，也把绥南和偏关后方领导机关隔绝起来。敌人对绥南地区则更加紧了频繁的“奔袭”、“扫荡”。这时，我骑兵支队一团仍然坚持在绥南和日伪作艰苦卓绝的残酷斗争。

1942年10月间，塞北工委派绥中专员程仲一，武川县长李康和我，带领游击队共三百多人，又向绥中地区挺进。在出发之前我们做了准备工作，做了三架木梯子，有一丈多长，二尺多宽，上铺木板，备作通过封锁沟使用。几天以后，我们到达了绥南地区，在绥南活动了一段时间，了解绥中的情况。这时我突然患起了急性伤寒症，高烧到40度，昏迷不醒，无法行军。把我安顿在凉城一区的村庄隐蔽治疗；程仲一和李康带领游击队越过平绥铁路，挺进到大青山绥中地区。几天以后，在夜晚的行军中，他们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李康同志当场牺牲，游击队被打散，程仲一同志带少数人跑出来。到绥南以后，把被打散的游击队收容起来，即返回了晋西北偏关塞北区党委。又过了一个多月，待我病稍好后，区党委派骑兵二团李国良团长带人把我接回了偏关县。

1943年春，绥南地委和归凉县政府一起在抢盘山一带遭到了驻凉城牛家川的防共第一师的袭击，（该师都是骑兵，有三个团七百多人）损失很大，地委书记崔岩同志当场牺牲，县长袁明同志受伤后被俘也牺牲。当时绥南还有托和清、丰凉、归凉三县，干部、战士当时的思想十分混乱，战士开小差逃跑回家的很多，有的干部对能不能坚持住根据地产生了怀疑动摇。

1943年三、四月间，塞北区党委书记高克林，绥察行署副主任苏谦益，分别找我谈话，要我中断当时参加的整风学习，派我到绥南区去，坚持那里的抗日工作，高、苏把绥南的困难局面都向我谈了，并谈了中央指示精神：“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高克林书记还把最近中央给区党委发来的指示电报给我看，主要精神是：“想方设法把那里的工作坚持住，这样就是把抗日的一面旗子插在那里，只要能坚持住就是胜利，到反攻时号召力量就很大。”我接受了区党委对我的指派。两三天后，由骑兵二团李国良团长派人护送我到绥南去。到了抢盘山东沟村，与归凉县一区区区长苏珍同志取得了联系。由于敌人的封锁，绥南地区与塞北区党委之间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的指示是十分苦恼的。为了安定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情绪，我活动于归凉县一区、五区、四区之间，这个时期的环境更加艰苦了。

1943年11月间，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简称国、日合流）合作起来专门对付我军。国民党从河西派乔汉魁为绥南地区负责人，住在牛家川防共第一师的师部。防共第一师不仅受日本人的指挥，同时也受乔汉魁的指挥。抢盘山南山脚下有一个大地主叫郝禄，既是日本伪大乡长，又是国民党凉城县党部书记长。凉城县的日伪保安大队长王凤伍，又是国民党凉城县的保安大队长。他们

利用本地人亲属关系，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我游击活动的抢盘山中心地区很多村庄内秘密发展了六十多个情报网，侦察刺探我游击队特别是县级领导机关的活动情况，企图把我领导机关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日寇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加紧对我们进行招抚诱降活动。一区付区长贾海功，就是在敌人这一攻势下投敌叛变的。这时敌人的活动搜索更加疯狂，环境更加艰苦恶劣了。逼迫我们经常在上山隐蔽，几天吃不到一顿饭，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因此很多人身上无力，一坐下就不想起来，一到黄昏眼睛就看不见了，行动起来十分困难，都用木棍互相牵着走。时时提防不要跌下山沟。

一次遭敌袭击的战斗

1944年二、三月间，塞北区党委从偏关派程忠群同志到绥南，传达区党委的指示，并准备调一些同志同他一起回偏关参加整风。程在1942年撤退以前，曾在绥南地区任过归凉县县委书记，对群众和地形都比较熟悉。我和程忠群从北四区到五区，商量好要参加整风的四位同志于四月间集中抢盘山，准备去偏关。一区付区长贾海功也在我们商定的四人之列。当天因没找到区长苏珍同志，晚上只找到了贾海功。在谈话中发现他思想发生动摇，但错误地认为他还不至于马上叛变，对他放松了警惕。第二天太阳将出山不久，敌人突然奔袭过来，我们随即抢上山头，展开抵抗。这时，敌人已将我们三面包围。我即指挥游击队分别抵抗，等我回过头来再找贾海功时已不见了。敌人都是骑兵，有防共第一师的两个团，和王凤伍带的凉城县伪保安大队的一百五十多人，共七百多人，向我们阵地猛冲。我县政府游击队只有三

个班有三十多人，又都是步兵，但每个战士的情绪坚定而沉着，打得非常顽强，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有几个战士中弹牺牲，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必须想办法突围。我看到南面没有敌人，从石崖上跳下去就是一条湾湾曲曲的山沟，从山沟出去就是抢盘山南面从归绥到凉城县城的公路，距凉城十多华里，越过公路就是一座大山。正因为这样，我想敌人估计我们不敢从此处突围离开根据地，所以敌人没有在南面布置兵力。我立即决定从此处突围，指定两个班作掩护，一个班随我和程忠群立即跳崖撤退。当我们下到沟底走了三里多路的时候，掩护部队已经撤下，班长向我报告了伤亡人数和战斗情况。程忠群在旁听到，立即产生了惊慌失措的情绪。正在这时，我们原来占领的山头，已经被敌人攻占，但敌人都是骑兵，无法下来，就架起机枪向我们猛射。

我们正在猛跑，看到敌人一股骑兵，一百多人从西面向我们奔来，离我们有一千多米远，有一条深沟阻住了敌骑兵的去路。敌人即把马隐藏在树林里，留下十多人看马，其余的人隔沟向我们射击。这时，我们只剩下十多个人了，我派几个战士隐蔽地接近树林，向敌马群投了一排手榴弹，马子被炸得到处乱跑，敌人只得停止射击，跑去抓马。我们便乘机撤退。这时我已跑得精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即叫邓绍辉同志带领我们仅剩下的一个班，先抢占对面大山制高点，掩护接应我们。这时我身边只有警卫员陈全全，和一区游击队指导员阎苛风同志。我们跑出沟口，越过公路，走到半山腰一个凹地时，右边又有敌骑兵一百多人，追击过来。我们立即从左面一条有十多丈深的人迹罕到的山沟上，坐着溜了下去，下到沟里，隐蔽起来。天黑人静以后，我们从山沟出来，由原路返回查看牺牲的同志的情况。这次我们共牺牲了十六位同志，包括程忠群在内。他是负伤后隐蔽在一个小山

沟内牺牲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牺牲者熟悉的面孔时，真是心痛欲碎，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我们回到早晨被敌人袭击所住的村庄时，一区区长苏珍同志也闻讯前来看望。据老乡们说，这次遭敌袭击，完全是叛徒贾海功的出卖，当上午我们在山上和敌人激烈战斗的时候，贾海功就跑下山，同敌人指挥官王凤伍等一块喝酒吃肉去了。贾海功和王凤伍献功说：“昨晚前半夜我就给我舅舅郝禄送去了情报，叫你们来袭击八路军县政府，还有从偏关区党委来的人。不几天他们就要回偏关去了，这是个很好机会，怎么你们太阳这样高了才来。”王凤伍接着说：“半夜郝禄跑来对我讲了，我怕只保安队一百多人打不跨八路军，所以才给牛家川防共第一师乔专员打电话，请他调两个团来。我又向日本太君作了报告。防共一师的两个团天大明才赶到，所以来晚了”。

郝禄为了怕暴露他的反革命面目，天快明时给我写来一封信，大意是：“听说县政府遭袭击，心实不安，望多加小心，战斗在我管辖的地区内发生，死难同志我一定负责备棺掩埋好。”我也即刻给他回信要他负责备上等棺材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埋前我们派人去检查，去人的安全由他负责，否则以他是问。几天以后，他准备好了棺材，我们派人去监督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

逮捕审讯郝禄

1944年遭敌袭击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归凉县一区政府活动在抢盘山一带，把敌人发展的秘密情报网的负责人找来，分别进行了分化瓦解工作。并警告他们以后再发现通敌情况，决不轻饶。他们都写了悔过书和保证书。

我们决定逮捕审讯郝禄，抽调五区游击队长郭重山，一区游

击队指导员阎苛风，还从一区游击队内抽出两个熟悉路径的班长，四个人带上驳壳枪化装成老乡予伏在郝禄家的附近。郝禄这个老家伙，非常狡猾，整天呆在凉城县城不回家，埋伏的第三天黄昏，郝禄与一个伪警长，还有两个带大枪的警察回来了。他与伪警长正躺在炕上抽大烟，我化装埋伏的同志突然进去，把他们逮捕了。缴获了一支小枪，两支步枪。我和阎苛风同志带一区游击队一个班以及我带的三个人一起到北四区鸟兔沟村，民兵为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山沟里搭了两间草房，就在这里，对郝禄进行了秘密审讯。

郝禄这个家伙很难对付，经过多次审讯他才全部供出来他发展秘密情报网，诱降他外甥贾海功叛变、设法俘虏我或打死我、那次袭击他与贾海功联系、与王凤伍商量经过，以及袭击以后查看死者没有我，也未被俘，怕暴露身份，又写信给我，企图继续进行欺骗作恶的等等罪行。审讯后即就地将他枪毙。

逮捕郝禄后的第二天，凉城县伪保安大队长王凤伍，好象发了疯似的带着他的一百多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搜山扫荡。先是一区的抢盘山、蛮汗山，再是五区的油鲁沟，大榆树各村庄，还有北四区的大东沟、鸟兔沟、灯笼村、庙沟等地。大小山沟反复进行搜索，妄图从我们手里夺回郝禄，或找到我归凉县区政府和游击队加以报复。然而敌人扫荡了一个多月无所收获，只好两手空空返回凉城。就是这个国民党的保安大队长，又是日本鬼子的伪保安大队长，一身二任的汉奸、反革命，对我恨之入骨，骂我“宋克缙就是一个铁坩且，老子也要把他打个稀巴烂。”结果，彻底失败的正是这个双料的反革命。

程仲一同志的牺牲

1944年的二月间，一天，我在北四区与田恩民区长一起宿营，深夜被远处传来的枪声惊醒，经派人侦察后，才知道程仲一同志遭敌袭击牺牲了。情况是这样的：程专员带二十几个游击队员从偏关区党委出发，到绥南来工作，听说我们在这一带，特来找我们。1940年以前程仲一同志曾在绥南任过专员，对这里的地形、村庄、老乡都比较熟悉。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环境十分恶劣，他们那晚宿营的村庄叫郭木匠沟村。现在我们与北四区政府早已不去那里了，因为那个村距崞县窑子敌据点很近，只有十五、六华里，又是丘陵地带。他们从晋西北来，一路行军比较辛苦，吃过晚饭就都在老乡窑洞内睡着了。晚上风比较大，天气冷，在山上放哨的同志怕冷，就找个地方避风去了。他们那天晚上进村以后，敌人的密探就报告了崞县窑子的敌据点，崞县窑子住有伪军一百多人，得到情报后立即出发，隐蔽地接近了他们住的村子，把机枪架到他们的住房门口。后半夜有个同志起来解手，开门一看，发现被伪军包围了，他赶快返回窑洞，把程仲一等同志叫醒，当同志们向窑洞门口外冲时，被敌人的机枪打死。这时，哨兵听到枪声返回村内，结果也被敌人打死。就这样他们全都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归凉县委副书记赵效敏同志。程仲一同志等到绥南来，我们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到达绥南以后，还没与我们取得联系就全都牺牲了。使人悲痛万分。

这个时期环境十分恶劣，牺牲的同志不断增加，稍一不慎或迁到情况不能沉着冷静，就有牺牲的可能。地区缩小，人员不断减少。就拿当时的归凉县政府来说，由于叛徒出卖，在抢盘山地

区遭敌袭击以后，包括后来扩大的人在内，总共只剩下二十多人，且好几个月思想不安定。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坚决相信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抗战三阶段的英明教导，坚信绥蒙区党委的领导，坚决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形势的好转。

环境逐步好转

日本侵略者不仅侵占了我国的大半河山，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侵占了南洋许多地方。1944年的八、九月间，日本侵略者明显地暴露出野心太大，占领地方太多和兵力、财力、物力不足之间突出的矛盾。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从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这个时期日本侵略者抽调了很大一部分兵力到太平洋作战。在我根据地周围，很多据点只住少部分伪军。而伪军感到末日来临，士气非常颓丧。日寇基本上停止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环境逐渐好转，我军士气与敌军相反，越来越高涨。拿县游击队来说，由以前的二十多人，到1944年底发展到一百多人，各区游击队也有了很大发展。1944年的夏末秋初，我们与绥西取得了联系，我曾亲自到绥西井尔沟一带大青山根据地领导机关作请示汇报（当时绥蒙区党委组织部长白成铭同志住在那里）。绥西武工队经常活动在土默川北沿一带的村庄。归凉县武工队经常活动在白塔、陶卜齐平绥铁路沿线一带。平绥铁路以南的土默川边沿的山村也成了我们的根据地。

1945年的上半年，日本鬼子已是末日来临。伪军和伪政

权的人员思想颓丧，纷纷找出路和靠山。敌人为了确保铁路交通线，撤掉了不少远离铁路的据点。如敌人于1945年五、六月间撤掉了崞县窑子据点。伪军撤退前两天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并得知崞县窑子的敌人尚存有粮食七、八十石，我们立即送信给伪军，不许把粮食带走，更不许把粮食烧毁，并命令伪乡政人员负责保护好粮食，如有短缺，唯伪乡长是问。敌伪军撤退后，我们为了解决山区根据地群众粮食短缺问题，决定把粮食分发给群众。当即通知附近山区各村动员所有人力畜力到崞县窑子运粮。第三天县政府和各区游击队保护着运粮的群众，浩浩荡荡到崞县窑子把粮食运了回来。群众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胜利来得突然，尚未接到区党委的指示，我即带县游击队二百多人进驻旗下营火车站。天亮时有日军一列军车六十多节，由五个火车头牵引，约载两千日军，开到旗下营车站附近，我要他们投降，他们不投降。我随即动员群众在旗下营东边把铁路挖断，使敌人无法前进。在与敌人相持的第二天，姚喆司令员带骑兵团由晋西北赶到了。我向姚司令员作了汇报。姚司令员进驻旗下营，要敌人投降，敌人还是不投降。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姚司令员通知我说，据侦察国民党从何套开来三个师，已到归绥，并向旗下营方向袭来，他决定撤出旗下营，于是我们即行撤出。当时那里的局面非常混乱，很多的伪军到处流窜。三天后绥蒙区党委由偏关赶到了绥远，住土默川陶卜齐附近一带的一个村子。我去见了苏谦益副主任，向他作了汇报。几天后立即调我到绥北工委工作，不久绥北工委取消，我即调绥东地区任专员。

日本投降后不久，原归凉县游击队发展到二百多人，不久又发展到三百多人。各区游击队也分别有很大发展。在县、区游击

队七、八百人的基础上合编成野战军八团。

坚决依靠群众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把绥南地区的抗战坚持到胜利，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有一次正当敌人“扫荡”时，我们活动在大榆树村一带的只有四个人。群众为我们准备好了给养，让我们住在一个只有一家人的山沟里。放哨全由民兵担任，他们不只把哨设在村口，还把几个村的哨联防起来。只要敌人一行动，各个山头的岗哨立即互相联系，白天以放羊为名，以响皮鞭为号，几分钟内我们即可知道。晚上不论山头或平地以手电筒亮三下为联络讯号，群众帮助我们搞侦察，有联络侦察，有座探。所谓联络侦察就是把侦察到的敌情很快报告给另一个侦察员，以便很快送出去。所谓座探，就是深入到敌人内部，给日本太君和指挥官烧火做饭，偷听敌人的行动计划，很快转告给我们。有时我们的宿营地离敌人的住地只有三、四里路，但敌人简直如同聋子、瞎子一般。有时敌人从山下过，我们就在山上坐；有时敌人来了，我们上山避一下，等敌人走了，我们又回村里休息。敌人对我们无可奈何。

有的同志怕我们遭敌袭击，不惜自己的生命跑步送消息。有一次我们住在鸟兔沟村，贫农王才才到崞县窑子有事，走到庙沟门村时，看到崞县窑子的敌人出发到山里来，他怕我们遭敌袭，就跑步往回赶。从庙沟门到鸟兔沟三十多华里，一直跑到敌人前面，跑得满身大汗，口吐鲜血，向我们报告完敌情后他立即昏了过去。我们抬着他和群众一齐上山隐蔽后，敌人才从沟口过来。

敌人没有发现目标，进村稍事停留即行离去。

世界上能有什么感情比战火中军民之间休戚与共、生死相关的情谊更为可贵的呢？回到村里，我一直安慰他好好医治调养，我们临行前给他留下一些钱、药品和吃的，才依依告别。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调养，他才逐渐恢复了健康。

1980年7月5日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

武川县一、二联区的斗争

范建国

大青山北麓，乌兰察布草原南端，边境要镇乌兰花侧翼，镶嵌着一块东南、西北走向的英雄的土地。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川县一、二联区。这里峰峦叠嶂，沟壑纵横，银官山，笔架山，大阴山，草垛山，龙头山，连臂交抱，蜿蜒伸展，境内牧场片片，农田块块，盛产牛羊和麦薯，世世代代养育着勤劳勇敢、淳朴憨厚的后山人。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犯内蒙古西部地区。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派，望风而逃。认贼作父的汉奸、蒙奸迎降日寇。这年十月，绥远省主要城镇相继沦陷，日寇的魔爪伸进了大青山的门户。一九三八年春季，鬼子的铁蹄踏进了乌兰花一带，这里遂同整个大青山地区一样，为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政权所控制。

日本鬼子入侵前，乌兰花一带已经兵匪如毛，豺狼当道。国民党自卫军骑兵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团及补充团、收编队在这里“驻守”；打着抗日旗号的“干豌豆”、于子谦、夏军川等大股土匪和伪蒙军、“袍子队”也在这一带残害人民。

日寇侵绥后，日、伪、顽沆一气，在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的同时，竭力破坏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百般阻挠我们开辟抗日根据地。那时，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了解甚少，对敌人的反动宣传迷惑不解。但是，对日寇的蹂躏，伪顽匪特的横行，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许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奋起反抗，苦难的大地到处埋下了复仇的火种。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毛主席和滕代远同志，打电报给贺龙、关向应、肖克同志，征询创建平绥线以北游击根据地事宜，直接点出了陶林、武川诸县。接着在五月十四日，毛主席又亲自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等同志电报指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速考虑此事。”贺龙同志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亲自部置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选派一二〇师二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七一五团团团长王尚荣和全体指战员；武新宇同志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晋察绥工作委员会，以及刘庸如同志负责的以太原成城中学师生为主组成的游击四支队，在李井泉，姚喆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由晋西北五寨出发，挺进大青山。沿途打破敌人多次围追堵截，于九月初到达大青山，与杨植霖、高风英、刘洪雄同志带领的蒙汉抗日游击队胜利会师。翌日，即九月三日，我军不顾长途跋涉的辛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陶林，歼敌一部。九月十日，部队又星夜急行军二百多里，一举攻克乌兰花镇，俘敌百余名。当时驻守该镇的蒙古军“袍子队”是四子王爷府的家兵，全部缴械投降。战斗结束后，我们对俘虏讲明我党主张、抗日形势和民族政策，交还了他们的枪枝弹药、马匹等物，人员全部释放。打下乌兰花镇的第三天，日寇由归绥开出三十九辆汽车的鬼子兵，前来反扑。我军事先获得情报，夜

间埋伏在武川蜈蚣坝的老爷庙顶上扼守着马家店公路。鬼子汽车队开进伏击圈后，十五分钟猛打，汽车全部被打瘫，全歼敌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这三战三捷，打出了军威，打破了日本强盗企图不让我军在大青山立足的狂妄迷梦，大开了群众认识共产党、八路军的眼界。接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又收拾了一批顽、伪军政人员和匪特。乌兰花以东活动的“干豌豆”，于子谦、夏军川等土匪被打垮。从此，我党我军在后山地区声威大振。在党领导下，这里很快成立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始了有组织的抗日活动。

一九四〇年春季，反顽（自卫军）斗争胜利后，这一带正式建立了武川一、二联区政府。同年八月，我参加了在武川西梁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绥远各界抗日团结会议，进一步具体研究部署了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健全问题。一九四二年日寇大扫荡，我军暂时撤离期间，我曾担任武川县一、二联区付区长、区长职务。在绥中专署和武川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大青山游击支队的帮助下，我们同广大群众团结一道，战斗在这块辽阔而苦难的土地上。这一期间，许多可歌可泣的军民团结抗日的英雄事迹，常常萦回脑海，激荡心房。现仅就记忆所及，书诸于后，借以悼念光荣献身的先烈，启迪正在成长的青少年，鼓舞鞭策自己，将有生之年献给四化建设大业。

一

当年我一、二联区政府和区游击队，总共只有三十几个人，二十多条枪。凭这点力量同几倍、几十倍于我们的日伪军进行大

规模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区联政府和区游击队除担负配合大部队作战，牵制、骚扰、威胁当地守敌的军事任务外，主要的任务是创建和巩固红色政权，保护群众发展生产，为大部队提供给养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当时各级政府都是游击性的武装政府，每个干部都既是行政人员，又是战斗人员。办公无定址，出没无常规，人到哪里政府就到哪里，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够巩固下来，坚持斗争，并取得胜利，实在是不容易的。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一、二联区管辖的数百个村庄，原有国民党保、甲政权统治。日寇侵入后又建了大乡，形成日伪重叠政权，推行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统治。当时日伪在这里共设置十个大乡，保、甲长尤其乡、保长，多数来自豪门富户、地痞流氓，成份极其复杂。八路军打过来后，这些人有的明显倾向我们，积极做一些有益于抗日救国的工作；有的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有的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成为铁杆汉奸。

区联政府成立后，对每个乡、保、甲长都进行了具体分析，采取了不同对策。因为我们工作抓得紧（当乡长的人必须经我们同意），又讲政策，有拉有打，太坏的人不敢也不能当伪乡长。因此，伪乡长一般倾向了我们。但是表现也不尽相同。十个大乡中有五个乡长比较接近我们，属于团结、改造对象，使之成为“两面政权”。其余五个大乡长，对我们持怀疑动摇态度，我们采取措施，制止他们为敌效劳，指令其为我方办事。我们一般不向大乡摊派物资，只布置些一般任务，如让他们蒙骗住敌人，收集情报，购买紧缺物资等。对于要害地带，重点乡和重要人物，

还采取结义为友的办法，争取他们为我方效力。福义乡乡长靳尚崇，万和乡乡长赵连成一直对我们不错。为深入开展工作，党组织指示我们同他们交朋友，结义兄弟，从而为我们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乌兰花镇北大南坡村绅士张贵山，地多畜多，又在归绥（现呼和浩特市）、乌兰花镇办商行，在这一带颇有影响，是仁义乡大乡长，他是安青帮（“家里”），对这个道门很虔诚。组织上抓着这个情况，让高鸿飞同志先用安青帮的一套规矩和他拉上关系。以后，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通过他利用过当时常活动于乌兰花到大庙之间的伪蒙军二十四团，给我们买电池、布匹、衣物，捐献粮草。在日、伪、我几方面人员偶尔相遇，处于危急情况时，张贵山还用安青帮的那一套规矩从中周旋、排解，保护我方人员脱险。拉住张贵山之后，我们先后开辟了吉生太、大井坡、白林地、大南坡一带地区，在敌人控制区开辟了我联区政府和游击队的活动。对于与我为敌的坏蛋，干脆铲除或勒令其听从指派。

住在乌兰花镇的忠义乡乡长郑天才，依仗其住在日伪心脏，多次抗拒我区政府分配的任务。一九四一年除夕，我带领一个班擦黑进到乌兰花东南面的一个小村，化装摸进镇内。我们躲过日兵岗哨的监视，直入乡公所。伪乡长见我们几个不速之客进门，大惊失色。我声色俱厉地喝道：“郑乡长，我们是来请你去东山的，放明白点，跟我们走一趟！”这家伙显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给战士们使个眼色，嗖的都掏出了驳壳枪，把屋里几个家伙都吓酥了。我喝令他乖乖地跟我们走，并警告屋里其他人说：“你们如要马上报告据点或警察署，我们立即枪毙他。”几个家伙吓作一团，连声说不敢。我们把郑乡长带到四合乡，关押教育了一个多月，直到他完全接受了我們提出的条件，才把他释放。

这样一来，乡、保、甲长一般再不敢同我们作对了，亲日伪的乡保政权逐渐被架空起来。

为了把政权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根据群众基础和敌我双方力量，以乌兰花到武川的公路为界，东部为我游击根据地，公路以西为游击活动区。我们在公路以东的二十多个小乡，普遍进行了民主选举，调整了掌权人选；把积极可靠，办事有方，善于同日伪应酬、周旋的人选了上来。公路西的二十多个小乡长，同我们离心倾向较大，敌方控制严，人选我们不能完全控制，但迫使他们给我们办事。各小乡都承担我区政府分配的应征任务，明里应酬日伪，暗地为抗日服务。甚至敌人征纳的许多捐税，也往往落到我们手里。

依靠群众 掌握敌情

一九四〇年新年、春节期间，我们开展了反击顽固军的武装斗争。当时在这里活动的有国民党自卫军六个骑兵团的番号。人数最多的是王德宝、路进才带十二团，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余多则百余人，少则几十人。吉善福带的十三团约有四十人。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共有六百多人。自一九三九年春季，就不断地同我军搞摩擦，企图把我们赶出绥中地区。反顽固斗争一开始，我军首先击败了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王德宝、路进才团，其他团不堪一击，好似秋风扫落叶般地土崩瓦解。被打垮的残兵败将，聚集到乌兰花、东八号一线，同日本鬼子搞投降谈判。因日寇要他们缴械受编，他们要自成一体，同日本鬼子联合起来对付八路军，条件谈不拢，只好罢休。有的当了汉奸，有的跑到绥西，有的落草为匪，有的散伙。十三团团长方善福，十二团团副路进

才，干脆带领部分军队投降日军。打垮自卫军后，引起了日寇对八路军的重视，便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我军，千方百计的搞我们的情报。他们从归绥调动队伍，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东八号，接近我根据地。因此，封锁消息至关重要。当时日寇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搞我方情报：一是以日本宪兵队，特别是弘部（日寇驻军本部）特务为核心，明查暗访，化装盯梢；二是靠伪警察署派密探侦察和各据点、伪军驻防区提供；三是命令各大、小乡专门设联络员，每天有事无事都要向就近的据点汇报，重要的大村子也要派专人送情报。

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经请示县政府和专署批准，我们将计就计，利用日本人搞我们情报的机会，派老实可靠，能言善辩，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充当联络员，每天出入敌穴，明里是敌人的联络员，暗里是我们的情报员，为我们搞情报。一部分联络员是区政府和游击队员的家属、亲戚、堡垒户。四合乡有我的亲戚赵玉山，威镇乡有区游击队长孙库的亲戚彭二相，英图乡有乡长、共产党员冯明亲自选派的刘才等同志。韭菜沟、忽鸡图、西河子等许多乡的联络员，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可靠人。每天进据点报告的内容，均由区政府布置。进去后发现异常情况和重要事情，立即返回报告。开始一段，各乡写个“情报”条子，言明本乡内今日“太平无事”或一些琐事，应付敌人，久而久之，日本人不信了，就由指挥官或翻译盘问联络员，说话稍有漏洞或与他们掌握的情况不符，联络员连同乡长一同受处罚。而且，日军三处据点所得情报都要相互对照，露出蛛丝蚂迹，就会招来祸殃。因此，有一些联络员吃了苦头，有的动摇了，有的要求报些真实情况应付敌人。敌变我变，我们就拣一些公开的、瞒不过的事，让联络员去搪塞敌人。或者昨事今报，我方人员住下不报走后报，

东去了说西往，目睹说传闻等，真真假假把日本人哄得昏头转向，相反，我们却对敌情了如指掌。就这样，我们依靠群众，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着情报斗争。一九四〇年以后，我们联区政府和游击队利用准确情报，打了几场漂亮的小仗，铲除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特务，使敌人丧魂落魄，再不敢横行无忌了。

邸福元英勇就义杨大个罪有应得

一九四一年春天，开耨时节，天高气爽，柔风拂面，根据地的群众正忙着抢墒播种。区政府和游击队的同志们，都分散在每家各户的农田里劳动。

这天上午，一匹骏马风驰电掣而来，送给区政府的鸡毛信称：“今晨日据点发现你乡一带山上有我部队活动，疑是小股八路军。一排日兵前去偷袭，沿途各情报站速转横河（我区政府代号）”。落款是：“30水”（三元井情报站代号）。我们立即派人到哈拉圪那村报讯。

西沟子联络员邸福元，不知道这一新的情况，仍沿着每天例行的路子给三元井日军据点送“情报”，途中遇上由大湾子村过来的日军，日军少佐认得他是西沟子村联络员，接过“情报”一看，写的是：“我乡各村相安无事，多日未见八路来过。昨夜两个土匪抢走张某耕牛一头。”少佐凶狠地追问了邸福元一阵，问不出什么名堂，又逼他回到西沟子村，并把老乡统统赶来，日军少佐和翻译威逼群众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空气非常紧张，但没有人吭声。这时日军少佐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邸福元，想起这个村老是纳不上捐，去秋收的几车粮快运到据点了却不翼而飞，说

是游击队打劫了。这次明明看到这一带山上有八路军，他却说没有八路军来过。许多事都牵联到这个伶牙利齿的邸福元。于是少佐吆喝日兵一齐向邸福元围过来。

一阵雨点似的皮鞭，邸福元昏过去了。一桶凉水泼去，邸福元慢慢苏醒了。少佐又威胁邸福元，要他说出八路军在哪里。

邸福元为了保护我军安全转移，与鬼子磨蹭了一个多钟头，才斩钉截铁地说：“昨晚八路军就住在前面那个大村里。”少佐眉开眼笑急不可待地问：“什么村？快说。”邸福元冷笑一声，大喊：“三一一元一一井！”少佐情知上了当，气急狂吼。一群日本兵恶狠狠地扑向邸福元。英雄的邸福元同志牺牲在野兽的乱刀之下。其状惨不忍睹。

那天，确实有我游击队一个连住在哈拉圪那村，该村距西沟子仅十来里，接到三元井送出的情报后已经安全转移。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想到死得其所的邸福元，不由得联想到卑鄙龌龊的日本走狗杨大个子。

一九四一年，乌兰花日军弘部豢养一条忠实走狗。这家伙个头大，人们都叫他杨大个子。他常到一、二联区活动，装成经商或借口替人跑腿，侦察我们的情报联络点，准备捉拿我和区政府及游击队几个领导人。他认识这一带不少人，搞到一些情况，许多为我们办事的人上了他的黑名单。此害不除，后患无穷。

三九隆冬，雪后的一天，同志们在一起研究除掉杨大个子的办法。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派联络员去引蛇出洞，把他干掉。

四合乡联络员赵玉山，对抗日忠心耿耿，应付敌伪八面玲珑。杨大个子多次来乡活动，觉得赵玉山“够朋友”，想利用他，两人交成“酒肉朋友”。派赵玉山去请杨大个子，非常合

适。这天晌午时分，赵玉山骑马来到乌兰花，在街头碰巧遇到了杨大个子，便请他到饭馆，两个人边喝边扯。赵玉山先说为日伪收缴粮款，被八路军打得几十天起不了炕；又说这批粮款已经藏下来了，还有用大烟土换的几百个银元也藏在莜麦窖里；最后说这几天乡里平静，才来报告你……一阵巧言把杨大个子哄上了钩。杨大个子谋财心切，当天傍晚就跟上赵玉山向四号村奔来。

晚上起了风搅雪，四号村隐没在一片雪雾里。赵玉山领着杨大个子进了村里的刘家大院，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堂屋。后面的杨大个子刚迈进腿，门后忽然跳出两个人，把杨大个子扭住，没等他喊出声来，腰间的“德国造”手枪已被翻过身来的赵玉山摸出。游击队员将杨大个子捆住，押向村后的山沟里把他处死了。次日天明，乌兰花街头，各据点，乡公所，以及大小村庄，都贴出了区政府惩办特务杨大个子的告示。

当时，东八号日军据点有个姓白的特务，心毒手狠，常出来搞情报，破坏我民主政权，掳掠民财，民愤极大。一天夜里，我带领几个游击队员钻进他的老窝，把他捉了出来。等到敌人发觉，我们已爽利地处决了这个坏旦，并散发了布告和传单。

除掉了杨大个子和姓白的特务，对敌伪震动很大。许多汉奸走狗感到兔死狐悲，惶惶不可终日，很长一段时间，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露面。

争取和利用伪军

为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需要对伪军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争取他们为我服务。伪军中许多下级官兵是抓来的壮丁，加上他们毕竟是中国人的，不少人还没有完全丧失民族气节，因而有

些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特别是一些当地人，因其亲属、家业等关系，瞻念前途，有许多后顾之忧，还想留条后路，比较容易争取。我们抓住敌方的弱点和可利用的条件，同一批敌伪人员拉上了关系。

一九四一年春天，伪靖安警备队五大队进驻活佛滩。此地座落在笔架山下，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我一、二联区的心脏地带。日寇让伪军驻守这里，对我军、我区县政的活动威胁很大。五大队的官兵大都是东北人，对日寇的野蛮残暴深有不平，许多人对鬼子怀有仇恨。一次我军突袭活佛滩时，他们乘机打死了日本指导官田川。事后反而报告上司说是八路军打死的。据此分析，其中一些下级官兵是可以争取的。我们就派威镇乡乡长孙广，付乡长乔润德和哈卜桥乡郭树枝等，经常接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跟他们拜把子，交朋友，行贿赂，共谈国难民疾。不几天，就把一个姓郭的连长，二排排长张明月和几个班长、士兵拉了过来。以后他们经常接受我方要求，为我们送情报，买枪枝、弹药、布匹等禁销军用物资。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五大队不但没有同我区政府、游击队作对，就是我们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两军相遇也各自绕开。一九四一年秋季的一天，威镇乡搞到一份紧急情报，急需送给那天驻扎在大湾子村的我骑兵支队司令部。正碰上联络员不在，乡里派圪欠村的可靠农民根虎子去送。根虎子一口气跑到大湾子村，这时司令部已经转移，五大队张明月带的警备排刚刚住下。由于根虎子缺乏经验，慌忙之中掏出信件，被张明月看见，知道是八路军的情报，急忙出门迎上来，接过信一看，顺手装进兜里，打发根虎子回去。张明月回到活佛滩后，赶快把孙广叫来，把那封信交给孙广说：“看你们的人多么麻痹大意，这信落在别人手里要掉脑袋

的。”还有一次，这个警备队的几个士兵从山上拉走我们一匹军马，区政府派人带上大烟找到张明月，通过他给说合把马要了回来。

二

联区政府和游击队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解决部队的物质供应，负担大部队的给养。这方面，同样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很大胜利。

依靠群众 支援前线

一、二联区东西一百四十多里，南北七、八十里，是武川县比较富庶的地区。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兵匪为害，日、伪、顽横征暴敛，人民生活相当寒苦。区政府成立后，在大力宣传和武装保卫下，组织群众同敌人展开了抗粮抗捐斗争。群众虽然生活困难，但还是首先想到支援子弟兵。联区政府和游击队人员，是来自这一带的农民，同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群众除负担供应县、区、乡政府和游击队的军需装备、办公费用外，还为大青山骑兵支队供应大批物资。交粮捐物，都是党员带头，干部带头，游击队员带头，从自家做起，动员亲戚朋友踊跃支前，各村各户争先恐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这里每年要拿出上万石粮食，四五千两大烟土和大批军草、军鞋、皮衣和其他军用物资上交，为大青山游击队的活动提供物资保证。特别是这一带盛产大烟，除供应军队和政府的需要外，还拿出一部份运往延安。大烟是当年的物资货币，被称为“黑金子”，在动荡年月比起伪

钞票值钱得多。当时的政府活动经费、商品流通、物资兑换，往往以大烟值论价，一两大烟土（旧时十六两为一斤）可换取一石左右粮食。因此，敌我双方对大烟土的争夺很激烈。

那年月，群众同我们真是鱼水相亲，涌现出许多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抗日的动人事迹。记得是在一九四〇年冬的三九天，后山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四合乡小北沟村甲长韩三毛，带着几个可靠的基本群众，把准备要运往骑兵支队的一批物资妥善地坚壁起来。谁知，一小队日本兵突然从乌兰花直冲小北沟而来，鬼子把村里的人赶进一个大院，把四十多岁的韩三毛带到群众面前，逼他立即交出物资。鬼子兵端着刺刀把韩三毛团团围住，嗷嗷地怪叫着。韩三毛镇定自若地一口咬定没有物资藏着。鬼子动了肝火，皮鞭抽，皮鞋踢，折磨了他好一会儿后，索性脱光衣服，把他赤条条地填进院旁一个大雪坑里冻，一会儿又把冻僵了的韩三毛拖出毒打，鬼子见他休克过去，又拉进家里用火烤、凉水浇。三冻三醒，已经奄奄一息了。鬼子再拷问，他咬紧牙关怒视着鬼子，仍然说不知道。使鬼子无可奈何，以至对他们获得的情报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气急败坏地走了。支前物资完整地保护住了，坚强的韩三毛却落得一身病。一九五一年我去慰问老区人民时见到了他，他还支持着病体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农事劳动。言谈之间，他还流露着对日寇无比的愤恨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无限热爱。

克服困难 筹积军需物资

联区政府和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及供应骑兵支队的部份给养，需要大量物资。而当时日寇对根据地封锁禁销，群众生活

很贫苦，筹集物资是很困难的。我们除了依靠群众支援，再就是从日伪摊派各乡各村的苛捐杂税中扣夺。每逢敌人摊派的物资交到乡里，我们就指令乡里及时报告区政府决定处理办法。一般是拿出少量交据点，大量的则落在我们手里。遇上敌人寻根究底，我们就假作夜袭乡公所或半路劫走。暂时运不走或需要保存的物资，交可靠户化整为零收藏或集中掩藏。

对敌人严密封锁的物资，就买通伪军人员或通过我们控制的商店、作坊搞到手。当时乌兰花镇里的“吉义昌”、“公义昌”、“四合成”等商号，以及东八号、三元井、西河子、活佛滩等地的六陈行（粮、油店）、小店铺，偷偷卖给我们食盐、火柴、布匹、成衣以及其它紧张物资，如电池、纸张、油墨、笔砚等物品。联区政府还自办了一个皮毛作坊，制作代替棉絮的衣裤毡套。还请出镇里的裁缝、毡、木、铁匠，为我们的部队做衣服、鞋袜、马鞍、钉马掌。我们还通过驻守活佛滩的伪军——靖安警备队五大队，购买军需品。如排长张明月、班长安海林等人，用大烟土给我们换枪枝弹药。记得一九四一年一次就搞出两支驳壳枪，四五十袋子弹，六、七个鲨鱼皮马鞍。那时，支队司令部有一部老式电台，所用电池来源很困难，买不到它需要的大蓄电池，就串联或并联几十节手电池代用。可是手电池也难买，只得靠各地凑集。他们经常给供应一些。这一次张明月还给搞出六节大蓄电池。驻守的伪军，大都是“双枪将”，缺了大烟就溃不成军。我们就瞅准机会，在他们烟瘾发作时，用大烟换取紧缺商品。

当时部队给养没有保障，常常发生断粮、缺草的事情。联区政府大力宣传有钱出钱，有粮拿粮，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策，动员富户为我军捐粮献物。阿鲁忽洞村的开明地主刘钰（现

任乌盟政协付主席)，本人是个学生，思想比较进步，1938年参加革命，任区动员会总务部长。他以身作则，带头支援部队粮马，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先后支援我们粮食五百余石，军马三十余匹（带鞍子）。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大滩花圪台村开明地主譚成宽（现为乌盟政协委员），除经常为我军捐献粮草衣物外，还暗送情报，掩护干部。一九三九年，李井泉、姚喆等领导同志率部驻守这一带。过春节时部队粮食十分紧张，譚成宽一次就拿出四百大石小麦和杂粮，无偿送给我军。敬亭乡乌尔图沟里的四号村，地主南万泉，是周围数得上的老财。联区政府和游击队经常向他征集一些物资。大部队驻防期间，一遇困难他就慷慨拿出大量粮草、皮毛、衣服、油脂等物。

对于比较顽固或倾向于敌人的财主，则采取强制的办法，迫使其为我军负担一定物资任务。

袭击伪警察 活捉伪科长

日寇为掠夺民财，并企图切断我军粮源财路，根绝我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靠，每当春种、秋收季节，都要出来抢夺。

一九四一年早春的一天，风和日丽，百草争绿，周而复始的春播大忙开始了。田间地头布满了适时耕种的人群牛犊。

这天上午，我们接到了乌兰花警察署敌人出动的情报。不一会，一股队伍从西北方向窜来，直奔兆丰乡。为首的是庆美乡大乡长徐友三和伪警察署长张显威，以及四十多个警察。

兆丰乡公所设在一处有土围子的关帝庙内，警察长驱直入。小乡长姚恒山接到我区政府通知后，早已做好迎接准备。这次日伪春天要粮，人都清楚是专门给八路军制造粮荒，要抢走农

民的籽种，荒废田园，制造无人区。姚恒山和几个乡公所人员，一边酒食应酬，一边暗自派人迅速通知驻扎在圪欠村的联区政府和游击队。区长高鸿飞，游击队长孙库和我接到情报后，详细分析了情况，决定给敌人一个打击。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打起了太阳旗，直至走到距乡公所大院一箭之地时，才见一个伪警察跳上房顶，打起旗语。我们游击队立即从南、北、东三面包抄过去，眨眼间冲到围墙下。将一排手榴弹扔进院里，顿时，在轰轰巨响声中伪警察们炸了营。我们向敌人喊话劝降，不一会儿，徐友三、姚恒山二人从南墙角下一个水道里钻出来，说是张显威派他们出来谈判，还倒拖出一支“七九”步枪作见面礼，谈判很快达成协议：伪警察全部缴械，把人放走。可是两个乡长进去后，好大一会儿不见行动。原来，徐友三从中使坏，敌人知道了我们的虚实，又变了卦。于是张显威又喝令部下爬上院角钟楼，居高临下，准备负隅顽抗，等待援兵。情况变了，我们经过战地商量，认为相持下去对我们不利。于是就再次喊话，让两个乡长出来交涉。张、姚二人又钻出来，经过双方说妥，以交给我们一支枪为条件，各自撤离了。

这次战斗，是区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打仗，虽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使主动仗出现相持局面，最后谈判撤离。但是，我们打下了敌人的威风，使他们抢粮和破坏春耕生产的阴谋未能得逞。

转眼进入盛夏，收割大烟的黄金季节到来了。驻守乌兰花的警察，多日没到乡里搜刮，给养不足，大烟奇缺，成了一群病鬼。

乌兰花伪政府派民政科长李德成出来征集大烟。李德成随同警长张志道带警察队出发，来到了离乌兰花二、三十里的英图乡，这个堡垒乡乡长是共产党员冯明同志，这时正在村里召开党

小组会，研究对付警察的办法。散会后他回到乡公所，一进门，李德成就气势汹汹地威逼冯乡长，要他马上交出二百两大烟。冯明见来头不善，虚与委蛇，拿出十几两大烟，按官职大小，分发到各个警察手里。然后把剩下的五、六两放在李德成和张志道面前，备了高级烟具，并准备了酒肉招待。冯明乘势摆出难为情的面孔申辩了自己的苦处，并表示过几天给送去。好不容易把李德成、张志道支应走了。

冯明派人送出的情报，插翅飞到了联区政府。这时，我区游击队二、三十人已在营盘村北埋伏好。这是警察回乌兰花的必经之路。埋伏圈选在离路百十公尺的高坎上，居高临下。

敌人进入伏击圈了，“打”，一声猛喊，队员们发起冲锋，冲进了敌群。敌人慌乱地还了几枪就向着乌兰花方向逃窜。我和几个有战斗经验的队员，始终追着几个敌首，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追出十多里到了耗赖村附近，终于将李德成、张志道和一个警察活捉了。我们一个赤手空拳的战士，紧紧追赶着一个警察，眼看这个战士伸手去捉捕他时，对方猛然回手一枪，战士被击中落马牺牲了。

这次战斗，我们生擒李德成、警长张志道等三人，缴获三把联枪一支，大枪一支，战马两匹。

张志道是我们争取过的对象，曾给我们从警察署搞过军用物资，对周围群众也没大的遭害，因而把他和那名警察当场释放了。我们把李德成带到四合乡和闪丹村一带，严密封镇了消息，进行秘密审讯。经过我们的教育，他交待了许多重要情况，并保证今后暗中帮助我们办事。我们原打算请示县政府再作处理，因敌各据点集中兵力进山搜寻，对群众不利，又加上他大烟瘾特重，是个负担，于是决定放他回去。

此后，李德成果然不负诺言，一九四二年秋鬼子“大扫荡”，他还专门去我家告诉敌人来势很凶，不同以往，提醒我们加倍警惕。这是后话。

三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末，日本侵略军主要是集中兵力和国民党部队作战，因而，已经占领的城镇只驻守少数兵力，大片土地和乡村都在我们手里。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以后，引起了日本鬼子的重视，感到八路军是个严重的威胁。从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开始，日寇调集大批兵力回师北上，增设据点，修筑碉堡，进行“扫荡”我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战争风云笼罩着大青山区，我们一、二联区的斗争也更加艰苦了。

斗争日益艰苦 意志薄弱者叛变

敌人不断扫荡，斗争日益艰苦。艰苦的斗争象大浪淘沙似的冲击着、考验着每一个革命战士。骑兵第四支队支队长郑乃品就是大浪淘出的一粒渣滓。

一九四一年秋的一天，郑乃品突然下令警卫员“一耳王”（此人姓王，两耳一大一小，同志们亲切地叫他“一耳王”）备马出发。离开铁圪旦沟以后，已经下半夜了，开始警卫员以为要回恩格来，不料向西走了。他虽心有疑问，还是信马由缰跟在郑后面。

郑乃品曾是张国焘的部下，跟随四方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二〇师七一五团挺进大青山时，他又到

了青山北麓，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〇年骑兵第四支队支队长王贤光同志牺牲后，他当上了支队长。他本来想着再继续晋升，不料，上级为了减小目标，保存实力，下令把四支队改为独立营，郑乃品变为独立营营长。野心勃勃的郑乃品是很不满意的，更使他不满的是因为贪恋“好马和女人”，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最近他闹情绪，离队在村子里鬼混，姚司令员派人叫他归队，他佯称马上回去，实际下了投敌的决心。

按路线应该往南去，可是他朝西走，“一耳王”心里想：翻过西河子西山就是敌据点东八号了，可他为什么要向那里去呢？是不是要跑？他几次试着想把郑的八音子手枪要过来，可是没想出要枪的理由。“一耳王”心里着急，为了防止万一，有意和郑拉下一段距离。走到刚望见东八号据点时，郑突然拨马加鞭直奔东八号去了。“一耳王”无法追赶，只好勒马回头去向姚司令员报告。

乌兰花的日本人，得知郑乃品投降的消息，指导官小板和几个警宪头目一同前往东八号接见宴请。小板以保护他的名义把他送交厚和市（现呼和浩特市）日本宪兵队。实际是对他进行审查。

在厚和宪兵队里，他供出许多情况，还供出王三毛给姚司令的四件情报，主要是大烟、物资和枪枝弹药。

几个月后又叛逃了杨振卿和徐宽荣。杨振卿是司令部的一个军事教官，东北人，不到三十岁，腐化堕落的不成样子。批评帮助都无效，从武川叛逃时还拐走了一个女人。投敌后也被送到厚和宪兵队审查，他在那里出卖了组织，暴露了机密，给抗日事业带来许多损失。

徐宽荣是骑兵支队的卫生员，他用卑鄙的手段欺骗、出卖了正在养伤的支队参谋长张成功同志。

张成功同志是党的优秀干部，党中央和毛主席曾派他到苏联学习骑兵战术，回国后又分配到大青山骑兵支队任参谋长，在作战中不幸受伤。徐宽荣借口给买药和营养品出了村，向敌据点投降后，带领活佛滩的日伪军捉去张成功同志。

敌人为了打击瓦解我革命队伍，利用叛徒组建了乌兰花宪兵队。由日本人川口任指导官，后来又由广田继任。郑乃品任宪兵队队长，杨振卿任付队长，徐宽荣当了宪兵队的小队长。由这些人组成的宪兵特务队，对革命的破坏性是很大的，我革命政府和群众，时刻准备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

高鸿飞不幸牺牲 樊守义英勇就义

一九四一年初春，刚过完正月十五，大青山北部的广大地区还是白雪皑皑，地冻如冰。乌兰花的警察特务老是摸黑出来敲诈勒索。这天晚上一个班的警察，在各地勒索了一天，住到黑兰以力更乡的南号村。

一、二联区区长高鸿飞同志，带领一个班从四合乡出发，奔跑了九十多里，当晚住到这个乡的黄草凹村。

我们的工作人员向高区长报告说南号村住下乌兰花警察一个班，头目是警捕尉彭金瑞。晚饭后，高区长与联区游击队班长赵小燕商量着袭击敌人的计划。

夜深人静，繁星满天。高区长带领游击队悄悄进入南号村，在村里找到了向导，察看了地形，而后分头接近敌人住地。

高区长和向导刚爬上西墙，被敌隐蔽哨发现了，端起枪来第一枪打中了向导，第二枪又打中了高区长。正在这个时候，赵小燕组织战士冲到院里，没等敌人完全起来，就给敌人一排枪和手

榴弹，把敌人吓得丧魂落魄，举枪投降。缴获大枪五枝，短枪一枝，战马六匹和敌人抢来的物资。警捕尉彭金瑞就地枪毙，其余人员按照我们的俘虏政策全部释放。

战斗结束后，当夜找到高鸿飞同志的尸体，装入棺材掩埋了。给向导也买了棺材，付了微薄的赠金，交给家属安葬。

高区长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一、二联区只剩下我和游击队长孙库同志，带领区游击队三十多人，在敌人“铁壁合围”中迂迴穿插，坚持斗争。

区游击队班长樊守义同志的牺牲更加壮烈。一九四二年初春，他由于执行任务过于劳累，和两个战士到二号村赵银白家里休息，被活佛滩的伪军郝庚午部捕去。一天下午，一群伪兵嚎叫着，疯狂地驱赶着老百姓去看杀害八路军侦察员樊守义的场面，企图杀一儆百，吓唬群众。

在乌兰花老爷庙（关公庙）前的石狮子上绑着我军侦察员樊守义。他身材高大，英气勃勃，虽然被打得遍体伤痕，但是他那英勇顽强、威武不屈的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日本指导官向群众威吓说，谁当八路军，私通八路军就是这个下场！一群鬼子象疯狗一样扑向樊守义，用刺刀乱捅，大解八块。可是英雄的樊守义还是怒目而视，毫无惧色，继续怒骂鬼子，并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樊守义同志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动和教育了群众，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跟上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

敌人大扫荡 我主力转移

一九四二年初春以后，敌人的出击越来越频繁了，三、五日

就出来扫荡一次，有时一连数日跟敌人迂迴，搞得人们精疲力尽。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的方针是隐蔽周旋，不正面迎敌。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我根据地逐渐缩小，活动越来越困难的时刻，跟我们关系较好的晋安警备队换防了，从卓资山的牛角川调来了巴彦塔拉盟警察十大队。这是一支极端反动的队伍，全队有三个骑兵连，过去叫防共第一师，师长（队长）叫郝庚午，原是国民党的部队，在蒋介石“曲线救国”的旗帜下投降了日本，借鬼子的枪打中国共产党。这支队伍专打我们的县、区政府，再加郑乃品这伙叛徒组成的宪兵队，熟悉我们的情况，因此，我一、二联区的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了。

野狗好打，家贼难防。正当我们面对困难，集中力量对付郝庚午和郑乃品之时，内部又发生了张守财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

张守财原来是国民党自卫团的一个副连长，一九四〇年反顽固军斗争中，被我们俘虏。当时我们按照优待俘虏政策放他回家。他是本区人，后来要求参加我们区的工作。副区长王英才不看他的出身历史，只看他胆子大，枪法准，擅自决定收留了他，结果留下了祸根。

一九四二年春耕时节，区政府和游击队转了一天山头之后，晚上住到陶林县的恩格来村。张守财串连了几个人，想着打死我和孙库同志后投敌，立功求荣。但未来得及下手，便带上他的人、枪和马，在夜色浓重中催马奔命了。

转眼之间，到了八月中秋，大扫荡的阴云笼罩了整个大青山区。日本鬼子的这次扫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势凶猛。日寇集中了三到五万的优势兵力，用“铁壁合围”战术，向我绥中地区发起了进攻。

日寇分兵数路，分进合击。从厚和市以东至集宁以西，沿大

青山脉堵住所有的山口，占领了所有的高地，妄图阻止我军向南突围，将我军一举歼灭在大青山区。

大扫荡开始后，我方的军政机关随大军转移了。经过周密的侦察，反复的考虑分析，大部队把突破口选择在旗下营的一间房至罗家营子之间。这一带驻扎的是日军炮兵，只有远战和炮攻的能力，没有近战、夜战的过硬本领。选择这个突破口，把握性大，代价小。虽然是大部队转移，由于我们训练有素，夜行有术，敌人并没有过早发现。战斗打响，我军已冲下山来，在我掩护部队的英勇战斗中，很快就顺利突围了。

坚持斗争

一九四二年八月，大军突围之后，后山地区只留下我们一二联区，第三、四区和县游击队的少数人了。我和孙库同志带领区游击队在大阴山、淖尔梁的马鞍山一带活动；三区郭还债带领三十多人在大滩、蒙古寺一带；四区郝旺希、王英才（从一、二联区调去）带领区政府和游击队在银宫山一带。

日寇这次大扫荡，我们事先不知道，上级的指示也未接到，只是发现呼市——武川——东八号——乌兰花一线的敌军大量向东山一带出动，来势凶猛。我们分析，鬼子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想象到要搞“铁壁合围”。

情况危急，我和孙库同志商量，要很快找到县政府，弄清敌人行动的目的，不然会吃亏的。谁想，我们刚走过腊赛四号，就进入了敌人的合围圈内，迁上了扫荡的鬼子。

走进村子时，鬼子正吃午饭，因为我们是从他们后面进去的，所以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是八路军。我们相机从事，大模大

样，若无其事地穿过敌群，出村后绕过圈子，很快把敌人甩开了。

一天我们从哈拉圪纳村出来，碰上了我武川县政府的民政科长龚翠同志。他领几个人也在找我们，告诉我骑兵支队和县、专、行署机关及领导同志都已随军转移到了山西偏关地区。三、四两区的同志已分散隐蔽，县游击队由赵富威队长带领执行任务，因日军进攻失去了联络，不知现在何处。他说一、二联区的任务是暂在原地坚持，我们几个人也随你们活动。

这天我们住在乌尼沟，分析了形势，估计了困难。龚科长提出向西转移，到一区的龙头山和塔步河下游去。我主张不离开二区。两种意见，难以决定。

正在争执不下时，我们的哨兵抓来一个特务，他供认是武川敌人派出的，随日军讨伐到了活佛滩，而后又出来专找范守业（即范建国）并跟踪一、二联区。这个特务供认的情况，促成我们迅速转移。临走时处决了这个特务。我们刚撤走，敌人就来了。

我们和龚科长会合后，已经集合了四十余人。从乌尼沟出发，走了七十多里，到乌兰花西北的泉掌子村才住下。消息就传到了伪红义乡的保甲团那里。第二天他们就联合伪二十四团的二十余人分两路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一个冲锋就把保甲团打垮了，团副张桂才和一个士兵被我们活捉，缴获一支大枪。这时我主张立即向龙头山转移，可是龚科长不听，下令追击败退的保甲团。我们正与保甲团争夺一个高地，二十四团飞马赶来，我们一时失利，只好撤出战斗。龚科长一上马就被一枪打落，壮烈牺牲了。

我们边退边打，占据了龙头山有利地形，敌人才退却了。但是我们牺牲了三个同志——龚科长、班长孙丑丑和马匹管理员。我们含着眼泪，掩埋了同伴的尸体，转向二区靠近东山活动。

八月的一个上午，鬼子和警察由叛徒李九斤带路，牵着洋狗，带着车辆，从乌兰花出发直奔四合乡，到了我的家乡——头号村。凶狠的敌人进村就吊打百姓，追问联区的下落，逼迫我的家属劝我投降。老百姓和我的家属都是一问三不知。气急败坏的敌人，毒打我的家属，掠走我家五头牛、三匹马、一百一十五只羊，还拆了五间房，将椽檩、家具和用品拉到活佛滩。十一月二十日，日军又到头号村报复，这次拆走了牛棚马圈五间，拉走粮食十多石，全家被弄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我妻子赵莲逃出去被狗咬伤左腿，肿痛难行，带着四岁的女儿范梅到处流浪，改姓为李，乞讨为生。

鬼子利用金钱收买，恫吓威胁，企图迫我投降。他们把抢走的粮食物资集中起来，到处张贴告示劝降。这一招失败之后，鬼子放火烧了我家的东西，又残酷地向老区扫荡。他们抓不到我和我的妻子，竟把我的妻姥姥活活打死，把我妻子的继父打得头破血流，几乎送命。我的亲戚都受到了株连、迫害，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因而隐姓埋名，四乡飘零。我的祖母死在炕上没人埋葬，最后让老鼠啃光面部，使人望而泪下。

由于敌人多次烧杀，四合乡的百姓实在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好拖儿带女，背井离乡。大扫荡之后，二百多户的小乡只留下四十多户人家。我们头号村更惨，烧的烧，拆的拆，一个好端端的村子最后只留下四户人家。

一、二联区政府和游击队一度离开二区老根据地，变得耳目闲塞，情报不灵，无论走到那里，很快就有敌人跟踪。于是，我们在龙头山一带游击了几天，又赶快向老根据地转移。

整个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生存越来越困难。分散隐蔽的三区政府和游击队已全部被敌人捕获，四区游击队员和区政府干部

有的叛变，有的被俘。三区区长郭还债被俘后跟随宪兵队；四区副王英才叛变投敌，四区区长郝旺希在敌围剿中被俘，县游击队长赵富威带领少数人投降。可是谁又能想到，我们一、二联区的同志，还能在血雨腥风中到处遨游呢？郑乃品在日本主子面前夸下海口，要活捉范守业，消灭游击队，以邀主赏。他带领宪兵队日夜奔走，到处追寻我们。

有一天，我们到了万义永乡，看到郑乃品等给我写来二十多封信，劝我投降。我一打听，郑乃品就在离万义永二、三里地的白音不浪。可是我们还是不慌不忙的，吃饱喝足后转移了。

寒露以后，大家都还穿着单衣，白天隐蔽活动，夜间在寒霜下行军。环境越来越恶劣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八路军能否胜利？”的疑虑，在一些人的脑海里产生了。我和孙库同志抓住这些思想苗头经常给大家讲形势，讲政治，讲暂时困难和光明前途。我们并不是孤军，有党的领导，有无数爱国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尽管我们暂时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上级是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团结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斗争下去就是胜利！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韭菜沟的巨成号村里，由于消息封锁不严，让郑乃品知道了。次日中午，他运动队伍抢占了一个高地，想居高临下把我们压在村里。我们的马哨发现后，立即打了两枪。我们听到枪声，马上撤走，跨过汽车路，上了淖尔梁。

郑贼看我们跑了，命令部队拼命追赶，一直追到草垛山。正在这时，一阵轻机枪响，打得宪兵队团团乱转。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赶快命令队伍占领了一个高地，准备继续战斗。这时我发现郑乃品后撤了，另一个山头上有十余名骑兵朝

这边走来，来人快接近时，大声地喊：“范区长，我们是黄厚的队伍！我们是黄厚的队伍……”。

正在危急关头，想念党、想念上级的时候，亲人象神兵一样出现了，令人多么高兴啊！黄厚和同志们从山上下来，和我们紧紧地握着手，我咽下激动的泪水，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黄厚同志是奉姚司令员之命，专门出来寻找我们失散隐蔽的同志的。为了缩小目标，行动方便，只带了一个班骑兵。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将来，我们转移到了绥西。

在绥西，我们跟姚司令员走了一个时期，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我们和姚司令员又回来一次，会见了许多衷心拥护我们的群众，讲了形势，讲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使群众树立了长期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回到了晋西北后，我进了党校学习。

吴钟生打入敌穴 借敌手巧除汉奸

一、二联转移以后，为了把斗争继续下去，我又派炊事员梁焕回到游击区，找到王三毛、胡太和、屈五红等同志接上关系，告诉他们联区暂时转移到绥西，要他们化装隐蔽，等待机会，为民除害。

由于斗争形势的紧迫，有些留下的同志被俘后参加了郑乃品的宪兵队。王三毛同志于部队转移后，经过东躲西藏，于一九四二年初冬跑到牧区的脑包图放马去了。

春节前，王府的差人塔赫拉出来送急信，骑了王三毛放的马群里的马。王三毛去王府领马，在那里找到了潜伏在日本“大蒙

公司”里的吴钟生同志。他当时改名吴志和，原籍河南省驻马店人，是我骑兵支队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人员。开始他隐蔽在西拉穆仑庙的一个税征所里当征税员，旋又转到王府大蒙公司当商人。后来在配合联区的化装隐蔽人员除掉叛徒、汉奸郑乃品、杨振卿、路进才、吉善福等人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王三毛找到吴钟生以后，吴钟生给他讲了形势，任务和敌特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提出利用矛盾，离间敌人，借刀杀人的设想。两人谈了整整一夜，最后吴钟生给他一个税征员的袖章，让他辞退放马回来干。又让王三毛从牧区弄几匹好马，弄些狐皮回来。

王三毛回来以后，经过别人介绍，当了郑乃品的“骑马温”。郑乃品因为是骑兵，非常爱马，王三毛按照吴钟生的意见，托人把两匹好马送给了郑乃品。以后又送了一些狐皮，几十两大烟。这件事不但郑乃品高兴，连他老婆也格外高兴。所以，郑乃品就把王三毛当成座上客。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宪兵队的徐宽荣、张庆荣和一些人知道了，但是对日本人还保着密。

要除掉郑乃品，必须用徐宽荣。因为徐宽荣这个人野心很大，目中无人，曾经为了贪图享乐、升官发财，出卖了我骑兵支队参谋长张成功同志。以后想继续立功高升，不惜一切想搞掉我一、二联区。现在他又想夺郑乃品的权了，而郑乃品和杨振卿也排挤他。因此，让这个家伙出面干掉郑乃品最适合。所以吴钟生就指点王三毛、张三、刘向荣等跟徐宽荣结拜。

因为有结拜同盟，互相来往频繁，称兄道弟，关系密切。学会了与魔鬼打交道的吴钟生同志利用一切有利时机，让王三毛、皇振汉等挑拨徐宽荣与郑、杨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们正议论郑乃品，吴钟生故意装得害怕的样子说：“兄弟们不可放肆，郑乃

品、杨振卿是皇军的宠儿，权势很大，你们随便乱扯，闲话进了郑、杨的耳朵，咱弟兄要大祸临头啊！”徐宽荣被激怒了，大骂郑乃品，经众人煽风点火，徐宽荣觉得郑乃品是个严重威胁，表示要坚决除掉，并让众兄弟给以帮助。

吴钟生同志感到时机成熟了，便通过刘向荣和周翻译向日本指导官马都告郑乃品私通八路，接受王三毛的贿赂，还给王开了良民证，让他带了军事情报逃跑了。

马都一听拍案而起，大骂郑乃品，即令徐宽荣抄了郑乃品的家，搜出了骏马、狐皮、大烟等许多赃物。马都见了证据，相信郑私通八路，命令徐宽荣随同日军将郑乃品绑出北门，刺杀在城墙之下。

郑乃品被除的消息，惊破了另一个叛徒杨振卿的狗胆。他知道这是离间之计，但不敢与马都详说，他辗转反侧，认为还是走为上策。他带上家眷和郑妻准备逃走，徐宽荣马上又报告了马都，经马都同意，徐宽荣追到西河子乡的头营子山沟里，打死了杨振卿和郑乃品的老婆。

郑乃品，杨振卿被杀之后，许多汉奸、走狗日夜胆战心惊，惴惴不安，都在盘算自己今后的生存和出路。

走狗和叛徒都没有好结果。群众说：“先当八路，后当特务，最后走投无路”。

郑乃品，杨振卿被除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区，革命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使他们感到共产党、八路军还在，抗日大有希望。

尾 声

一九四三年，我们又到了清水河、和林、凉城蛮汗山一带活动。一九四四年春天，我骑兵支队又重返大青山，紧接着又调来九团等许多部队。青山南北，又是战马喧啸，杀声震天。八路军这次回师北上，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一伟大的转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转胜为败，中国人民转败为胜的转折点；是日寇梦想消灭我们反而自己被消灭的转折点。

我们这次重返青山，惊破了敌胆，鼓舞了群众，鬼子、伪军的末日即将来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出兵的前夜，我正在晋西北党校学习，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真想立即跨出党校，回到大青山，和那些亲密的战友，跨上骏马，随同胜利的雄师，直捣敌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军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蛮汗山地区游击根据地斗争

胡三民回忆 **郝振锋整理**

蛮汗山区位于岱海以北，京包铁路线以南，东西约100里，包括凉城、卓资县等地区。这一带向以山高路险，地形险要而闻名。蛮汗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绥远大青山抗日游击区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大青山根据地通向中共塞北地区工作委员会驻地——偏关、兴县等后方的必经之路。由于位置重要，所以日、伪、顽与我党我军不断地进行争夺。斗争螺旋式地循环上升，一次比一次残酷。敌人是封锁、扫荡，再封锁、再扫荡。我们团结广大军民进行反封锁、反扫荡，扩大根据地，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斗争了八年，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很多优秀的领导干部、大批的同志和群众。蛮汗山区是党和人民用血汗换来的革命果实之一。为了如实地记录这一段革命史实，仅就我参与的斗争，做一回忆，请在蛮汗山区工作过的同志补充指正。

我于一九三九年跟随程仲一同志从山西来到这里，担任归凉县南四区区委书记和一区青救会主任。因此，对蛮汗山区根据地的建立和曲折复杂的斗争，几乎全部经历过。

归凉县抗日人民政府的建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蛮汗山区由国民党地主武装“自卫团”盘据着。“七七事变”以后，地主土匪武装有三道营的武续、井沟子的王维军等部，挂上日本侵略军的旗号，与国民

党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六路军、七路军相勾结，提出“抗日灭蒙”的反动口号，到处烧杀掠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广大人民深受日寇和国民党土匪武装的压迫和蹂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八年秋，李井泉，姚喆同志奉中央的命令，率领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邹凤山同志深入蛮汗山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建立了蛮汗山抗日游击区，成立了归凉县抗日人民政府和县、区各级动员委员会，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了绥南骑兵第一团、归凉县大队和第四区、第五区游击队。

由于蛮汗山区人民抗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开展，日、伪、顽的反动气焰受到打击，所以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由于我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贯彻，基本群众积极报名参加革命队伍，广大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地富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如郝瑞林、张跃锦、王祥、张建忠等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革命。

第一次考验

归凉县抗日人民政府是蛮汗山区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对敌人震动很大，日寇看到我蛮汗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日益扩大，对他们是个严重的威胁，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便对蛮汗山区进行了第一次扫荡。我们刚刚建立的游击队由于没有战斗经验，加上地形不熟，被日寇包围在一个口袋形的东罗子沟村里。这一仗，虽然指战员们都十分英勇，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县动员委员会主任贾进武同志身负重伤，

张志华同志牺牲，地委书记白成铭同志被敌人冲散后，突围出来。建立不久的政权和队伍，受到严重损失，部队和群众的情绪也受到影响。而敌人越发猖狂，到处搜查干部，形势很快恶化起来。很多靠近我们的群众和进步人士有的不能活动，有的隐蔽起来。我所在的游击队也改变活动方式，化整为零，分散在群众当中，暂时停止公开活动。我和县游击队长白泉清同志化装成群众，利用归凉县五区马场沟伪保长郭五子为掩护，被安排在柴脑包沟村一家姓郭的基本群众家里，房东对我们很好。白天我们在山里东躲西藏，每天转移几个山沟，天黑以后，才回到郭家的山药窑里住。那时生活的艰难，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像的。有时一天也吃不到东西，而且时刻有被敌人发现和扣捕的危险。要是没有一意一心拥护共产党的广大群众的关心保护，我们是难以坚持和生存下来的。那时的干群关系真是鱼水关系，血肉相连。这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一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这年五月份，白成铭同志集中起被打散的人员，坚持开展工作。这时，省委派周怀锦、王达仁二同志，从大青山来到蛮汗山区工作。同时雁北骑兵支队王林玉、邹凤山二同志率领绥南骑兵第一营也回到蛮汗山区。为了打开和扭转蛮汗山区的局面，决定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经过筹划，在东沟门对敌人打了一次伏击战。由于这次战斗准备充分，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缴获日本手枪、“三八”式步枪数十支。处在抗战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在条件低劣的情况下，能够消灭几十个日本鬼子，也是很了不起的战绩。军事上的初步胜利，使得部队和群众的情绪又趋高涨，地方工作也随之开展起来。

反 顽 斗 争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扑灭蛮汗山区人民的抗日烽火，敌人在牛家川、大榆树等地都安下了据点，派遣伪军防共第一师和伪军八团驻守。前者是由旧绥远土匪、地痞流氓组成的；后者是东北军的一部分，在“七·七”事变后投降日寇改编的。这些伪军都很反动，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党员，几乎都是帮会的成员。这些伪军给我们开展抗日斗争造成很多困难。

除此，这一带还驻守着国民党傅作义绥东五县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励师的部队。他们与蛮汗山区的抗日军民经常搞磨擦。与日伪军狼狈为奸，也妄图搞垮蛮汗山抗日根据地，但他们还不敢公开与日寇勾结。一九三九年春节期间，他们派参谋长李林照为首的代表，要求同我们谈判。我们根据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同意跟他们谈判。在三辑牛天子，双方代表进行了桌面上的斗争。他们不承认我归凉县抗日人民政府，妄图通过谈判取消蛮汗山区人民通过浴血奋战而建立的人民政权。当时，我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厉指出他们执行了不抵抗主义，搞投降主义，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寇，广大人民深受敌人烧杀奸淫的灾难；而我抗日人民政府是蛮汗山区抗日军民用鲜血换来的，你们想破坏，那是妄想。这伙国民党军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丝毫便宜，就与日伪军勾结起来，与我们搞磨擦，想用武力得到他们在谈判桌上没有捞到的东西。当年冬天，我骑兵侦察排的一个班在岱海滩簸箕湾村被他们包围，全部损失。当时，我在崞木匠沟村工作，他们说我是伪军八团的密探，把我抓起来。我看到他们戴的是国民党的帽徽，就质问他们：“你们是七路军，我是八路

军，你们有什么权利捆我”。不过当时他们还不es敢明目张胆的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不得不把我放了，但抢走了我的皮大衣。

一九三九年冬，阎锡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了晋西北事变。阎锡山指使骑一军赵承绶部，驻在山西临县，企图吃掉我党领导下的新军。我军三五八旅以七一四团为主力，配合新军反晋西北事变，在临县全歼赵承绶部。为牵制绥远国民党军队，我骑兵一团奉命向国民党七路军赵励师部展开攻势。一九四〇年春旧历二月初七晚上，邹凤山团长带领部队，由盘路沟村绕过崞县天子，与县委书记高应杰带领的县大队在候子天会合，在乔贵天子打垮了赵励师部，赵励师逃到铁炮山，后来又跑到后套地区。赵部被打散的官兵大部投奔了伪军防共第一师。

由于我军在军事上的胜利，蛮汗山区又打开一个新局面，群众情绪和部队士气空前高涨，建立了绥南专署，归凉县一区、二区、南四区和五区。在我活动的地区包括义和、扎泰、后干沟、岱洲天、后什村、松柏、大南河、什公沙乎、保安、三庆、常收梁、宁安和进阳等乡都建立了地下党的组织。同时，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基干自卫队”、“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非常活跃，如对青年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动员参军；妇女们组织起来做军鞋；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等等。特别是自卫队，这是群众武装，他们侦察敌情，给部队送情报、筹粮筹款，配合部队和游击队袭击敌人据点等等，对我们支援很大，整个蛮汗山区的抗日救国革命斗争就这样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斗争的新高潮

蛮汗山区，尤其是崞县天子（在凉城县西北部）一带，是大

青山根据地通往塞北分区和晋绥边区领导机关驻地——山西偏关、兴县等后方基地的必经之路，是大青山根据地与后方联系的纽带。由于这种特别重要的地理位置，敌人对这个地区的封锁和统治特别严密。一九四〇年秋，日寇和伪军在崞县天子村设立了据点和伪大乡政权。敌谍报班长武善堂和叛徒高洪都是当地人，人情地理都熟悉。这种情况给我们的活动、与后方的联系造成的困难和威胁越来越大。

针对这种情况，绥南专署和归凉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打、拉相结合。对伪军政人员中的死硬派则严厉打击；对部分能够教育争取的，就晓以民族大义，使其利用伪政权做掩护，为我们服务。

一九四〇年，农历除夕的晚上，我们组织区县游击队，分别对新堂、旧凉城、卓资、三道营等多处敌据点同时进行袭击。我和程林彬同志（现任自治区电管局局长）带领一区游击队袭击田家镇。这天晚上，由于我们多处袭击敌人，搞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蛮汗山区究竟有多少八路军、游击队。这一下子打得敌人龟缩在城镇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广大农村则成了我们自由活动的天下。敌人的活动完全暴露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使我们对敌情了如指掌。

一九四一年春，在芦家天子村召开各区委书记、区长会议。这时正好崞县天子伪警察有二十一人到葫芦太（现名前德胜）催逼粮草。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很快就把情报送来了。当时县区游击队正在吃饭，专员程仲一和县委书记高应杰同志立即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经过短暂的激烈战斗，敌人除一人漏网外，全部被歼被俘，我们缴获了全部武器和战马。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俘虏带到巴

汗好村进行教育，给他们指明抗日救国的光明前途，给他们吃了饭，全部释放了。

在我军打击下，崞县天子的大乡长丁世英托人主动与县人民政府联系，保证在他管辖的地区内群众为我们部队供给粮草和缴纳税款，不加干涉，并愿送给情报等等。对伪保甲人员我们区别对待，只打击那些最顽固的分子。毛不浪乡伪保长李三最反动，不仅不供给我们粮草、税款，还骂八路军是几个“区牛牛”，他气焰十分嚣张，群众恨之入骨。我们对他进行了多次警告，仍不悔改，于是决定对其进行镇压。这年正月十五晚上，毛不浪村闹秧歌，他扮演坐小车的娘子，我们事先布置下人马，正在他表演起劲的时候，我一区游击队将他从小车里拉出来，五花大绑当场处决，并把脑袋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这下震动很大，群众纷纷议论说，八路军真是说到做到，神出鬼没，要想整治一个坏人，他是逃脱不了的。岱海滩的各乡伪保甲人员都因此怕得要死，他们说：“不知哪天自己的脑袋也要被挂在电线杆上。”因而纷纷主动与我区县政府联系，定期交纳公粮、税款、军鞋、给养，有的还从伪军那里买上武器弹药送给我们。他们还经常送情报，使我们能及时了解敌人的动向。

为有牺牲多壮志

蛮汗山区根据地，就象一把锋利的短剑插在敌人的背上，使他们时刻不得安宁。所以，日、伪军一直企图把我们从小汗山挤走。一九四一年五月，敌人从卓资山经过大榆树、太平寨到田家湾镇修了一条公路，增设了据点，企图控制和封锁蛮汗山区根据地的心脏地带，切断我大青山根据地通往晋绥边区及延安的通道，

并不断袭击我县、区游击队，严重的威胁着区游击队的生存。为了确保蛮汗山区根据地，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同志和绥南骑兵一团团长邹凤山同志率领部队，由后方回来，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决定主动向敌人出击，打破敌人的封锁，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让群众给伪八团送情报，敌人没敢出来。第二天，我们转移到南白音厂汗，继续引敌人，结果把住在牛家川的伪军十大队引出来了。一接火，我军就用掷弹筒狠打敌人。敌人很狡猾，听到掷弹筒的声音后，认为是八路军大部队来了，不像区、县游击队，慌忙逃窜。我军乘胜追击，缴获敌人战马数十匹。这次战斗虽然战果不大，但政治影响很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给区、县工作的同志撑了腰。群众说：“还是邹团长有办法，打得十大队老实了。”

由于斗争不断深入和尖锐化，一九四二年秋，日寇对我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我们损失很大，两个骑兵团及大青山区领导机关和支队司令部撤出了大青山，实行了战略转移。区县游击队都受到了巨大损失。蛮汗山区的形势一时十分恶劣，敌人不断的在我游击区增设据点。六道沟、三道沟、崞县天、公鸡嘴、烟口等地，都是三十里、五十里一个据点。敌人不断出来骚扰、袭击。我们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处境越来越困难。当时党指示我采取长期隐蔽，埋伏下去，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们按这一方针，向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布置。为了将来战略大反攻的需要，除了保留少数人的工作联系外，其他同志一律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隐蔽起来。我们只留以赵效敏同志为首的精干的工委，继续坚持蛮汗山区的斗争。

为了坚持蛮汗山区的革命斗争，加强领导，塞北工委派崔岩同志任绥南地委书记，该同志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旭

泥坝与伪军十大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归凉县县长袁明同志被捕，归凉县人民政府和一区遭到严重损失。塞北工委于同年九月又派程仲一同志重返蛮汗山区任专员，领导蛮汗山区的斗争。程仲一同志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十八，在郭木匠沟村被伪军十大队打死，同时牺牲的还有县委书记赵效敏同志。

我当时和王汉珍同志经常隐蔽在山中。白天到山沟隐蔽，晚上下山到可靠的基本群众家吃饭，了解敌人的动态，听取地下党员报告消息。哪些人仍然忠于革命，哪些人不可靠；敌人有什么活动等等。随时掌握各种情况，避免遭受损失。工作极端困难，生活极端艰苦，生存受到威胁，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或抓去，时刻有牺牲的可能。由于我们依靠了广大群众，得以生存下来，坚持了蛮汗山的革命斗争。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被塞北工委调回偏关参加整风学习。程仲一和赵效敏同志牺牲后，一九四四年三月，区工委派原归凉县县委书记程仲群同志带领我们重返蛮汗山区工作。五月上旬回区工委汇报工作，我们住在常收梁罐子窝村。当时伪十大队由平鲁讨伐回来驻在田家镇，由于一区付区长贾海功叛变告密，伪十大队包围了住在常收梁罐子窝村的县政府和一区政府，在突围战斗中，程仲群同志英勇牺牲了。蛮汗山区根据地，可以说是洒遍了烈士们的鲜血。

对于敌人一次比一次更加残酷的扫荡，我们除了继续坚持斗争外，还采取了钻进敌人心脏瓦解敌人的办法，在敌伪政权内部开展工作。五区游击队长郭存山同志带领几名精悍的队员，白天隐蔽在山上，晚上越过铁路线，把北白音厂汉东富生乡的伪保长捉来，逼着他订条件，规定联络地点、交公粮、军需品和税款，警告他们如不遵守，定将严惩。而后取保释放。

什八沙乎子村原来是我游击根据地，自烟口安下敌人据点后，伪保长季罗旦政治上反动，经济上根本不接济我们，不送公粮，不交军需品，更不交税款。一九四四年冬，我们决定把季罗旦抓起来枪毙。后来，游击队把他抓了起来，经教育他态度有转变，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就取保释放了。释放后，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使我们在沙乎子的工作又得到恢复。

松柏乡是我们最早开辟工作的地方之一。一九四五年我们在小巴安图沟村胡栓家，印发我政权枪毙国民党绥东五县地下联络主任多纳苏、伪保长郝禄的传单。正在这时，牛家川伪警察来讨伐，伪保长季润保出去告了密，使我们受到袭击。过后我们把季润保抓住枪毙了。

崞县天子原是我蛮汗山区根据地活动的中心。从一九四〇年秋天敌人在这里设据点后，各种物质就很少供给我们，并且影响到它左右的德胜天子、左卫天子。其中伪保长常步宽起了主要作用，常在政治上非常反动，而且是“家里”的头子。我们决计把他搞下去。经过一番斗争，终于把他搞下去了。经过选择并经县长宋克缙同志批准，由乔黑小同志担任保长。乔黑小名为伪保长，实为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通过乔的串连，使德胜天子、左卫天子也转变了态度。同时我们又派李宽宽做崞县天子的联络员，马二德为左卫天子的秘密联络员，还规定了联络地点、方法和暗号。我们还向各伪保甲人员讲明，必须保证联络员的安全，否则由他们承担全部责任。从此以后，这些伪乡政权，经济上给我们供应，政治军事上及时给我们送情报，形势又逐步好转。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枪杀了乔黑小同志的儿子、媳妇，抢走了全部家产。这使我们万分愤慨。

由于采取上述种种斗争策略，终于扭转了蛮汗山区根据地的

危机，粉碎了敌人企图吃掉我们的阴谋，使这块洒满烈士鲜血的革命根据地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扩大。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一九八〇年十月

蛮汗山抗日根据地回忆片断

张 光 仪

一，蛮汗山区人民盼望八路军

蛮汗山位于乌兰察布盟凉城县的西北部，是大青山的南翼，南北狭长，东西宽约百余华里，层峦叠嶂，地势险要。它北接大青山，南连晋西北，西邻呼和浩特市郊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大青山根据地通往晋西北根据地和延安的必经之地。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脊薄，人烟稀少。除居住有少数蒙族同胞外，大多是历代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农民。旧社会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把寡守”的民谣，形容当年晋北一带穷苦人民出外谋生的惨景。至今这里有些村庄如“忻州窑子”、“崞县窑子”等，仍保存着晋北某些县名。生活在这里的蒙汉劳动人民，共同劳动生息，亲密无间。他们长年呻吟在地主、官绅、兵匪的压榨劫掠的痛苦生活之中。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侵略军进占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把大片国土丢给日本帝国主义，使这一带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从此，蛮汗山地区的贫苦人民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又加上一层亡国奴的痛苦。日伪汉奸、地主土匪勾结在一起，疯狂镇压剥削人民。有的青壮年被抓去给日寇修筑道路工事，去口泉挖煤，粮食被抢劫，牛羊被赶走……人民在苦难

的深渊中挣扎。他们怀着满腔民族仇恨，要求抗日救国，盼望共产党、八路军的早日到来。

二、我军奉命开赴大青山

一九三八年五月，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战争发展情况，决定出师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按照中央指示，命令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同志和参谋长姚喆同志率领七一五团及战地总动员会游击第四支队（即太原成城中学师生游击队）和一部分战总会的地方工作人员，向平绥铁路以北的大青山地区挺进。

部队经过短时间的组织动员，八月初从晋西北五寨县出发，经过几天行军，进入朔县、平鲁一带敌占区。这样一支数以千计的主力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对敌人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威胁。于是敌人从大同、归绥等地，调集了大量日伪军对我阻击。塞北的初秋，凉气逼人，加之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乘夜幕的掩护，翻山越岭，和敌人在长城内外周旋了二十多天，才到达了蛮汗山地区。这么一点艰苦的历程，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来说，不足挂齿，但对我们第四支队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兵来说，不能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我军进入蛮汗山地区的第三天，正准备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之际，敌人又调集大批人马，分几路前来截击。敌人从东南面堵住我军退路，西北方面大量敌军把守住土默川出入蛮汗山区的太平寨、东沟门等要道，北面用重兵封锁平绥铁路，大有与我军在大抢盘山一带决一雌雄之势。

早晨，姚喆同志命令我们迅速通过十八沙乎，向大抢盘山靠

拢。当我们跑步登上山头时，十八沙乎一带已是枪声大作、炮声隆隆的战场了。姚参谋长告诉说，我们的刘支队长带的那几个连，现在已经过了铁路进入大青山。我们今天过不去了，但我们完成了掩护他们的任务。

大抢盘山地区，只有十几个村庄，这一带的群众接触八路军是第二次了（我警备六团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对我军已有一定感情。敌人向我阵地进攻了大半天，被我军打退。这时，熊明星副官带领群众，冒着炮火给我们送来水饭。姚参谋长对我们新兵连很照顾，让我们先吃。到黄昏后决定突围时，也没有给新兵连布置任务。我们冒雨行军，在这一带和敌人兜了几个圈子，甩掉了敌人。经过几天的休整，补充了一些冬衣，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堵截，终于到达了大青山，和先期到达那里的同志们会合了。

三、坚决贯彻上级决定 在蛮汗山站稳脚跟

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蛮汗山是大青山的南面屏障，控制蛮汗山地区，不但西可以威胁归绥市，东可以逼近大同，北可以威胁平绥铁路，它还可以连接大青山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因此上级决定由七一五团一营营长邹凤山同志率部开辟蛮汗山根据地，作为大青山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份。一营指战员多为红军老战士，新兵也多是关内人，对塞外气候很不适应。因此病员很多，有的被冻坏了手脚，但在群众帮助下，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在这里我们消灭了大部份土匪，粉碎了多次日伪军的扫荡，站稳了脚跟。但不久，七一五团奉命开赴冀中平原，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只留下邹凤山同志和教导员刘作霖同志带领一个排的兵力继续在蛮汗山根据地活动。

当时蛮汗山根据地面积不大，南北几十华里，东西百余华里。因此，决定东向岱海滩（在凉城县境内）和西向土默川平原发展，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日伪军多是骑兵，凡较大的扫荡，敌人都出动汽车和装甲车配合，不时还有从归绥飞来的敌机骚扰。这就给我们步兵造成很大困难，往往形成敌进我不便退，敌退我没法追的局面。有时眼看要捉住的俘虏，转眼之间被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组建骑兵。但是马从哪里来呢？我们从地主富户那里征集了一些，但大量的来源还必须从敌人那里打主意。我们抓住敌人骑兵进山扫荡的机会，夜袭其驻地，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一个队的主要任务是缴获战马，战则力求全歼，勿使敌人跑掉。再是打土匪搞马，既为民除害，又得到了马匹，一举两得。但是部队不断扩大，需要的马匹很多，于是我们就转到外线作战，到敌占区袭击敌人骑兵据点搞马。

一九四〇年冬季，我蛮汗山部队已扩大为一个支队，部队正需要冬衣和战马。这时候敌人从凉城、丰镇、归绥调集数以千计的日伪军，发动了对蛮汗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决定转向外线作战。离开山区后，立即组织侦察小组，迅速查明了老平地泉和隆盛庄两地敌军情况。经过分析，认为平地泉距敌占重镇集宁很近，而且马多，逼近平绥铁路，打它即打到敌人的要害之处，可以迫使进山扫荡之敌回防。根据这个分析，于是邹凤山、刘作霖、冀文广等支队领导同志决定打老平地泉。经过周密计划和准备，第三天黄昏，我军从凉城的岱海滩出发，急行军一百多华里，午夜到达平地泉地区，迅速安排好马桩子，在夜幕掩护下，侦察员带领部队急速奔入镇内。等敌人岗楼上的哨兵发觉喊口令时，我突击连在邹凤山同志带领下，已冲到敌人围墙下。我一班战士和机枪班长王付之，首先奉命登上云梯，紧接着几个班陆续攀上围墙，

我步枪、机枪一齐向院内敌人开火，手榴弹不断在敌群中爆炸，顿时敌人乱作一团。这时一群敌人企图乘汽车逃跑，邹凤山便指挥战士向敌人汽车射击，这伙日寇看到不能乘车，便向东面天主堂逃走。伪军见日军逃跑，也停止抵抗，四散逃命。我们用一个排的兵力牵制着躲到天主堂的日寇，其余兵力打扫战场。但几辆汽车没法带走，邹凤山同志命令把它烧毁，王付之同志端起机枪向油箱来个点射，顿时汽油冒着火苗，喷出箱外，越烧越旺，照亮了半个平地泉。这几辆汽车是昨天下午才从集宁载着一百多日军开来，准备扫荡蛮汗山区的。尚未进山已成灰烬。

这次袭击，只用三十分钟便结束战斗，捉了很多俘虏，缴获近百匹战马和一批武器。在清查俘虏中，有一个俘虏向我们说，他已是第三次向八路军缴枪了，并指给我们说，那个穿皮靴的俘虏是伪县长，前几天才和几个伪军官从集宁来。我们从那个伪县长身上搜出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类的辞句。可以看出这个民族败类的丑恶灵魂。

待第二天早上，集宁的日伪军配备装甲车前来增援时，我们已休息在百里之外的蛮汗山区了。

不久，蛮汗山骑兵一支队改编为骑兵一团，活动地区不断扩大，东至丰镇县东滩，南至长城两侧，西至和林县、土默川都是我们活动的地方。

四、反顽斗争

我军日益壮大，不仅使日伪军感到威胁，国民党顽固派也感到不安。他们派赵厉师、郭怀汉率领的所谓自卫军第四路和第七路军，串到我蛮汗山根据地边沿进行捣乱。他们打着抗日的旗

号，专搞反共摩擦，经常袭击我地方政权和游击队，抢劫百姓。我们屡次劝告他们团结抗日，他们不但不听，并且暗地勾结日伪军，反对共产党。我们忍无可忍，在绥南给自卫军以迎头痛击，多数被我消灭，残余的一部分投降了日寇，少数的当了土匪。

和林县有个以刘银赖为首，打着“国军”旗号的匪伙，经常抢劫百姓，向老百姓要大烟，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有一天和林县孔都岭附近某村一个姓王的老汉，跑十几里路来小抢盘山地区甘沟子村找我军工作组，控诉刘匪要抢他女儿做小老婆，限三天要人，全家苦于无计，来求八路军搭救。我工作组当时只有两个人，两枝短枪，向部队报告已来不及了。我们和老汉商量好对策，叫他回去佯作同意将女儿嫁与刘匪，在第三天晚上请亲友吃饭后，送女儿出嫁。为了不扩大风声，要刘匪少来些人并且待天黑后再进村。我们第三天黄昏按原定计划来到该村外，与王老汉取得了联系。他说，已与刘匪商定今晚来娶亲。我们又研究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措施，约定了暗号，老汉就回去作准备去了。当晚老汉请的客人中有几个年轻勇敢的小伙子，准备对付敌人。到时刘匪果真来了，共四个人，两枝大枪。王老汉全家热情地招待这伙匪徒，他的女儿也穿上新衣服出面招待。刘匪信以为真，欣喜异常，加之这一带我们不常来，他们无所顾忌，因而纵情吃喝。王老汉把刘匪的哨兵也招呼进屋里喝酒。此时匪徒们只顾欢饮，万万没有想到我英勇无畏的八路军战士，已经撒下法网，正待捉妖降魔。就在这时，我们乘其不备，猝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刘匪听见门响，立刻惊慌的用手摸枪，却被两个小伙子紧紧抱住。我们说：“不许动！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三个匪军乖乖地举手投降了，但刘匪和两个小伙子却从窗口翻滚到院子里。我们的小张同志也从窗口跳到院里，从刘匪身上抽出他的

手枪，并高声说：“我已缴了你的枪，再顽抗死路一条。”于是刘匪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躺在地上哀求饶命。由于在搏斗中，别的老乡在他腿上砍了几刀，血流如注，他爬在地上不动了，我们无法把他带走，为了给民除害，枪毙了他。在其余三个俘虏中，经查明有一个名叫“红宝”的，是我们的一个叛逃分子。三个月前他骑马带枪投向哈喇沁的日寇据点，但日寇只要了他的枪和马，没要人。后来他又投靠刘银赖当了土匪，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我们坚决枪毙了这个投敌叛国分子。后来听说刘的残部十余人于出事后第二天，即向绥西逃跑了。

五、粉碎日寇的扫荡和封锁

蛮汗山抗日部队日益壮大，我绥南专员公署和各县区政权普遍建立，敌占城镇及交通线不断遭受我军袭击，敌人不得不抽调大批兵力防守，我蛮汗山根据地已成为敌人心腹之患。因此敌人又在我区边沿的牛角川、大榆树等地增设了据点。敌人的大规模扫荡更加频繁了，同时还在进出蛮汗山区的主要山口，用石头筑成三丈高的大封锁墙，企图堵死我出入山区的道路。但是，敌人这些办法，都不能阻止我抗日铁骑的活动。

一九四〇年秋，我军到达土默川边沿的东沟门宿营，哈拉沁据点的敌人发现后，第二天拂晓向我发起攻击，我军迅速撤到村东南高地上。敌人进村后、以为我军已撤进山区，竟在村里横冲直闯。天亮以后，邹凤山等领导同志和配合我军行动的警备六团，观察分析了地形和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组织反击。我骑兵得到命令后即从左右山沟隐蔽地出去，分两路直插敌南北两翼，警六团步兵从正面向西发起攻击。敌人见势不妙，开始撤退，在我

优势兵力的三面夹攻下，经十多分钟战斗，敌死伤累累，拼命奔逃。这次战斗、仅我二连即缴获日寇十二年式（歪把子）机枪两挺，牛头驳壳枪两枝以及其他武器弹药。我们过去总想弄到日本的歪把子机枪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随着我军主动出击次数的增多，给敌人的威胁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为配合苏德战争，做从外蒙进攻苏联的准备，把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当成了他必须扫除的重要障碍。于是调集大军向大青山、蛮汗山大举进攻，妄图一举摧毁我根据地。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力迅速转向外线，进入敌占区。山区只留地方政权和少量游击队与敌人周旋。敌人在蛮汗山区周围又增设了崞县窑子、淤泥滩等好几处据点。从此就使我军任何一个宿营地，距敌人据点都不超过卅华里。我军在一个地方住上两天不打仗，简直就是罕见的太平时期。战斗频繁，牺牲人员是不可避免的，仅以原第四支队为例，最初有二百多人，在大青山地区坚持了八年之后，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十几个人了。象阎焕景、阎焕耀、阎焕春兄弟三人，全部牺牲在大青山。为了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军指战员不能脱衣睡觉，长年人不脱衣，马不卸鞍，同志们的虱子从头长到脚。睡觉不脱鞋，靴子里生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不能讲卫生还可对付，马就不行了，你不给它卸鞍打扫，他身上发痒，就带着鞍子打滚，常不打扫，马背也会生疮。为了保持战马健壮，战士们特别辛苦，抓紧一切较安全的机会迅速给马打扫。战士爱枪，骑兵战士还要加上一条爱马。他们经常找一些马最喜欢吃的草来喂。在战斗中搞到一点水果糖，也要分一半给自己的马子尝一尝，这样就和马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而在战斗中出现危急情况时，马总要千方百计带走自己的主人。

六、敌占区人民对我军的宝贵支援

一九四一年以后，我军主力多半在敌占区活动，山区主要靠地方政府和游击队坚持。在敌占区我军经常是黄昏出发，午夜到达近百里外的地点宿营，白天开展群众工作，黄昏又出发。有时我们派武装工作组到敌人据点附近去工作，甚至有时进入敌据点内工作。一九四〇年冬，我们两个人，黑夜进入土默川敌黄合少据点，向导直接把我们送进伪乡长家里。我们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爱国，协助我八路军工作。经过教育，他有所醒悟，表示愿意给我们帮忙，我们需要什么，他尽量给办，并答应指定两人和我们经常取得联系。这个伪乡长和这个据点的伪保安队长私人交情好，我们就利用他做伪保安队长的工作。他把伪保安队长骗到家里吃饭和我们见了面。他们都是本地的地主，有房屋田产、妻儿老小，慑于我军的威力，怕受到我政府的惩罚，因而在我们指出他们的罪恶并晓以民族大义后，他答应对我们的安全负责，并且今后愿为我们的工作给以方便。天黑以后，伪乡长派人送我们返回山区，并建立了联络点。类似这样的联络点，我们在卓资山、旗下营等敌占区建立多处。在归（绥）、凉（城）公路上的倒桑树（村），就有那么一个自称是三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的乡长，谁来了也欢迎。我们利用他给我们买过不少物资。

一九四一年夏天，部队需要换单衣，从敌占城市买大量灰色布很不方便。这些有关系的人，给我们买了一批伪军服装，这种衣服对我们也起过作用。一九四二年秋，我二连在和林县活动时，被敌人三路阻击，但我们的部队穿上伪军服装，绕开了敌

人，占据有利地形，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阴历八月十五就大雪纷飞。我们的部队还没有穿上棉衣，许多战士冻坏了手脚。当我部队活动于凉城县岱海滩至丰镇之间的敌占区时，当地群众看见我们只穿单衣过冬，对我军英勇顽强的精神很受感动；加之我军纪律严明，群众对我军给以无限的同情。仅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里（村名忘记了），很快就给我们募集起一百多件冬衣。在日伪军统治下的群众，生活已很艰难了，还给我们捐赠衣物，充分表达了敌占区人民的民族情、阶级爱，及对我军的爱戴和支援。后来我们派人送去价款，他们坚决不收。群众的热情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战士的斗争精神。

我大青山（包括蛮汗山）抗日根据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军民团结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封锁，战胜了日伪顽的夹攻，克服了重重困难，使我军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时我蛮汗山根据地已发展为整个绥南连接杀虎口内外的一个广大地区。

一九八〇年五月

追忆刘洪雄烈士

刘 璧

刘洪雄烈士是我区较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青少年时期即开始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受到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于一九二六年在太原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活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和杨植霖、高凤英等同志一起组织大青山抗日游击队。一九三九年在归绥市（即今呼和浩特市），从事地下活动，组织“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行地下抗日斗争。后因叛徒告密，绥蒙抗日救国会破坏，刘洪雄同志和大批会员被逮捕杀害，造成华北地区有名的大血案。刘洪雄同志在敌人的酷刑之下，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我是刘洪雄同志的胞弟，在他生前的影响和教育下，也参加了抗日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被送往延安学习，以后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洪雄同志牺牲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以豪迈的步伐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这大好形势下，为了缅怀先烈，激励生者，教育后代，仅将我所知道的有关洪雄同志的事迹，作一简略介绍。

一、早期的革命活动

刘洪雄同志，原名刘典，呼和浩特市郊区腾家营村人，一九〇七年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腾家营村座落在呼市东郊白塔（辽代古塔）与白塔火车站之间，当时全村约有五十余户人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勤劳的农民，在封建地主官僚的压迫剥削下，终年劳苦，不得温饱。他们都是“车把式”。由于赶大车出了事故，腿被碾断致残，因此生活每况愈下，非常窘迫。

刘洪雄同志从小热爱劳动。七岁时入私塾读书，不仅学业专精，还工于书法绘画。一九一九年，他进入呼市北高（旧城北门外，市立第一高小）学习。这时正值“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席卷全国，刘洪雄同志激于爱国义愤，与同学们一道上街演讲、宣传，张贴标语，查禁日货，打倒“孔家店”，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

刘洪雄同志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经过几次辍学，才于一九二四年高小毕业。因家里供不起学费，只好考入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公费）求学。“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我国有了广泛的传播。他受到进步书刊和进步同学的帮助，开始阅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并和同学们一起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初步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一九二六年他在太原国民师范求学时，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同太原各学校进步学生取得联系，满怀革命热情，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斗争。他对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极其痛恨。他决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这年夏天，经地下党员王瀛同志（以后牺

牲)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洪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他组织进步青年攻读马列著作,他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观察了解社会的种种现象,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常说:“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为革命学习、工作。只要是劳动人民的事,我都热爱,最困难的地方,最艰苦的工作,我都有勇气接受考验,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一九二六年正是大革命的高潮年代。当时的太原国民师范又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学生要求进步,要求革命,他和同学们深受国民革命军北伐形势的鼓舞,欢呼北伐军的胜利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正当全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断送了革命。在太原的国民党右派,也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组织上决定刘洪雄同志转移到北京。他到北京后,经常秘密到门头沟做矿工的工作。

在北京他生活非常困难。在艰苦的岁月中,他同正在北京教书的王素芬同志结了婚,家住前门外李哥老胡同一号,依靠爱人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大芝,女孩叫大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北京沦陷,王素芬和两个孩子均失踪了。这对洪雄同志在生活上、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但这更加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在痛苦中仍坚持革命工作,他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献身。

二、积极参加东北义勇军和抗日同盟军

一九三三年初，经组织决定刘洪雄同志到东北义勇军第三路×师任通讯大队长，后任支队长。这个师的师长是刘道远，参谋长是王进安。据说王是洪雄同志的岳父，对他很器重。年仅二十五岁的洪雄同志，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斗的。据说全支队有枪的战士仅二百多人，不能和敌人硬拼，只能深入山谷，待机歼敌。有时没粮食吃，就挖野菜、草根充饥；没房子住，就在森林里搭茅棚。通常是白天休息，夜晚翻山越岭进行活动。一九三三年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炸伤了腿，组织上决定让他返回家乡治疗。

哥哥回来后，一边养伤，一边还关心帮助我学习文化，讲解国家大事。这时我对他才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当年夏季洪雄同志伤愈后，组织上又派他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方振武（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吉鸿昌（共产党员）等所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团长。临行前他探望了乡亲们，并满怀信心地说：“打败日本鬼子，我就回来了。”他的抗日爱国言行，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认为哥哥是好样的。

他在抗日同盟军中积极向部队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进行军纪的整顿和军事训练，还参加了几次抗日战役，均取得了胜利。抗日同盟军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伪的侵略气焰，振奋了士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赞扬。但是蒋介石出于卖国独裁的需要，下令解散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毁察绥抗战于一旦。洪雄同志怀着满腔义愤，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一九三三年冬，他回到家乡以后，经常同奎壁、杨植霖等同

志聚会，共同总结斗争经验，继续坚持抗日，并准备建立自己的武装。一九三四年春，他以私立名言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组织力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时我已上了小学，成为他的学生。名言小学总校设在呼市东郊白塔车站附近的腾家营村，还有分设在保尔合少、讨思浩、塔利、黑土涯、毫沁营、毕克齐等村的几个分校。教员中的共产党员除刘洪雄外，还有王建功（现任内蒙政协付主席、内蒙党委纪委委员）胡泽润（后回原籍湖南）、王英杰（后回原籍河北）等同志。还有个姓乔的同志常来这里。

当时在名言小学的围墙上写着：“打开中国教育的新出路”、“劳心与劳力相结合”、“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等标语。洪雄同志采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方式，对名言小学进行了一些改革，如：（一）废除学生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课程，改用全国通用教学课本与日常生活常识课本，如《老少通》、《千字文》等。每周都讲时事课（宣传爱国抗日）。（二）、免除生活困难学生的学费，实行小先生制，并组织了儿童自动服务团（我被选为总校儿童自动服务团团团长），办农民夜校，学文化知识和讲解国家大事，很受农民欢迎。（三）、提倡农闲学习，农忙劳动。（四）、上早操和军事训练。除此，每周还要办讲演会、故事会、生活会等活动。

刘洪雄同志在学生和群众中威信很高，群众有事都愿找他。他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抗丁的活动；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拥护。我也被他这种革命爱国的新思想所陶醉，感到学校新鲜有趣，仿佛满天乌云就要被抗日救国的气氛驱散，新的生活就要来临。

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在名言小学总、分校七百余师生中，撒下了革命火种。如：王智德、李天才、石来根、李三仁、李四巴

等十余人，都是当时被刘洪雄吸收参加革命的学生。邢义、李崇荣以后还入了党。保尔合少村的彭光华（现任云南省保山县法院院长）、张凤鸣（现任山西省轻工业局付局长）、潘赐福（现在北京军区工作）、于平（现任包头昆区付书记）、张旭（现任呼市郊区粮库主任），都是洪雄直接培养起来的党员干部。“名言”这个学校是有革命传统的。它在宣传抗日、培养革命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教育激发农民的抗日情绪、准备组织抗日武装等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参与发动和组织“绥蒙 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军队望风披靡，把大片国土葬送敌手，绥远省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也都逃之夭夭。溃兵和土匪趁火打劫，扰害百姓。群众怀着悲愤的心情，连丰收的庄禾也无心收割。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这年十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归绥城。从此，这一带的人民便坠入日寇的血腥统治之中。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员杨植霖、刘洪雄、高凤英等几位同志，便挺身而出，发动群众组织“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进行武装抗日。他们先从名言小学聚集了一批抗日青年学生，由彭光华同志刻制了队章，又从国民党溃兵手中缴来一部枪枝，而后又募捐一部分款项，买来一些枪枝，经过积极筹备，“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于一九三八年春正式成立。开始仅有几十个队员，如腾家营村的王智德、李

天才、邢存奎、石来根、李三仁、李四巴等；杨植霖的家乡什报气村和高凤英所住的保尔合少村，都有不少人参加了先锋队。抗日先锋队的大旗在大青山一树，从者如流，很快发展为几百人的队伍，这给蒙汉各族爱国人民以极大鼓舞。我当时才十六岁，抗日救国的热情激荡着我的心灵。经洪雄同志同意，我也参加了先锋队的行列，留在村中做交通联络工作。先锋队经过组织整顿、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很有起色，非常活跃，一般抗日的洪流在土默川一带奔腾高涨。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归绥城郊周围，迫使日寇不敢轻易出城。

侵占归绥的日寇，为了扑灭这股新生的抗日火焰，集中了大批日、伪军，向先锋队发起进攻；加大青山区土匪庞杂，互相残杀火并，群众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此时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也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游击队为取得党中央的领导与支持，派刘洪雄同志化妆为农民，冒险赴晋西北八路军一二〇师，汇报和请示有关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情况和问题。经党中央指示和取得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的支持后，派李井泉同志和姚喆同志率七一五团及四支队，来大青山与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会师，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秋，刘洪雄同志同陈景隆（曾任支队民运科长，后牺牲）、郝登洪（后任归武县委书记，后牺牲）两位同志，随同七一五团返大青山。沿途冲破敌人重重封锁，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打击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威震长城内外。七一五团与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在大青山会师后，在政治上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在军事上打破了敌人的围攻，在经济上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困难。八路军来了，广大群众高兴异常，奔走相告，纷纷捐款送粮，支援我军，就是城市的各界爱国人士，也捐献钱物给我

军，表示支援抗日的心意。军民情绪振奋，一派抗日的大好景象。为了做好敌占城市的抗日救亡工作，党组织又派刘洪雄同志潜入归绥城，进行地下工作，开辟敌后第二条抗日战线。

四、建立地下抗日组织

“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

日寇占领归绥后，组织了伪军和伪政权。搜罗汉奸蒙奸、土匪恶棍，为他们效劳，镇压群众，并开始向农村、山区“扫荡”，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做，城市里也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阴影。当父母亲和我都焦燥地惦念着洪雄的消息的时候，他带领着郝登洪同志回家了。听说八路军到了大青山，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感到有了希望和信心。

洪雄同志在东北义勇军时，曾与徐秉初、魏赐泰相识，经郭久成联系，结成了拜把兄弟。这几个人后来都在归绥的伪军中担任高级职务，徐为伪军×师师长，魏为参谋长。他们虽不是共产党员，但都有爱国热情，“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情八路军抗日。经徐、魏、郭三人的极力推荐，洪雄同志进入日本宪兵队，担任了少校参谋。并通过徐、魏介绍，郝登洪同志到徐魏部下王振铎团任了副官（郝化名乾光），后因被敌特侦悉包围，郝率全团士兵直奔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后担任归武县委书记（又化名赵光，曾在呼郊小井山区一带活动过，群众称他为赵副官）。洪雄同志与郝登洪同志密切配合，经常活动于市郊的农村和山区，有时化装成伪军，携带枪枝弹药出城送给游击队。

一九三九年春，他与宁德青（以后病故）、贾恭（四〇年牺

牲）、张克敏（四〇年牺牲）等人秘密组织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当时归绥市财神庙的蒙疆道教会，作为活动基地。道教会的老道王信真、王信怀、王永茂都同情抗日，积极掩护我党同志进行工作。财神庙里院正殿为和尚所占；东厢房正中间挂有太上老君、五祖、七真神的图象，桌凳齐全，灯火辉煌，烧香敬神者络绎不绝；西厢房是三个道人的宿舍，设备简单、幽静，三个道人各住一间，通常彻夜不眠，打座念经至天亮。外院东房由看庙人所住，西房中间，是道人餐厅和传道室，也供敬香人临时休息。院中座落一小牌楼，隔成里外两院。庙门外挂“蒙疆道教会”的牌子。

刘洪雄同志与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其他同志，以道教会作掩护进行工作，老道王信真任道教会会长，洪雄任道教会董事。我们同志开会联系工作，经常是在外院的西房。洪雄工作非常谨慎，他同宁德青、贾恭等同志一次正在研究发展救国会会员的要求、方法、手续时，发现院内有可疑人，他就站在传教用的黑板旁，手执教鞭传起道来。待那人走后，接着继续开会布置工作。还有一次，郝登洪和彭光华同志来我家与我哥哥刚把工作研究毕，敌人进村了，四个伪军抢先闯到院里要搜查。郝、彭二位同志在屋里持枪严阵以待，可是洪雄同志却镇定自若，从屋里走出大声说：“你们来干什么？”伪军说：“查坏人。”洪雄同志说：“谁是坏人？”几个伪军打量着洪雄的伪军官服和腰里的手枪，连忙道歉说是查八路军的，走错了门。就夹着尾巴退了出去。郝、彭二位同志包扎好洪雄同志给上级党组织的信，乘黄昏佯作到井边饮牲畜，避开了敌人。洪雄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做秘密工作，要小心谨慎，机智勇敢，严守纪律，保存组织，必要时牺牲个人。”在实际工作中，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大青山根据地和归绥市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设在腾家营村我家里，由我做交通员。同志们在这里接头，文件由这里转送。大召前南柴火市街的焙（饼）子铺是当时新开的，专供洪雄、宁德青、贾恭等同志开会、工作用的。打焙子用的面粉，都是我从村里进城传递文件、书信时捎进来的。南柴火市街梁福润同志（以后牺牲）以小学教师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主要活动于教育界，洪雄同志常去他家听取汇报和布置工作，经常让他刻印宣传或翻印文件。人市街贾恭同志的弟媳家，是洪雄同贾恭同志研究捐献物资、购买枪枝弹药支援我游击队等工作的地方。东顺城街徐秉初家，是洪雄同志与徐秉初、魏赐泰研究和布置开展敌军工作的地方。徐的女儿徐明毅也具有爱国思想，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龙王庙巷前的海窟街我姐姐家（我的姐姐结婚后被婆婆折磨成疯子），这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我姐夫辛宽也是救国会员）。过去洪雄与奎璧同志曾来这里开过会。除我之外，谁也不大知道洪雄同志是经常晚上来这里住的，别人也没注意他在城里还有这么个亲戚。还有大召东仓郭久成老道的戒烟所，也被洪雄同志利用起来了。郭久成老道（四〇年牺牲）非常同情抗日，喜欢江湖好汉，仗义疏财。洪雄同志通过他团结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捐献活动，并以设香堂、助人戒烟为掩护。和他来往的有说书的、卖药的、唱戏的、工人、农民、商人、职员、讨饭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穿长袍短褂的，穿高跟鞋、抹口红的，提篮叫卖的，五花八门。就这样，郭老道竭尽忠诚，为抗日救国做出了贡献。这些，都为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洪雄同志还注意了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吸收了一些爱国觉悟较高的人入党。他很重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工作。许多教师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救国会，有的青年入了党，并且把许多爱国青年送

往延安学习。如何树声（原包钢书记）、周兴元（原包头市副市长）、余平（包头昆区村书记）等同志和我，都是当时入党后被送到延安学习的。还有王贤敏（原内蒙党委宣传部艺术处长）、希宁卜斌、黄媚梅等同志也是一九四〇年同我们一道去延安的。

在我去延安之前，哥哥曾先向我透露拟送我去延安学习的意思，征求我的意见。这正是我早就心向往之的事，于是我就欣然应诺。但又怕父母不同意，还是哥哥给出了个主意，就说是去“北平陆军治安部军官学校”学习，父母就放心了。他还向我说，去延安路上要担风险，弄不好要掉脑袋，要我仔细考虑，三思而后行。过了一两天，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宁德青同志从城里来找我说：“去延安的事你想好了没有？本来，你哥哥和你谈过就可以了，他还是让我再来和你谈谈。你哥办事就是认真。”当我向他亮明愿去的态度后，他就高兴地回城了。这天晚上，哥哥又从城里回来，把我从睡梦中推醒，凭着昏暗的油灯，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姚兄：今有舍弟刘璧去延安，希让他学习军事知识，回来后好作敌军工作。

方克

一九四〇年 月 日

信上的姚兄，就是大青山根据地的姚喆司令员，方克是我哥哥的化名。他把信缝进我的棉衣里，并对我说：“你这个小组从家里出发时有张纯公、贾连喜，由彭光华带你们上大青山。一路上要听从指挥，同志间要互相关心，必要时牺牲自己，保护别人。”他还给我讲了路上可能迂到的许多问题的细节，大部分都是我不曾想到过的。

在归绥城里，我们小组的几个人汇齐后，当晚乘火车到了旗

下营，又按照指定的路线到达斗金山。大青山的游击队长王德中带着人马来接应，我们骑马连夜上了大青山根据地。进入大青山后不几天，又从归绥、集宁、土默特旗来了二十几名学生，女学生还大都穿着旗袍，有一个女学生骑马丢了高跟鞋，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不几天，姚喆司令员派兵护送，辗转千里，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欢天喜地地开始革命学习生活以后，从故乡来延安的一些同志，带来了使人心碎的噩耗——洪雄同志英勇就义了。

五、机智勇敢，舍己救人；

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我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经常在归绥城里城外活动。他们有时穿着伪军服装，把从城里带出来的枪枝弹药、衣物、食品，络绎不绝地运往山区根据地。洪雄、宁德青、贾恭等同志领导的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对绥蒙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的活动，对日寇是很大的威胁，于是敌人加强了对我党地下活动的侦察破坏活动。

刘洪雄同志有个秘书叫刘炜，是宁德青从山西介绍来的，公开身份是焙子铺的伙计。洪雄和宁德青当时正组织青年学生去延安学习，与巴盟（日伪时期，呼市属巴彦塔拉盟）盟立师范搞联络工作的是刘炜。这时刘炜正追求巴盟师范女生燕曼云，并擅自决定介绍她去延安。燕和刘谈恋爱的同时，还和一个日本翻译保持暧昧关系，并向他透露了刘的意图，引起了这个翻译的注意。

一九四〇年春，洪雄同志已发现他的秘书刘炜的生活开始腐化，谈情说爱，吃吃喝喝，不愿做艰苦的工作。经教育批评无效，打算介绍他去大青山根据地工作。这时党转送青年赴延安学习的工作正抓紧进行，彭光华同志已送到大青山两批学生，我也是这次去的。各地去延安的青年，都在绥中动委会所在地乌兰合少村^①集中，有三十七人（包括从绥西^②来的）。这在归绥市引起震动，伪巴盟师范走了几个学生的消息，也被特务侦知。同年夏，日寇河野集中了日本宪兵队、伪蒙古宪兵队和伪警务厅的大批军警、特务、便衣侦探，对我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行侦察。和燕曼云搞暧昧关系的那个日本翻译，采取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先从巴盟师范女学生燕曼云口中，侦悉我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动员学生到延安学习的情况，又利用刘炜擅自接触燕曼云的时候，在三官庙街首先逮捕了刘炜。接着敌人于旧历七月十五日，包围了巴盟师范，开始了大逮捕。

洪雄同志闻讯后，立即召集宁德青、张克敏、贾恭、彭光华、张旭等同志研究对策，分析了刘炜平时生活腐化和拒绝批评教育的表现，以及他对要调他到大青山根据地工作不满，他会经不起考验而叛党。洪雄提出要向最坏处着想，要保存实力，立即撤退。并当机立断，决定张旭立即撤出三官庙街联络点，返郊区通知支部党员隐蔽起来（以后这个支部未遭破坏）；宁德青骑洪雄的自行车出城弃车后上大青山根据地；张克敏通知商业界爱国人士提高警惕，隐蔽起来；彭光华通知郭久成老道出城隐蔽；贾恭通知梁福润、岳甫同志等转移。敌人在城里捕人，洪雄往城外

①乌兰合少村，在今武川县境内。

②当时的绥西地区，指包头、固阳、萨拉齐及归绥、武川以西地区。

送人，他就这样整整指挥了三天。同志们都催他走，他总说要把他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都做完，再离开归绥市。最后他亲自把贾恭送出城，又返回财神庙想把道教会的王信真、王信怀、王永茂三个支持与掩护抗日活动的道人，营救出去脱离险境。洪雄就这样勇敢机智，舍己为人，极力设法掩护同志外撤，并想通过自己在日本宪兵队的关系营救被捕的同志。正当他紧张地指挥同志们转移的时候，由于叛徒刘炜的告密，他在财神庙被捕了。

刘洪雄同志被捕后，被囚在东顺城街日本宪兵队。他看到先后入狱的共产党员，抗日救国会员，还有无辜的群众，心中非常难过。他要共产党员严守党的机密，鼓励大家同敌人坚持斗争，要“敌我不两立，革命不苟且，舍得一身剐，誓死要救国。”敌人为了利用叛徒监视犯人并作劝降工作，把刘炜放进狱中。洪雄同志根据救国会员被捕人数之多，且骨干大部被捕和刘炜的神态，断定刘炜已经叛变，于是刘洪雄同志就挺然昂立牢房，带领大家高呼：“要与叛徒斗争到底，叛徒可耻、决没有好下场！”吓得混在狱中的叛徒刘炜胆战心惊，被敌人拖着滚出了牢房。

刘洪雄同志入狱后，敌人几次审讯，使用了各种酷刑，都未能使他吐露丝毫党的秘密。不到半月的时间里，他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头打破了，腰打折了，腿打残了，手指被电烧焦了，但他身残志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痛斥敌人侵略罪行，辱骂汉（蒙）奸特务叛徒。他以昂扬乐观的英雄气概，举起带着铐子的双手，咬破中指，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明朝于谦所作的气吞山河的诗句：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青白在人间。

但是痴心忘想的敌人，还想从洪雄同志嘴里了解归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情况。一再施用酷刑要洪雄同志招供。洪雄同志根本就不把他们的老虎凳和灌辣椒水放在眼里。他几次在敌人的酷刑下死去活来，但依然是牙关紧闭，一言不发。敌人看到从洪雄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便恼羞成怒，最后于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用绳子把他勒死了。刘洪雄同志终于坚贞不屈地壮烈牺牲了，时年仅三十三岁。

正当我愉快地在延安学习时，忽然听到胞兄英勇就义，日本人抄了我的家，父母双双病故的消息，这简直象一声晴天霹雳，顿时使我心如刀割，悲痛欲绝。经过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劝慰帮助，我揩干眼泪，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接过烈士手中的旗帜，继续前进。他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光荣，我为有这样的哥哥而感到骄傲。

刘洪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宝贵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他那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为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爱护干部，谦虚谨慎，艰苦朴素，遵守党纪，无私无畏，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每当我在工作中迁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哥哥那高大的英雄形象，鞭策着我前进。同时使我联想到革命的胜利和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把大批革命老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加以残酷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死者也不放过，诬蔑刘洪雄烈士是叛徒，给我施加压力，要我重新估价胞兄的历史，并派人拿着烈士的照片走遍全

国搜集诬蔑、陷害烈士的黑材料，甚至让出卖刘洪雄同志的叛徒写诬陷材料，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真是无耻之极。

现在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忆述了刘洪雄同志的英雄事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借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也是对林彪、“四人帮”之流的有力批判。让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在祖国四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吧！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二日

忆红召二喇嘛支援八路军抗日

李招龙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寇的铁蹄踏进了绥远地区。在这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九三八年秋，李井泉、姚喆同志率领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大青山地区的各族各界人民热烈拥护和支援八路军抗战。卓资县红召二喇嘛就是积极支援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事迹很多，现就我所知道的，略记一、二，供同志们参考。

红召在卓资县西北部的山区，它附近有座喇嘛庙，座落在淳儿梁脚下的乃木带滩。这里水草丰盛，牛羊成群，是个天然的好牧场。这一带的蒙汉人民依靠这块土地休养生息。庙旁有个南营子，是汉族村落，和这里的蒙族群众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大家都有爱国抗日的共同心愿。

这个喇嘛庙有几座佛殿和几重院落，喇嘛最多时有一百余人。他们拥有数百只牛、羊，上百匹的马。喇嘛中威信最高的是补英尔计，又名二喇嘛。其人管庙有方，待人如宾，不论蒙汉都视为一家，人们称赞他为喇嘛庙的“好管家”。他具有爱国心，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八路军英勇抗战无限钦佩，热诚支援八路军和游击队。

一九三八年，日寇来到大青山一带，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伪

军、土匪也四出抢劫，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那时喇嘛庙周围百里内的群众有来向二喇嘛求援的，他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记得我在十一岁时，我们哈力盖图就有不少人去找二喇嘛，当时母亲也领着我去找他，他见我们母子面容憔悴，衣衫褴褛，非常同情，让我们住在大柜（该庙分为三个柜：大柜住人；二柜念经；三柜存放物资和粮食），我村有不少人住在这里，直到村里情况好转才回去。二喇嘛为了抵御土匪，养了二十多个家兵，买了二十多支枪，除了护庙，还保护群众。

日寇来利诱他，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应和皇军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向他进行反共宣传。但二喇嘛只是表面应付，实地却在做着抗日的工作。

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国民党自卫团十二团来了，他们威逼群众，要粮要款，临走时缴了二喇嘛家兵的枪，这使全庙喇嘛和附近群众愤慨万分。正在无奈之际，姚喆同志派人给他送来十几枝大枪和一些子弹，表达了共产党、八路军对人民的关怀，使他们深受感动，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更加拥护党和八路军。以后不久，又有杨占海为首的匪伙三十余人，来这里抢劫时把姚司令员给二喇嘛的枪全部夺走。事后又由黄厚团长给他们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这才使二喇嘛得以保存一支小小的自卫队。嗣后，一九四二年，日伪军侯庆的蒙古骑兵来到了红召，该部鲍团副驻在庙内，官兵横行霸道，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把喇嘛庙遭踏得不象样子。活生生的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僧俗群众，只有坚决地跟着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日，才有光明出路。

一九四二年秋，日寇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我们的大部队调到后方进行整训学习去了，仅留下游击支队

的两个排，由黄厚同志带领，在红召一带坚持活动。这时人心惶惶，共产党、八路军还能不能回来？抗战能不能胜利？许多人心目中产生了疑惑。而二喇嘛却具有独到的见解，他向群众说，共产党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他坚信共产党八路军是会回来的，抗日是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有一次，我地方武装工作队员毛守义，在二喇嘛家被鲍团副看见了，鲍追问二喇嘛：“他是什么人？”二喇嘛回答说：“是我们庙上割草的。”解除了鲍的怀疑，掩护了我们的同志。一九四二年秋，我党干部任建斌同志身染重病，必须留在地方上养病，二喇嘛便把任接到他的住处，派专人（叫大巴图）照料饮食、医药。因怕敌特发现，后来将任建斌同志转移到大巴图家以及丁记沟、干沟子等处，在二喇嘛的关心下，经大巴图和其他群众的精心照料，任建斌同志逐渐恢复了健康，重返战斗岗位。

有一次，我和张世昌等一行四人，从红召出发到东河子执行任务，伪军靖安警备队迎路而来，在危急情况下，我们迅速躲进喇嘛庙，在二喇嘛掩护下，住了七天，待敌人撤走，我们继续前进，完成了任务。

还有一次，游击队长张世昌派我去东河子送一封信，途经红召西湾子，又遇上了厂汉脑包的伪军（靖安警备队），我急中生智，很快又躲进了喇嘛庙，二喇嘛让我穿上喇嘛服装，瞒过了敌人，次日把信送到了。

在战争的烽火年代，骑兵离不开战马，我们的骑兵部队有些战马生病或受伤，需要休养或医治时，便去找二喇嘛，把马子放进他的马群里，二喇嘛非常热心地帮助我们，派专人把这些马饲养起来，医治创伤，待这些羸弱的马，饲养肥壮后，送回部队，重负鞍辔，驰骋疆场。姚司令员和黄厚团长每当谈及此事，总是

对二喇嘛赞不绝口。

时光流逝，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春季，康健民旅长和张达志政委率领的骑兵旅，重返红召村。人们看到自己的队伍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二喇嘛和蒙汉群众一起，用香甜的奶茶、面食热烈欢迎八路军归来，大家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来临。

四十年过去了，二喇嘛团结蒙汉人民，积极支援八路军抗战的英雄事迹，在红召一带传为佳话，成为教育青年后代的生动教材。

（吕经耀整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斗争史略

袁德录

一、向大青山区挺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芦沟桥事变。日寇在占领我国华北五省的重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之后，一九三八年春，把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中原，企图夺取徐州、武汉，迫使国民党投降，以达到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五月十九日，日军占领徐州，打通了津浦线，随即调集主要兵力沿陇海路西进。

日寇由于侵华战线的延长，兵力不足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在广大的敌占区内，日军守备兵力薄弱，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同志五月二十六日和六月十五日先后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无力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动游击战争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占区，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五月间，毛泽东同志还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杰出的军事著作，明确指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和我军作战指导原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大规模地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当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和晋西北的地方武装，在贺龙师长和

关向应政委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八年春季粉碎了日寇向晋西北的进攻，收复了被敌人一度占领的岢岚、五寨、神池、宁武、保德、河曲、偏关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党中央、毛主席在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电报中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关、贺首长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以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师部骑兵营一个连及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领导的独立第四支队，组成大青山支队（又称李支队），由李井泉、姚喆二同志率领，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六月，大青山支队从五寨地区出发进到雁北之平鲁、左云、右玉、怀仁、大同及长城内外活动，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准备挺进大青山地区。

原绥远省位于华北的西北部，东与原察哈尔省相接，南与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相连，西与宁夏接壤，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全境处于内蒙古高原，大青山脉横亘其间，与平绥路南的蛮汉山相对。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对牵制日寇向大西北的进攻，取得与苏、蒙两国的国际联系，以及将来实行对日反攻，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时，日寇在绥远的一个旅团（蔡田旅团）和九个师的伪军（伪蒙军四、五、六、七、八师和绥西联军），分别扼守于丰镇至包头的平绥路沿线及北至百灵庙、乌兰花，南至黄河之各要点，而我们在敌占区，则只有少数党员分散活动，在归绥附近有杨植霖、高风英同志所领导的数十人的游击队活动。

七月，中央军委指示大青山支队：“八月挺进大青山，进入大青山后，应先以主力进攻归绥、武川、陶林、集宁之间地区，另以一个营活动于平绥路南，以保证大青山与雁北的联络。”

大青山支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八月初进到凉城的厂汉营地区，准备通过平绥铁路，因被敌发觉，遂转回平鲁以南地区待机。八月下旬，再次北进，于九月一日夜由旗下营、三道营（均在今卓资县境内）之间越过平绥路，胜利到达旗下营以北的阳坡子、东河子（均在卓资县境内）等地区，并与杨植霖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在面铺窑子会合。九月三日，我军袭击陶林城，歼敌一部。十日夜，攻克乌兰花（今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全歼守敌。两次战斗的胜利，为开展群众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十日，大青山支队除留一部在绥中地区继续活动外，主力越过归绥、武川公路，进到武川西南地区的后脑包，打退了阻击我军之敌。然后西进袭击了石拐子（今包头市郊区），威胁包头，并袭击平绥路的陶思浩（在今土右旗境内）等车站，打开了绥西地区的局面。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动委会初步开展了地方工作，各地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

十一月上旬，日寇二千余人，“围攻”绥中区，被我击退。十二月中旬，日寇二千余人分四路向绥西萨拉齐以北我军主力进行连续一周的“围攻”。我军在马场梁、大沟（在今土左旗境内），德胜沟（在武川县境内）等地区不断给敌以打击。同时，当地游击队也不断袭击武川、萨拉齐和百灵庙等据点，“围攻”之敌被迫撤退。

从九月上旬至十二月底，我军在大青山和蛮汉山地区开辟了三块游击根据地。在平绥路以北，包头、固阳、百灵庙以东到归绥、武川、乌兰花以西地区为绥西区；归绥、武川、乌兰花以东至陶林以西地区为绥中区；在平绥路以南，托克托、归绥以东至丰镇、集宁以西，南与晋西北之雁北地区衔接的地区为绥南区。在上述地区内，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建立了代行政权职能的各

级动委会，镇压了汉奸，消灭了一些土匪，安定了社会秩序，初步开展了群众工作和蒙民工作，建立了农民救国会，成立了自卫队，组织了三百多人的地方武装，吸收了一批青年参加抗日工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一五团主力东调冀中，仅留下四个连和三营营部以及独立第四支队，共五百余人继续坚持大青山区的对敌斗争。贺师长、关政委指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基本任务，是争取一切阶级、阶层参加抗日，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与巩固这一极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根据地。大青山支队根据这一指示，将七一五团一个连置于绥南，一个连和四支队置于绥中，两个连置于绥西，除随时准备打击日伪军的出扰和“扫荡”并协助动委会深入发动群众外，还执行组织地方游击队，扩大主力部队，肃清土匪等任务。

大青山地区，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地带，村落稀少，幅原辽阔，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寇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极为迅速。为了适应这一地区斗争的需要，我大青山支队遵照中央指示，于一九三八年冬，着手建设骑兵的工作。除了从日伪和顽匪手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外，还向开明士绅和大地主募捐一部分，有些蒙汉群众也积极献马、献鞍具，从而很快解决了组建骑兵所需的马匹问题。其后，又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使战士们初步学会了对马匹的管理、骑乘以及简单的骑马作战技术。这样，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四个主力连就都变为骑兵部队。

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刚刚组建成的大青山骑兵部队即集中了绥中、绥西的兵力，向住在武川县西南上城子的土匪康德胜部，发起远距离的奔袭。在战斗中俘获土匪数十人，马百余匹，解救了被劫掠的农家妇女百余人。二十八日晚，又集中优势兵力袭击了住在陶林以南米粮局的肖顺义、夏军川匪部，俘匪近百人，缴马一百多匹，解救了二百多名被劫掠的妇女。接着，我军又在归绥和武川地区消灭了伪军苏玉龙部和地主武装郭田基部，俘获人枪各百余。

几次战斗的胜利，进一步改善了骑兵马匹的质量，提高了指战员建设骑兵的积极性，获得了骑兵作战的初步经验。

三月，我骑兵部队由原来的四个连扩编为三个营：在绥南的一个连扩编为骑兵第一营，在绥中的一个连扩编为第二营，在绥西的两个连扩编为第三营。独立第四支队也得到了补充。此外，还建立了十个地方游击队。我在大青山地区的总兵力已由五百余人发展到了一千七百余。大青山支队改名为大青山骑兵支队。

为了加强党对绥远地区工作的统一领导，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原绥蒙工委和大青山工委合并，组成了绥远省委，并建立了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委。

我军于四月中旬向归绥至包头间和归绥至集宁间的平绥铁路展开了破袭战，破坏铁路十余里，拆毁电线数十里，炸毁桥梁十余座，使平绥路西段十余天不能通车。我在平绥路上的大举破袭，引起了日寇对我军的警觉。

五月中旬到下旬，日寇由归绥、大同等地调集了一个旅团的兵力，采用设置据点、分区“搜剿”的战术，分别向我绥中、绥南和绥西地区进行了“围攻”。绥南我军适时地离开蛮汉山地区，敌未寻到我军主力；绥中我军转至外线，袭击了丰镇、集宁、红

格尔图（在今察右后旗境内）等敌占重要据点；绥西我军则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势与敌进行周旋，并在归绥以西的帐房塔村、一前响村（均在今土左旗北部山区）获得了两次伏击战的胜利。围攻之敌找不到我军主力，且不断受到我军打击和地方游击队的袭扰，乃分别撤回原据点。此后，在六、七、八三个月中，日寇又不断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扫荡”，都被大青山军民击退。

九月，正当我军进行休整和补充部队之际，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又开始向我进行疯狂的挑衅活动。“自卫军”是国民党利用当地封建势力建立起来的地主武装，共有六千余人。其成份多系地痞、流氓和土匪，纪律甚坏，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们是“降日灭蒙亡国军”。其第四路的樊团、第六路的王团、第八路的杨团早在夏季反“围攻”中就公开投降了敌人，而其第三路总指挥王有功也公开派人到归绥与日寇进行投降谈判。当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自卫军”更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蛮汉山的“自卫军”强行吞并我地方游击队；乌兰花地区的“自卫军”配合日寇袭击我军；屠杀我工作人员和侦察人员的事件，更是连续发生。在我向他们发出的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大青山骑兵支队即遵照上级指示，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在绥西、绥中和绥南向“自卫军”进行了全面反击，仅一昼夜的战斗，即在绥西歼灭了“自卫军”总部的大部；在绥中歼灭了“自卫军”主力第十二团；绥南的“自卫军”则闻讯西窜。是役共毙俘“自卫军”二千余人，缴电台九部，乘马数百匹。残余的“自卫军”，逃往后套去了。我反击“自卫军”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为我在大青山建设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创造了有利条

件。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日益发展，使日寇极为不安，他们为了消灭这块游击根据地，从一九四〇年三月起，又对我展开了“军事清剿”与“经济封锁”。在我游击根据地区内广设据点，在铁路沿线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实行所谓“囚笼政策”。并在绥中银官山（在今察右中旗西北部与四子王旗交界处）那儿梁（在今武川县境内）一带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政策，把五百平方公里地区的村庄，全部烧毁，牛羊牲畜几乎全被赶走或杀死。但由于我军与群众一起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破坏铁路，炸毁桥梁，切断电线，我骑兵部队更是神出鬼没，行动不定，把“清剿”的敌人弄得疲惫不堪。五月，日寇又调集日伪军数千人，分五路向银官山、五塔布、乌尔吐沟（在今察右中旗境内）地区“扫荡”，企图将绥中我军一举扑灭。但是，当敌人开始合围时，我军已转移到敌人翼侧五十公里以外的大脑包（在今察右中旗东北部）地区，并派小部队插入到集宁附近，袭击了离城一公里的霸王河据点，给了敌人以很大威胁。同时，我绥南骑兵一部，对铁路沿线敌军进行了袭击，并炸毁了火车一节。“扫荡”之敌增加了后顾之忧，终于被迫停止了对绥中的“扫荡”。

反“扫荡”胜利后，我军即开始了整训部队和配合党政机关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早在四月间，党中央就根据绥远工作发展情况，下达了“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蒙民工作，开展敌占区工作和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决定中着重指出：“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性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蓄力量，准备应付将来的局面，是绥远敌占区党的总任务。”不久以后，为了加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工

作，党中央决定将雁北划归大青山领导，原绥远省委改为绥远区党委。七月，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贺龙、关向应同志又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详尽的指示，指出了在大青山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巩固现有的游击根据地，建立绥察行署，以统一全区政权的领导，部队与地方合力进行党的建设工作。大青山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及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历次指示，在大青山区积极进行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进一步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农教会、妇救会、抗日武装自卫队等群众团体和群众武装组织。至七月下旬，全区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五百余人，农会会员发展到四千余人，乡村政权也开始建立，群众工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八月，为了统一大青山各族各界各党派团结抗日的步调，统一全区政权的领导，在武川县西梁村召开了绥察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国民党抗日民主人士、工人、农民、抗日军队、知识分子和蒙汉回各族代表共六百余人。通过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并推选姚喆、杨植霖同志为正副主任，制订了适合广大群众要求的“绥察施政纲领”。代表会议决定，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署由绥察行政办事处直接领导，并批准萨拉齐、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集、丰凉等九个县成立县抗日政府。

一九四〇年冬季，因大雪封山，敌人的汽车和骑兵都不便活动，没有向我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整顿和补充。

两年多来，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按党中央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积极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我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尊重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收缴喇嘛的武

器，不实行减租减息，允许蒙古族地主仍照原地租收租；对同情抗日和有中立倾向的蒙族武装采取了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从而使我军在大青山地区取得了蒙古族人民的同情与帮助。此外，还进行了吸收与培养蒙古族青年参加抗日的工作，在土默特旗先后选拔了二百余名各族青年送到延安学习。这些工作加强了我党同蒙古族人民的广泛联系，对坚持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绥远地区的伪军数量很大，伪蒙军李守信部有五个师，另外还有“绥西联军”、“东亚同盟军”、“防共自卫团”，以及各县伪保安队、警察、民团等，总人数在两万以上。在这些伪军中有不满日寇监视和压迫的情绪，而伪军之间也互有矛盾，我们就利用矛盾进行争取和分化的工作。一九三八年我军打乌兰花时，在策略上着重歼灭极其反动的德王的部队，有意给中立倾向的四子王旗的伪军留下去路。战斗结束后，将俘获四子王旗的人枪予以退还，并撤出乌兰花，从而与四子王旗伪政府建立了关系。此后，在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下，伪蒙军一、三、六、七师等部的一些单位相继与我们建立了关系。有些伪军在我争取下，给我们送情报，帮助我们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我们的伤病员有时也送到伪军据点内去治疗。在这一时期中，我军在争取和瓦解伪军工作上做出了很多成绩。但由于我们在伪军工作中没有认真贯彻长期隐蔽的原则，曾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暴露了伪军中的某些关系，遭受到敌人的破坏，给以后的伪军工作造成了不少的困难。

三、渡过艰苦困难时期

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逐步巩固与发展，我军在大青山、蛮汉

山地区的活动不断加强，不仅使日寇统治整个绥远的企图无法实现，而且连它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也经常遭受着严重的威胁。因此，于一九四一年春，日寇在我其他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的同时，以其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开始对我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并在我根据地内增设据点，扩大它的占领区，企图将我赶出大青山，摧毁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一月至四月，日寇对我武川以西地区，以五百余人至三千余人的兵力，接连进行了数次“扫荡”。五月以后，敌人的袭击和“扫荡”更加频繁起来，并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从五月至十一月，仅对我绥中地区就反复进行了五次“扫荡”，其中较大的二次是：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敌一千五百余人，对武川东北（今察右中旗西北）的五塔布、银官山地区进行了反复“扫荡”，烧毁了银官山周围的三十余个村庄；九月一日至十日，敌一千五百余，对陶林西南灰腾梁地区进行“扫荡”；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五日，敌三千余人，对我武川以东，陶林以西及银官山地区进行了“扫荡”，烧毁村庄一百余个。在五月至十月的五个月中日寇在绥西对我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了六次袭击。

我对敌人的反复“扫荡”，采取了灵活的战术与之周旋。敌人到我根据地“扫荡”，我就转移到敌占区活动；敌人在这一地区“扫荡”，我军就转移到另一地区活动，并抓住有利时机，以伏击、袭击战术打击敌人。五月十五日，我军在陶林附近消灭伪东亚同盟军一部，俘获人马各四十余，缴枪五十余枝；七月一日，我军又在陶林以南的金盆，歼敌百余，夺回敌人抢劫群众的牲口七十余头，并当即交还群众；九月上旬，我军又在陶林以南的青龙坝和恩格来，两次袭击“扫荡”之敌。敌人在“扫荡”

中，在我绥西的巴总窑子、小井，绥中的厂汉脑包和绥南的凉城（田家镇）等地增设了据点，更增加了我军活动的困难。我军在连续的反“扫荡”斗争中，生活异常艰苦，经常人不离枪，马不卸鞍，烧土豆充饥，化雪水止渴，全体指战员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经受着严格的考验，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不屈不挠的坚持着大青山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终于打破了日寇把我军赶出大青山的企图。

一年来，我军在战斗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战斗力提高了。骑兵支队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即将活动在绥南的第一营扩编为骑兵第一团，将活动在绥中的第二营扩编为骑兵第二团，将活动在绥西的第三营扩编为骑兵第三团。四支队先是扩编为骑兵独立营，后又分别编入骑兵支队部和骑兵第三团，四支队的一部分干部则调到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把绥远区党委所辖游击第二支队的番号取消，各县游击队改为县长、县委书记直接领导与指挥，军事建设上则受骑兵支队的指导。为了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自卫能力，一九四一年九月，绥察行政公署规定：各专区的游击队均扩大为三十人，各县的游击队均扩大为二十人，各区的游击队均扩大为十五人，以此作为补充主力军的基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退居河套五原、临河地区的国民党傅作义部，派其“自卫军”荀子臣部侵入我绥中地区，大肆屠杀群众，捕捉我工作人员，配合日伪军袭击我军。我军被迫自卫，予以反击。先后在武川以东的大小石槽、吉盛魁、天元号、巴尔哈达及武川以西的聚宝庄、三道边等地与顽军作战七次，击退了顽军的进攻。除歼灭其一部外，荀子臣部全部被我赶出大青山根据地。

敌人对我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开始，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积极推行“施政跃

进”运动，企图以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彻底摧毁我根据地，以达到其所谓“确保蒙疆地区”的目的。对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广泛地向人民宣传党的政策，用敌人的罪恶事实，彻底揭露敌人的欺骗阴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粉碎敌人的“施政跃进”运动。

日寇在“施政跃进”运动中，把反动的地主士绅，收罗到基层伪政权中，以加强其对伪乡公所、村公所、保甲等基层伪政权的控制；在居民中实行连坐法，一家或一村帮助了抗日军队，连坐的数家或数村即受重罚；强令各乡、村设立情报员，每日向敌据点内送情报；强迫群众组织伪自卫团，站岗放哨，实行“自卫”。日寇为了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一面派遣日本特务到伪军中担任指导官等职务，一面实行镇压政策，凡伪军人员同我抗日政府和军队有联系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日寇加强对伪军和伪基层政权的控制，进一步加深了日伪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利用这一矛盾同敌人斗争，通过宣传党的政策和耐心教育，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伪军政人员，使其暗中帮助我或保持中立。凡我军能控制的伪乡、村政权人员，则帮助他们设法拖欠敌人所要的粮款，尽量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掠夺；在某些条件较好的游击区或敌占区，则争取使那里的群众负担一定的抗日公粮和捐款；对敌人统治较弱的伪基层政权，则争取由两面应付变为革命的两面政权。对于那些忠心事敌的伪乡、村政权人员，则采取镇压政策，有时根据抗日政府的惩治汉奸法令逮捕法办，有的则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发动群众向敌人告发他们的贪污罪行，迫使敌人不得不把他们杀掉或撤换。对于伪情报员，则通过个别联系，进行教育，启发觉悟，使其想尽一切办法给敌人送假情报。有的在表面上虽然还是敌人的情报员，实际上成了我军的

情报员，帮助我军侦察敌情。敌人强迫伪自卫团站岗放哨，我们就利用他们为我们站岗放哨，掩护我们进行抗日工作。对于伪军人员，则利用家属、亲友、同学等各种社会关系以送信、带话和个别接头的方式，建立联系。经过一段争取教育之后，有的给我军偷送情报；有的在外出袭击我时，有意过早鸣枪，给我军报讯；有的在配合日军作战时，有意留出空隙使我军转移。由于我党我军积极执行了上级的指示，采取各种斗争方式对伪军政人员进行了争取工作，使日寇加强对伪基层政权、伪军进行控制的企图未能完全实现。

日寇企图用经济封锁政策破坏我根据地的经济生活。其主要办法是严格控制生活物资，一切物资都不准运出敌占区。为此，敌人规定，凭户册和凭“合作社”购买证才能买东西，并限制了数量。如火柴每户每月不得超过一包，布匹每户每年不得超过三丈。取消零星市场，把小商贩都控制起来，并给他们规定了活动范围，各商店的货物都进行登记，一切货物的出售都要经过敌人的许可。而我们则用各种办法与敌人的经济封锁进行斗争。首先对乡、村中的小商贩进行了广泛的工作，通过他们用零星购买的方式，从敌占城镇运出了必要的物资。另外，也采用给伪军政官员和管理市场的人员赠送礼品，疏通关系，运出一部分物资。由于我们用各种办法，冲毁了敌人的封锁，运回了各种生活物资，从而使根据地军民的经济困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日寇为了隔绝游击区人民群众与我军的联系，在游击区实行并村政策，强迫游击区人民拆毁房屋，搬到敌占区的村镇居住。这就直接危害到游击区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因而更增加了群众对日寇的仇恨。我们就组织群众与敌人的并村政策作斗争，拖延并村时间，破坏敌人的并村计划。敌人出来烧房子，强迫群众

迁移，我军就寻机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并动员了一部分群众搬到根据地来。经过反并村斗争，虽然有少数群众被迫搬到了敌占区，但敌人以并村政策来隔断我军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企图终归破产。敌人为限制我军的活动，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大青山的十八道沟口挖沟筑墙，封锁山地和平川之间的道路。对此，我军就和群众一起拆墙平沟。敌人的阴谋又遭失败。

敌人的残暴统治愈演愈烈，更加激起了游击区和敌占区人民群众对日寇的痛恨。我党我军所进行的反对“施政跃进”运动的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而敌人以“施政跃进”运动窒息我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狂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从一九四二年初开始，敌人对我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进行了比一九四一年更加频繁的“扫荡”。一月上旬至中旬，敌七百余人“扫荡”我绥西地区。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及三月中旬敌千余人两次“扫荡”我绥南蛮汉山地区。七月以后，日寇在德、日法西斯共同战略计划下，积极准备北进，配合德国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因而对我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更加残酷的“扫荡”。七月二十五日，首先日、伪军以步骑兵数千人，分五路合击我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骑兵第二团活动的绥中区。一千余人，由归绥穿越大青山进至大青山北麓的后厂汉脑包、红召、苏计坝地区；一路九百余人，配属汽车多辆，由武川进至蒙古寺、五塔布、石槽子地区；一路百余人，由陶林进至黑山子、土城子地区；一路千余人，由卓资山进至白银厂汉、金盘、厂汉哈达地区；一路千余人，由旗下营进至一间房、大同营子、隆盛德、阳坡子地区。尔后于七月三十日，自集宁以汽车六十辆，输送日军主力至陶林以西的大滩。敌军首先集中兵力于南线和西线，企图以南、西两面压迫我军北上，并利用汽车

输送的快速条件，自大滩向我实行夹击，最后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绥中地区的部队围歼于五塔布、银宫山地区。在此严重形势下，骑兵支队根据晋西北军区指示，决定以骑兵第二团主力掩护绥远区党委、绥察行政公署、大青山骑兵支队指挥机关和绥中专署，分头向绥南转移，留各县、区游击队，县、区政府工作人员和骑兵第二团第三连于绥中地区，在绥中地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绥中区的对敌斗争。七月二十八日，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骑兵第二团主力，分别由武川、陶林地区出发，通过平绥铁路，转移到绥南蛮汉山、财神梁地区，同活动在绥南地区的骑兵第一团会合。在转移途中，我军曾在武川以东的大石槽、油坊营子、罗家营及陶林至三道沟之间以及陶林以东的兵兔，同敌人进行了五次遭遇战斗，掩护了机关部队的安全转移。八月初，绥中地委、县、区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骑兵第二团第三连也先后撤至绥南与主力会合。敌人对绥中地区的“扫荡”，虽然持续至九月上旬才结束，但是敌企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绥中我军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敌人发现我大青山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绥中地区的部队已转移至绥南地区，乃于八月九日由旗下营至丰镇沿线各据点抽调步骑兵三千余人，配合原住在绥南及雁北地区之敌千余，分七路向我绥南地区“扫荡”，企图在杀虎口（山西右玉县境内）地区和右玉西山围歼我党政领导机关及一、二团主力。一路六百余人，由旗下营南下，经孔都林向杀虎口西南地区进击；一路千余人，由卓资山南下，经凉城以东，向杀虎口以北地区进击；一路千余人，由集宁南下，沿岱海滩（凉城县境内）东侧，向杀虎口以东的刘家窑地区进击；一路日军六百余人，乘汽车二十九辆，由丰镇西进，经东厂汉营向刘家窑以南地区进攻；一路敌百

余人，由平鲁北上，向右玉西南的黑家湾地区进攻；一路敌三百余人，由清水河、韭菜庄北上，向右玉西山的狼窝沟、瑞家窑子地区进攻；一路敌二百余人，乘汽车由和林格尔东进，向杀虎口以西的新店子地区进攻。各路敌军均于八月十一日到达预定地区。

我军经过连续的行军作战，已很疲劳，并且缺乏鞋子、马掌、弹药等物资补充，在敌我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摆脱被动，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乃于八月十五日决定以骑兵二团四、五两连，掩护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暂时转移至晋西北之偏关，待机返回绥中。骑兵第一团北上蛮汉山坚持绥南地区的斗争，骑兵第二团一、三两连，北上至财神梁地区活动，并寻机返回绥中地区。敌人这次在绥南的“扫荡”虽一直继续到九月中旬，但一无所得；其在绥南、雁北地区消灭我大青山领导机关和骑兵支队主力的计划又遭失败。

敌人“扫荡”我绥中、绥南两次计划失败后，又于十月十五日集中了日伪军六千余人“扫荡”我绥西地区。这次“扫荡”，敌人在水平川、大庙酒馆（在武川县）、北灵胡同一带采取了“梳篦”战术，各路兵力，齐头并进，今天从南到北，明天又从北到南，反复“扫荡”，企图消灭我绥西地委、专署和骑兵第三团。我骑兵第三团的步兵部队和各领导机关遂转移到萨拉齐山区，骑兵部队则转移至绥中归武地区的小井沟一带活动。此次“扫荡”到十一月十四日结束。我军又返回原地区。

敌人在“扫荡”我绥西地区的同时，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八日，以一千五百余人，再次“扫荡”我绥南的蛮汉山区和雁北的右玉地区。此后，敌又于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五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底，先后以两千至三千余人的兵力对我绥

中、绥南进行了“扫荡”。

在一年的反复“扫荡”中，敌人又在我根据地内增设了二十四个据点，即绥西萨拉齐山区和归武山区的瓦胡同、土城子、榆树店、前石花、哈拉哈少、大庙酒馆，绥中武川以东的哈乐、黄花窝铺，武川以北的毛都亥，陶林以西的阳弯子，集宁以东的公沟；萨拉齐东南的毛岱镇、双龙镇，察素齐以南的铁帽（今土默特左旗境内），和林格尔的甲赖镇、大红城，蛮汉山地区的莎尔沁、朱亥、西沟门、菜园子、得胜窑子、十八台和财神梁地区的麦胡图、麻迷图。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更加缩小了。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我军在敌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与大青山根据地人民在一起，进行艰苦的斗争，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打破了敌人的“施政跃进”计划，粉碎了日寇多次企图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扫荡”，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坚持了绥西、绥南两块游击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在大青山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致我军被迫由绥中地区撤出后，无法继续坚持斗争，绥西游击根据地也随之处于孤立的形势。这主要是没有很好的执行党中央一九四〇年四月“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中所指出的方针和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北军区多次指示中所强调的隐蔽政策。中央决定中指出：“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性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准备将来的局面，是绥远敌占区党委的总任务。”晋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提出：在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要把大青山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的工作，不能够大张旗鼓的进行，而要以合法存在为原则，发动与组织群众，与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在群

众中真正扎下血肉相连的根基，以便长期坚持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因为对这些指示的精神领会不深，虽然在敌斗争中也发动了群众，群众也给了我军以大力支援，但在许多地方并没有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在政权建设上，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切实地对乡村的基层政权进行改造，以致基层政权仍然操纵在地主、富农手中。例如绥中武川三区，在十四个乡长、副乡长中，就有地主三人，富农八人，流氓一人，另有中农二人。其中十个人在国民党旧政权时担任过乡长、区警等职务。他们仍然为非作歹，欺压群众。这样的基层政权，当然无法贯彻党的政策。如党的合理负担政策，虽然在我区以上党政工作人员和我军地方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地主、富农都拿出了一些钱、粮和其它物资支援战争，但当离开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监督时，他们就加重基本群众的负担，并乘机贪污、勒索。这样的基层政权，当环境恶化时，很多变成了敌人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他们带领敌人捕捉我工作人员，挖走我政府和军队秘密存放的粮食和其它物资，给我坚持游击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组织群众，把群众武装起来进行合法斗争，既是积蓄力量，又有利于当时斗争。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充分注意。武川县的四个区里都有过群众自发组织的秘密游击小组，但由于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没有去加强领导，就使群众的这一重要创造自生自灭了。总之，由于没有认真执行隐蔽政策，没有进行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未能在群众中打下扎实的根基，这就使我们从绥中撤出后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陷入极端困难情况的主观原因。

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由绥中退至晋西北偏关后，中共晋绥分局根据党中央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于十月二十四日决定将

绥远（大青山区）和雁北（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以姚喆同志为司令员，高克林同志为政治委员，张达志同志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塞北区的军事行动。中共绥远区党委改为塞北工作委员会，以高克林同志为书记，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的对敌斗争。

四、游击根据地的恢复

正当晋西北根据地贯彻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仍然处在极端困难的阶段。

塞北分区第三团，自一九四二年十月中旬，摆脱了敌人的“扫荡”转移到萨拉齐山区后，绥西其它地区，都变成了敌人的占领区。山区周围敌人的据点林立，严密封锁着萨拉齐山区。第三团登上了大青山的最高峰石虎子山，山高路险，荒无人烟，时值严冬，冰雪封山，只得露营山间。战士们挖土窑避风，烧篝火取暖，粮草弹药，极端缺乏。再加上与军区断绝了联系，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和物资供应，部队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

塞北分区第一团，从绥南的蛮汉山地区向右玉西山转移后，留下的游击队，仍坚持该地区的游击战争。敌人经常出来“扫荡”，并在蛮汉山北麓，西起西沟门，东至牛家川八十公里之间，凡能通行的各沟口，都筑起五尺高，三尺厚的封锁墙，在平绥铁路两旁，挖了封锁沟，使我游击队的活动极端困难。

在绥中，我军撤出后，虽然仍有留在归武地区的一个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和少数政权干部活动，但由于敌人的统治比以前更加严密，我们的力量又小，一时难以开展工作。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晋绥分局对塞北工委发出了指示

信，指出党在绥远的基本任务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对绥远的社会环境，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充分利用绥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着重指出能否把群众真正团结到我们周围，是今后生死存亡的问题，绝不能等闲视之。

塞北工委根据分局的指示，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面派骑兵第三团一个连和两个工作组，首先进入绥中地区活动，开展工作；一面采取轮训干部的方式，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干部的思想，为恢复大青山的工作做准备。

第三团骑兵连奉命到达绥中后，就配合原来在归武地区的游击队和工作组进行活动。他们经常是夜晚行军，翻山越岭，到宿营地前，先派人进行侦察，部队然后进村，隐蔽宿营，派出化装哨兵，封锁消息，并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我军在行动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群众看到我军的活动，觉得自己又有了希望，虽然生活极端艰苦，但仍积极设法供应我军粮草，有的甚至把种籽粮拿出来给部队吃。特别是当我军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之后，群众情绪更加振奋。五月二十九日，第三团之骑兵连，在归绥东北二十多公里的杨圪齐附近，伏击由白塔、榆林子、麻地板等据点出扰的伪军三十余人，战斗一小时，将敌击溃，俘敌十二名，毙伤各一，缴战马二十四，步枪十三支，其它军用品一部。

四月，塞北工委开始整风学习。在整风学习中，对过去的各项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对中央一九四〇年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中提出的隐蔽政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体会到军事斗争，贯彻隐蔽政策，必须坚持广泛

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纯洁内部，巩固部队的工作。在整风的基础上，贯彻了精兵简政，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各地委、专署与各团领导机关合并，骑兵支队第三团，改组为步兵团，留一个骑兵连。为适应根据地被分割的情况，在武川以西，与固阳交界地区，成立了武固县，县政府随第三团第二连活动。经过精兵简政以后，各级组织机构更加精干，主力军更加地方化、群众化，为深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自地委以下建立了秘密党委，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以便保证秘密工作不因受公开工作的影响而遭受破坏。

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充分准备后，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一团向和林、归绥、凉城三县交界地区，派出和林武工队；第二团向归绥平川派出武工队。原来在陶卜齐（呼市东郊）以北地区坚持斗争的第三团派出的工作组，与活动于旗下营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归武武工队。当时各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恢复抗日游击根据地。

此时，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德寇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使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北进的时机；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寇正在美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在整个敌后战场上，日本侵略军不断遭受我军的打击，其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日寇被迫收缩兵力，减少据点，大青山地区的敌人也撤出了一些据点。我各武工队，趁此有利形势，运用了晋西北对敌斗争的经验，积极展开活动。

我武工队与分散的小分队，每到一地，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政治情况，然后，主动与开明士绅建立联系，向他们宣传国

际形势，解释我党的抗日政策，要求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与我们共同抗日。由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日寇的烧杀淫掠，又侵犯了他们的基本利益，因此，除少数地主、富农中的当权派甘当汉奸外，许多中小地主与开明士绅，在我积极争取下，表示愿与我们合作。

基本群众虽然在内心里很拥护我们，但又怕我们站不住脚，因而不少群众在开始时，不敢接近我们，怕以后遭受报复。我武工队对他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且从减轻群众的负担入手，发动群众。如绥南地区，日伪顽匪敲榨勒索，苛捐杂税不下几十种，连敌伪人员办红白喜事，也要群众纳税。此外，三五成群的土匪，窜扰农村，抢劫群众财物。和林武工队在群众配合下，清剿土匪，把他们抢来的财物，全部归还失主。把群众所最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分子，当众镇压，为群众除害。对敌人的苛捐杂税，采用一切合法手段，展开群众性的拖欠斗争；发动群众打击那些甘心事敌、乘机敲榨的汉奸，如绥南黑老窑子的一个伪警尉，捕捉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扬言要消灭我武工队，对群众敲榨更凶，过中秋节就向群众要大母羊一百二十只，群众非常痛恨。我武工队乘机发动七个村子的群众，向日寇控告他一贯贪污的罪恶事实。结果，日寇把伪警尉撤了职。群众从斗争胜利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信心，更加靠拢我们。

为了在农村加强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党中央关于在大青山区不进行减租的指示精神，武工队在处理阶级矛盾的问题上，采取了调解的办法。既要发动群众，向地主进行斗争，又要在一定时机，劝告双方让步。这就保证了基本群众通过斗争得到利益，又适当地照顾了地主的人权、财权。

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我们从其中选择一批政治上纯洁的青壮年，对他们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启发他们参加对敌斗争的自觉性。在许多自然村里组成了秘密游击小组，这对武工队的活动帮助很大。

各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都进行了对伪军和伪组织人员的争取工作。主要是通过伪军的家属、亲友同伪军人员建立联系，采用传话和个别接触的方式，向他们进行宣传与争取工作。过中秋节，我们还按照风俗习惯，给伪军家属送礼，对生活困难的伪军家属，我们设法给予适当的帮助。这样就迅速的在伪军和伪组织人员中建立了不少关系。归武武工队调查了“靖乡青年队”的情况，并通过关系同他们建立了联系，用秘密接头的办法，对他们的中队长、小队长进行谈话教育。经过一段工作后，有些“靖乡青年队”实际上已为我们所控制，经常给我们送情报。对有些伪军警是先打击后争取。如绥南哈拉沁据点的伪警，经常出扰，并袭击和林武工队，武工队曾一再向他们提出警告，但他们仍执迷不悟，经我和林武工队打击后，他们就不敢再猖狂了。到一九四三年秋季，我武工队已经同不少的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了秘密关系。如伪保安二团四大队，旗下营的警卫队，白塔的特务队，榆林子警察队等，都能主动的给我们送情报和帮助我们购买军用物资。

一九四三年冬，塞北分区第二团又派了两个连，由团长黄厚同志率领，自偏关进至蛮汉山地区，依托绥南，经常到绥中活动；第一团也从右玉西山进至蛮汉山地区活动；第三团也自萨拉齐山区向北活动。到年底，绥中地区南至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今呼市北郊），东西五十余公里，南北四十余公里的地区内，我们都可以活动了。绥南的蛮汉山和绥西的井尔沟一带的工作，也开始恢复起来了。

日寇发现我武工队和部队的活动后，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归绥平原进行“清乡”运动。首先以伪军和武装特务，突然包围村庄，捕捉群众，追查我军人员。但被捕的群众，不向敌寇屈服，严守我军机密，掩护了我军工作人员。日寇的恐怖镇压手段失败后，进而采取政治欺骗手段，组织“宣传队”，在武装保护下，强迫群众开会，给群众治病，施行小恩小惠，拢络人心。我们针对敌人的诡计，积极开展反“清乡”的斗争，敌人白天在哪里开会，我们晚上也在哪里开会，及时揭露敌人的各种阴谋。最后，日寇无奈，又派便衣特务出来抓人。这时，敌人对汉奸都不信任了，完全使用日本特务，群众想出一切办法欺骗他们，使敌特两眼漆黑，毫无所得。日寇的“清乡”运动，终于彻底失败。

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开始，敌人对绥西、绥南地区又先后进行了多次袭击和搜山。四月三日，敌一百四十余人，经归绥西北的水磨沟、井尔沟进至乌兰不浪，四日继续北犯，九日经井尔沟退回毕克齐。七日，敌二百余人，经水磨沟进头道安、大塔，遭我军袭击后，当晚进至井尔沟、大南沟，八日经宽滩子退回归绥。五月一日，凉城伪警察大队袭击东梁村我游击队。六月上旬至七月初，该警察大队又配合驻卓资山地区伪军防共一师八百余人，在蛮汉山地区搜山一个月。在敌搜山时，我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同敌人周旋，坚持斗争。敌人搜山，我军就下平川活动；敌人退回平川，我军又上山。使日寇疲于奔命，一无所得。

大青山军民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艰苦奋斗，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又开始恢复。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有：绥西的东至井尔沟，西至榆林店，东西长四十余公里，南北宽十余公里的区域；绥中的南至卯得沁，北至韭菜沟，西至杨树窑子，东至厂汉脑包，南北长三十余公里，东西宽三十余公里

的区域，绥南的蛮汉山区，以及和林以北以老包山为中心，半径约十五公里的区域。在这些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有游击区，基本上恢复了一九四二年七月日寇大“扫荡”之前的局面。

五、进行对日反攻和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

抗日战争后期，全国解放区得到迅速扩大与发展。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党在敌后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人口达一亿以上，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万人左右，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达到了二百二十万人。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法西斯统治已相继垮台。苏联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对日宣战。迫使日本侵略者于八月十日发出了乞降的照会，八月十四日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毛主席于八月九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对日寇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配合苏联及其它同盟国作战。党中央于八月十一日发出了《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目前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朱总司令也于八月十日、十一日向全国各解放区武装部队连续发布了一至七号进军命令。命令所有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武装，分别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向敌人军队及指挥机关送出通牒，并接洽受降事宜，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应立即予以坚决消灭。

在大反攻前夕，我晋绥解放区的斗争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发

展。大青山地区我部队和地方武装从敌伪手中夺回了许多地盘，并赶走了侵入我解放区的国民党顽军，使绥西、绥中、绥南三块游击根据地完全恢复。

朱总司令的反攻命令发布之后，中央决定晋绥解放区的党政军民统由贺龙、李井泉二同志负责领导与指挥。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为了便于领导南北两线作战，成立了吕梁、雁门、绥蒙三个区党委和三个二级军区。雁门区党委及军区，以吕正操同志兼司令员，许光达同志为副司令员，高克林同志为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孙志远同志为副政治委员，辖二、五、六、十一各分区（五分区是与塞北分区合并前的五分区，十一分区是原绥南区）。绥蒙区党委及军区，以姚喆同志为司令员，张达志为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苏谦益同志为副书记，辖平绥铁路以北地区。南线由张宗逊、罗贵波、解学恭负责指挥三、四、七、八各军分区；北线由吕正操、高克林、许光达、孙志远负责指挥绥蒙军区及二、五、十一各军分区。晋绥军区于八月十一日，向敌人发出了最后通牒，促令区内各敌占城市及据点的日伪军立即停止战斗行动，限期投降，保证安全。如愈期不降，必遭全歼。

晋绥解放区反攻大军于八月十一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展开。绥蒙地区是北线，指挥部负责人是吕正操、高克林等同志。指挥部根据晋绥军区向平绥路进攻并迅速占领归绥的命令，立即命令姚喆同志率领骑兵旅、第九团、二十七团的二、三营，自铁路以北向归绥挺进；张达志同志率二十七团一营，骑兵一团第二连，骑兵大队，教导第三队等部，自偏关出发，挺进托克托、和林格尔，与路北主力相配合，对归绥实行包围；许光达同志率三十六团、三十二团，由二分区沿黄河北上，会攻归绥；绥中各游击部队积极出击，配合主力部队相机占领陶林、武川等城镇；十一分

区各游击部队进占归绥以东铁路沿线各点和铁路以南之各城镇，二、五分区游击部队和武工队分别向就近的敌占城镇进攻，并相机收复之。从此，北线以归绥为中心的反攻作战遂全面展开。骑兵二团于八月十二日、十五日先后收复平绥路以北之陶林、武川等城镇，九团、二十七团，于十五日分别攻占了归绥以西的重要车站察素齐、毕克齐和归绥外围据点兵州亥（土默特左旗境内）；绥中游击部队于十七日占领了归绥以东的旗下营、陶卜齐、白塔等车站。至此，归绥市东西两面的铁路均被切断而处于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十八日我军向归绥市发起攻击，九团、二十七团迅速攻入城内，将伪军千余人和日军三百余人，包围于旧城大十字街。正在伪蒙军被迫要求向我投降之际，国民党傅作义部的三十五军三十一师一部及挺进纵队等三千余人，会同自包头东退之日军配合城内的日伪军夹击我军。我因腹背受敌，且众寡悬殊，遂于当晚撤到归绥东北之哈拉沁地区，归绥当即落入傅军之手。

在我军进攻归绥的同时，独立第二旅三十六团，由许光达同志率领，于八月十三日自保德向北进发，经偏关直抵清水河。此时，由吕正操司令员率领的三十二团亦随即赶到。清水河城内伪军拒绝向我投降。我军于十八日发起猛攻，至十九日晨结束战斗。伪军千余人被我全部歼灭，生俘伪军三百余人，缴获战马四百五十余匹，清水河遂告光复。正当我军对敌人胜利反攻之际，蒋介石却妄图垄断受降权利。他给头等战犯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要冈村宁次向解放区“收复失地”，然后转交给蒋介石。这样，各地的日寇和伪军便以此为借口，拒绝向我投降，进行顽抗，并与蒋介石的军队相配合，继续窜扰解放区。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则乘机向解放区大举进犯。长期避居黄河后套及伊克昭盟地区的傅作义，亲率其第三十五军、暂三军、骑兵第四

师、炮兵团、保安队等六万余人，倾巢出动，于八月十一日侵占包头后，与敌伪配合，抢占了归绥，并继续沿平绥路向东进犯。

鉴于这种情况，我党中央在八月二十二日发出指示说，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阻延伪军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集中，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注意整训部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晋绥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北线部队除巩固陶林、武川、清水河外，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晋察冀部队夺取集宁、丰镇，阻止与打击傅作义、马占山部队东进。

独立第二旅及三十二团，攻占了清水河后，即分兵两路，三十二团自清水河东进，直取左云，于八月三十一日，仅以三个连的兵力，歼灭了守城伪军五百余人，解放了左云县城，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强攻战例。三十六团则自清水河继续挥戈北上，收复了和林格尔，然后矛头转东，在凉城以西之土沟、王贵窑子、一间房一带，将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第五师击溃，连克田家镇、新堂（均在凉城县境内）。此时，占我丰镇之傅作义部主力暂十七师第一团，步兵千余人，骑兵二百余人，向新堂反扑。我即一面待其深入，一面集中兵力，准备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当该军先头部队与我守城部队接触数小时后，全团进入我预定地区，我三十二团与二十七团也于此时分别自左云和平绥路上的三道营地区赶到，当即投入战斗，经一小时猛烈进攻，将该部全歼于新堂外围及其以东之岱海滩地区。缴获山炮四门，重机枪九挺，战马二百余匹。这是我军给沿平绥路东犯的傅作义军的首次打击。至此，北线之敌，伪、顽军已被我压缩于归绥、卓资山、集宁、丰镇、大同、怀仁、岱岳一线。

国民党反动派在卖国、内战、独裁的方针指导下，一面调遣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一面积极导演蒋日合作、蒋伪合流的丑剧。许多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官员。傅作义也与日寇和平共居，与伪军合流。伪蒙军王英、门树槐、宝贵廷、陈秉义等汉奸头子，都变成了傅作义的师长或其他高级军官。不久傅作义部又于九月上旬，先后抢占了武川、陶林、清水河、凉城等城镇，其先头部队沿平绥路越过大同，经阳高进到柴沟堡，企图继续向张家口进犯。

在此种形势下，我党中央又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即对南防御，向北发展，全部控制热察及争取东北优势。根据中央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和晋绥解放区的具体情况，晋绥分局和军区确定：为配合全国的战略方针，要控制雁北及绥远大部，使晋绥与热察打通，直接联系，以保障热察根据地的侧翼，巩固根据地，争取由北向南发展。为此，经中央军委同意，首先集中主要兵力于北面，打击傅作义、马占山东犯部队，对阎锡山则采取守势的方针。据此，除留少量部队配合太岳，晋察冀部队造成围攻太原的态势外，将所有主力组成野战兵团，包括三五八旅三个团（七一五、七一六、八团），独立第一旅的两个团（二团、七一四团），独立第二旅的两个团（三十六团、二十七团），并以三分区领导机关大部和特务团、十七团编为独立第三旅，以杨家瑞为旅长、金如柏为政委。其中除独立第二旅已在北线外，其余三个旅，由贺龙、李井泉等同志率领，先后于九月上、中旬自文水、离石、临县等地向北进发，中旬集结于左云一带，准备与晋察冀军区兄弟部队相配合，组织绥远战役，打击与消灭继续东犯的傅、马军。至此，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八〇年五月于东胜

与布利亚特旗匪军战斗

情况的回忆

郝秀山

我是一九四六年秋天从绥东集宁县撤出，而后奉命率领绥蒙大队由察北商都县进入草地，于十月份到达贝子庙（现锡林浩特）的。当时驻在贝子庙的机关，有从张家口撤去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一部分，还有实业公司、贸易公司、干部团、仓库、医院等部门。乌兰夫同志已到喇嘛库伦^①，贝子庙有中共锡察工作委员会，由奎璧、王铎同志负责。刘景平、寒峰等同志也在那里。当时贝子庙除干部团，没有什么部队。布利亚特匪徒十分猖狂，经常到贝子庙附近捣乱，内蒙十六师师部及一些机关的军马被抢走，这帮匪徒似乎想要把贝子庙我党后方机关一口吃掉。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到达后，中共锡察工委指示我们要固守贝子庙。

据介绍，布利亚特匪徒是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跑到外蒙古，外蒙古革命胜利后又跑到呼伦贝尔草原的。我军收复海拉尔地区后，他们又跑到锡林郭勒草原，强占了阿巴嘎旗猴头庙以南一带水草丰美的一块地方，建立布利亚特旗，并在猴头庙南十公里

^① 喇嘛库伦——今东乌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

的开阔地带建立了旗政府，以此为基地四处掠夺邻近牧民的牲畜、财产，抢劫商人，杀害群众，并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他们的头目叫仁钦，经常住在张家口，据有人说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这帮匪徒十分霸道，当时锡林郭勒草原的人民不敢惹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反动上层从苏联和蒙古革命胜利后就是抱着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跑到中国来的，是死心塌地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这个旗大约有一千人，大体上分为三部分人：一是反动的王公贵族、喇嘛，这是统治阶层；二是跟随他们的官员、家属、亲属；三是为他们服务的一般侍人、士兵、劳动牧民。

这帮人是从苏联赤塔跑过来的，他们带有蒙古包、折叠式的钢丝床、手摇缝纫机、奶食加工机，还设有卫生所等，设备较好。男人留着分头，女人还有的烫发，不少人镶有金牙。他们带有很多白洋、元宝、金条、首饰、绸缎等贵重物品。牲畜特别是马牛大部分是良种，羊的品种也很好。沿途到处抢夺牧民的牲畜、财物。因此，他们的生活十分富裕，过着奢侈豪华的上层贵族阶级的生活。

他们这个部族几乎是“全民皆兵”，差不多都有枪枝，还有大约三百多人的职业军队。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向他们派遣特务，并给他们运送武器弹药。所以这股匪军装备优良，有轻重机枪，小型钢炮。后来这帮匪徒发展到五百多人，他们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称王称霸，抢劫、屠杀，无恶不作。

一九四六年冬，我八路军骑兵旅在恩格寺格化斯太一带消灭了国民党一个正规营，缴获了几门钢炮和几挺重机枪。我军将这些笨重武器，暂时寄放到德王府^①一带的一座庙里，不久就被布利亚特匪徒全部抢走，并杀害了我八路军伤员数十人。

^① 德王府——即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家，在今西苏尼特旗温都尔。

这帮匪徒凭仗他们当时武器装备优良，背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后台，企图占领贝子庙，抢劫武器财物，消灭我后方机关人员。他们曾一度集结了二、三百人的匪军到贝子庙附近打枪扰乱，抢劫马群。活动最猖狂的是一九四六年的九、十月份。

为了消灭这帮匪徒，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份，中共锡察工委决定，令刘景平同志全面负责，负责人还有奇俊山等同志，我负责军事指挥。在贝子庙组织了两个骑兵连（我绥蒙大队一个建制连，在干部团学员中组成一个连），第一次出击布利亚特匪军，去摸这个“老虎”的屁股。原来计划是，我们从北边直插敌人据点旗政府，南边由十六师一、二团配合，南北合击敌人。结果我军深入到猴头庙以南距伪旗政府只有十来华里处，因与南边部队没有联系上，而返到猴头庙宿营，等候南边部队的消息。猴头庙距布利亚特旗政府也不过十五华里，看得一清二楚。晚上敌人在我军驻地周围打枪捣乱。第二天拂晓，派出一个班搜索敌人并占领大庙东北制高点。结果遭到埋伏敌人手榴弹的袭击，打死我副班长一人，打伤战马两匹，敌人集中火力向大庙院内射击，我军一时处于不利情况。为了保护大庙里我军的安全，必须拿下东北制高点。于是，我军一个排由连长塞峰同志直接带领，直冲东北制高点，我带了一个排在大庙背后敖包山上掩护。塞峰同志顺利地攻占了东北制高点，打退了敌人，并进行追击。我军占领制高点后，固守了一天，等待与南边部队会合。直到天黑也没有音信。我孤军深入，敌人已从三面进行包围。他们采取“麻雀战术”，三三五五小股匪徒，到处骚扰打枪。我军组织了两次冲击，均找不到其主力军，但每个山包上都有敌人，也闹不清有多少人。这样的消耗战不能再打下去。经过研究决定晚上撤退。我军一后撤，前后左右都有敌人乱打枪。我军有组织地顺利撤回贝子

庙南一百里地休息打间，第二天下午回到贝子庙。事后才知道，南边我军派出一个班与我们联系，由连指导员云成光同志带着，他们进入布利亚特旗境内，由于警惕性不高，在吃晚饭时，十二位同志被伪装做饭烧茶的几个布利亚特匪徒（其中还有女人）用手枪全部打死了。年轻的指导员云成光同志是乌兰夫同志的亲侄子，是从延安来的，这次也不幸牺牲了。所以，我们南北两路合击敌人的计划没有完成。敌人凭着地形熟，赶着马群和我们打仗。但他又不敢和我们正面接触。这一仗既没打赢也没打输，双方都有些损失。我军回到贝子庙固守阵地，但敌人也不敢去侵犯我们。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份，乌兰夫同志回到贝子庙，将我绥蒙大队改编为十六师三团，我任团长，黄波任政委，刘毅任副政委，李自勉任副团长。并命令我团除留一个加强排坚守贝子庙，其余部队由黄波政委、刘毅副政委带领，开到冀热辽地区经棚县（现克什克腾旗）驻防，扩军、整训、剿匪。我、李自勉同志还有团参谋白文玉同志和连指导员田炳权同志以及一个排的兵力保卫贝子庙，等待十六师一团一个连接防。在此期间，敌人又来扰乱，夜间到贝子庙附近打枪试探。我们兵力少只有固守，白天睡觉，晚上在贝子庙周围巡查，闹得也很紧张。一直等到一九四七年元月下旬，一团一个连才到达贝子庙。我和李自勉同志于一九四七年元月底，由贝子庙出发经过西乌珠穆沁旗插到林西县，在春节时赶到经棚县与团部会合。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又带领两个连在经棚县以南剿匪。五月份，乌兰夫同志通过冀热辽军区电令我团两天两夜赶到贝子庙。电报指出，国民党孙兰峰率领汽车几十辆由德王府进攻贝子庙，多伦一部分国民党骑兵和布利亚特匪军由南边配合。情况非常危急，而贝子庙绝不能丢失。

我接电令后，率领我团一个加强连、天山支队两个连共三百多人星夜急行军向贝子庙方向前进。走到克什克腾旗大王庙与进攻贝子庙的南路国民党骑兵遭遇。敌人有千余人，经过一上午激战，打退了敌人俘，虜几十个敌人，占领了大王庙。同时得知他们是来进攻贝子庙的。我军稍加休息，继续前进，第三天上午十时左右到达贝子庙。当时王铎同志走出贝子庙很远来迎接我们。大军来了，大家高兴极了。我军到达后，南路敌人已被我们打退，西路敌人也未敢行动。我军驻在贝子庙进行整训，待命打击敌人。

六月上旬，十六师一、二、三团会合了。冀热辽军区派出何农斌师长率领蒙汉联军骑兵师，还有个骑兵五团，向西出发，进攻敌人，西南边（察盟一带）有骑兵十一师向东压过来。我们十六师是由贝子庙出发，打正面战的，由北边向南进攻敌人。三面合围布利亚特匪军，拟全部歼灭。我团是十六师的先头部队。当时十六师是由师长李秀山、政委赵云驶、副政委刘景平、参谋长嘎瓦等领导指挥的。

整个这一战役是由冀热辽军区和内蒙古军区共同指挥的，以冀热辽军区为主。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战斗打响。我军步兵五团和布利亚特匪军主力在克什克腾旗西边沙坨里展开了激战，敌人用骆驼驮的大炮、重机枪，死守沙坨子，国民党飞机支援，阻滞我部队前进。此时我十六师从北边南下直插敌人心脏地带，我团首先与敌人接触。匪军护送家属和财产的绝大多数是女兵。战斗一打响，她们就赶着马群向南逃跑。他们的一部分家属（老人，病人，十二、三岁以下的小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多）以及勒勒车①上拉的金银财宝（白洋、元宝、衣物等）被我们截获、俘

① 勒勒车——一个牛拉的两个木轮的牛车。

虏。他们中有的小孩子长着黄头发、黄眼睛，颇有外国人模样。另外，他们的羊群、奶牛、勒勒车很多，拉着很长很大的队伍，行动缓慢。他们企图向多伦县国民党据点撤退。

第二次战斗是在蓝旗境内沙窝里打的。这一仗，我们把他们的绝大多数家属俘虏了。敌人集结了近五百多人的队伍，有三百多人和我军顽抗周旋，夜间袭击，白天干扰。主要对付我蒙汉联军骑兵师和八路军第五团。另二百多人掩护家属、牛羊群、车辆撤退。我们师是追击这部分人。国民党军曾派轰炸机几次轰炸，给布利亚特匪军空投食物、弹药，也有一部分土匪队伍支援。他们退到蓝旗沙坨里，在茂密的沙柳和树木掩盖下，化整为零和我军周旋。使我军白天找不到他们的主力，晚上多次受袭击。在这一带周旋了二十多天，闹得我们人困马乏，特别是人没有粮食吃，每天煮羊肉，又没有盐，人们都吃腻了。上级命令，必须彻底消灭布利亚特匪徒，不留后患。我们每天钻进沙柳林里寻找敌人，由于地形不熟，吃了不少亏，有的同志中冷枪而牺牲。二团行军中遭到敌人袭击。其实敌人只有几个人，而我军一个排展开包围，结果被几个敌人打死我军排长等十二人。这个仗实在难打，敌人用的是“麻雀战术”，三三五五一股，白天晚上不停顿地和我们周旋。那里又是纯牧区，没有多少房子，战士们一个多月就是露营、作战、放马，又没有粮食吃，有的汉族同志又不习惯天天吃羊肉。部队曾一度出现了急躁情绪。有的人说，要打就打，不打就走，整天在这里泡蘑菇，打消耗战，真不值得，发了不少牢骚。部队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队伍一面打仗，一面进行整顿。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消灭他们中最反动的上层分子，对绝大多数人不能采取消灭的办法，只要放下武器，都要按照俘虏政策对待。他们又是少数民族，我们既要消灭他们的反动武装力量，又

要争取他们的家属和一部分动摇不定的人到解放区安家落户。

同时，部队注意研究了敌人活动规律。蒙汉联军骑兵师和兄弟部队由东向西南方向压缩，我十六师由北边向南压缩，十一师等部队由西向东南压缩，包围圈越缩越小。蓝旗南边一部分布匪武装人员被歼灭。敌人有三百多人的主力军并赶有一群马逃到蓝旗和多伦县的边界地带顽抗。我十六师与蒙汉联军骑兵汇合后，拟继续追击敌人。就在此时，国民党的飞机向我们骑兵轰炸，一团一个连的马被打散了。我们部队一直追到闪电河以南，发现国民党军有几十辆汽车从多伦县来支援布利亚特匪军，我军即停止了追击。布利亚特匪徒三百多人赶了五百多匹马进到多伦县附近，从此布利亚特匪军从锡林郭勒草原上被赶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部队各回原地驻防。十六师师部给了我团一个任务：把俘虏和布利亚特家属连同他们的羊群、乘马、牛拉的苏式勒勒车以及用具、财物等，护送到海拉尔去安置落户。我团接受任务后即派部队送到指定地方，别的部队和地方政府护送到海拉尔南屯附近水草丰美的草原上，让他们安家落户了。后来叫鄂温克自治旗。

跑到多伦县那批顽固的布利亚特匪徒们赶上马群经过察北和原绥远地区到达阿拉善旗，与德王会合。后来，德王领上他们向外蒙古投降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

林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回忆片断

郭金榜

林西县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极重视这个地方，防范得十分严密。对蒙、汉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使这里的经济、文化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一九四五年冬，我军根据党的指示，开进昭盟地区，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土匪和敌伪等反动势力展开了一场极其复杂的斗争。现就我在林西县的亲身经历，作一些片断回忆。

一、向热北挺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日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加强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在此方针下，我党组织和派出了大批的革命武装部队、地方干部向东北包括热河进军。当时坚持在冀热辽抗战的李运昌部即奉命组织三支军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三个方向进发。我军到达热河后，组成了热河省人民政府，由李运昌同志任省长，

胡锡奎同志任省委书记，统一指挥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热南、热中地区相继解放，局势相对稳定。我部奉命挺进热北，扩大解放区，由王逸伦同志任司令员，统一领导军政，机关驻扎林西县。

当时热河省绝大部分地区经受日伪长期统治，汉奸、特务很多，且大多兼地主、土匪，残酷压迫剥削人民，他们勾结一起，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林西县也不例外，国民党派遣的特务、间谍，网罗了大批日伪潜伏下来的军警宪特，与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串通一气，组织武装维持会、治安队等等，霸占地盘，专与我军作对。敌人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实行暗杀和恐怖手段，威胁人民群众不许靠近我们。林西县以伪协和会会长黄允中为头子的汉奸势力，拼凑维持会，拉起了反共武装。维持会下设各科，俨然摆出了一付“县政府”的架势，和我们分庭抗礼。这个维持会，还设有专用的电台，与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直接呼号联络，接收指示命令，进行活动。与此同时，林西各地的恶霸、地痞，如奕相臣、于大头等也纷纷拉起各种名目的反动武装，鱼肉乡里，盘剥百姓，为所欲为。

我军进驻林西后，在王逸伦司令员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热北军分区，同时成立了林西县政府。苏雷同志任县长，卜冠英同志任秘书长，弓萍山同志任公安科长，还有高化民同志、郭凯同志、宋×同志等分别负责民政、民运，积极进行工作，打开局面。当时，我被抽调在公安科（后改为公安局）搞警卫和治安工作。任务是保卫人民政府和首长的安全。

二、站稳林西

在胡锡奎同志为首的热河省委领导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控诉、清算汉奸、特务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又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帮助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群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地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热河全省，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核心，建立了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使我党在热河站住了脚跟，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当时的林西是热河北部最大的城镇，地处交通要冲，从战略角度讲，确实是我军夺取热北的重要阵地。我军进驻林西，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转入地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上层暗里勾结，进行造谣、挑拨，袭击我党干部和基层政权，制造恐怖事端，进行破坏捣乱。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怀疑和恐慌。为了安定群众情绪，肃清匪特，清算汉奸、恶霸罪恶，为土改创造条件，遂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紧急课题。于是我们确定：在加强宣传工作的同时，要对反动派的猖狂活动来一个有力的反击。我们派工作队挨门挨户进行访问，通过摸底调查，基本上掌握了敌情。敌人的目的是要孤立我们，一步一步把我们赶出林西城。

在全县人民强烈要求下，我们确定了三个重点打击对象，第一个便是黄允中。此人曾任日伪协和会长，多年来，死心塌地投靠日寇，是林西的头号汉奸恶霸，双手沾满劳动群众的鲜血。我军开进林西后，他表面上很服贴，暗中却组织旧有人马加紧破坏活动。他见势不妙，自知法网难逃，不久便畏罪自杀了。

林西的第二个“大黑钉子”，名叫冯生合，曾任过伪满的青年勤劳俸仕大队长（为军事服务的修公路、工事的劳动组织），群众都叫他“大马棒”。这个家伙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政府批准，将冯执行枪决。接着，第三颗黑钉子韩仲三也被我们拔掉了。

对敌人的镇压，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震动。反动的维持会不解而散了，治安队的首领主动来找我们，愿意接受我军改编和领导。王逸伦司令员和苏雷县长亲自做了大量工作，对一些无罪或罪恶不大，又有工作能力，只是在伪机构里混饭吃的人，均予以录用，给他们以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许多人进步很快，真心实意地干起了革命工作。实践证明，党的统战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一九四六年春季，军分区的警卫部队已发展到近似营的规模；县警卫班也发展为一百多人的公安队。改编过来的治安队吸收了不少农民参加，部队成份起了变化，并扩大为三个连，编为县支队。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国民党军在千里之外的锦州、沈阳一带，自顾不暇，所以这里的上层顽固分子也不得不暂时屈服于我们，听从管辖。诸如奕相臣、于大头等小股武装均被我部改编、收编为地方支队或大队，类似这样的武装有十几股。

在发动群众打击伪顽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比较顺利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建立了基层政权和人民武装。

三、热水塘事件

一九四六年春天，地委和军分区，抽调了一些部队和干部到经棚（现在的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工作。不久，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热水塘事件。

经棚城东南有个热水塘，是区政府所在地。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以有温泉而享有盛名。在热水塘东南，有个大财主田明亮，霸地百顷，牛羊数千，雇佣很多长工、佃户。田明亮当乡长，亲

属又有在外做官的，因此，威慑乡里，横行霸道，俨然是一方的土皇帝。日寇投降后，他搞枪拉人，请来“师傅”，利用当地迷信，以保家防匪为名欺骗诱迫了几百名青壮年，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帮会——红枪会。

红枪会，供奉对象五花八门，从孙悟空到济公和尚等都信，讲究武功，冬夏赤臂舞枪弄刀，胡诌神灵保佑，刀枪不入。田明亮组织红枪会的目的是专门对准我红色政权的。

为了消除这伙匪患，并解救被骗上当的群众，有一天陆县长（陆棣同志）从林西专员公署开完会，在回县途中来到热水塘区政府，处理红枪会问题。因为区政府内部情况复杂，当即决定对区小队进行整编，把七、八条枪支由我们的干部和可靠同志掌握起来。另派人通知田明亮，一两日内到县政府接任新工作。因为，当初为了开辟工作，稳定局势，经县委决定曾任田明亮为区长。这次实际上是调离准备处理他，以分化瓦解其反动势力，同时进一步摸清红枪会情况。当即派出区委副书记宋国良等几名同志和战士前往侦察，在宋国良同志未及返回报告情况时，红枪会在反动地主、汉奸田明亮等操纵下，进行了突然袭击，包围了区政府。陆县长亲自带领同志们向外冲，拂晓前，终于冲出包围圈。在这次撤退的冲杀搏斗中，我们有几名干部和战士伤亡，其中陆县长和他的警卫员也负了重伤。

这件事发生后，我们的心情无比沉痛，也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群众。不少受田蒙蔽的群众说：“真怪，共产党手里有枪，不打咱们却冲天上开，他们不是咱们对头，共产党是好人！”事后，我们根据事实对红枪会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揭穿反动头子的欺骗手法和阴谋诡计，更深入广泛地开展了对穷苦劳动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政府根据田明亮发动武装叛乱和一贯的罪恶

表现，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决定对他逮捕法办，交群众清算斗争，并将其搜刮人民的财物没收分给群众。

在我们的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绝大多数会员退出了红枪会，极少数顽固者死的死、逃的逃，田家弟兄也逃之夭夭。田明亮这一股反动势力，终于垮台了。

一天，我们接到情报：田明亮骑一匹大白马，伪装商人，在林西西南面一带继续活动。我们立即投入紧张的追捕行动，不久，便将他捕获，并就地镇压了。

群众看到田的下场，又分到了土地、牲畜、粮食等物，无不拍手称快，喜形于色。到处欢呼，“翻身啦！共产党领导咱们翻身啦！”

四、东进——争取贺子章

贺子章是一个任过伪满官吏的蒙古族大牧主。日寇投降后，他搜罗伪兴安省骑兵近千人，基本上控制了大坂、林东、天山三个旗的大部地方。贺是行伍出身，饱经世故。在当时情势下，他脚踏两只船。对国民党残酷统治迫害少数民族是反对的，对国民党拉他反对共产党，他持保留态度，不肯乱来。但他慑于美蒋势力，又不敢公开与国民党弄僵，他把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藏在家里，一面殷勤款待，一面借我八路军大军压境向蒋介石讨要高价。同时为显示自己还有力量，又派军队经常侵袭我部，并扬言要把八路军挤到西拉沐伦河以南。

对待贺子章，我党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完全有可能把他争取到我们一边。对他来说，主要矛盾是民族问题，应力求政治解决，尽量避免武装冲突。

贺的子女比较进步，有正义感，有革命愿望。我们抓紧对贺的子女及其下级军官和士兵做思想工作。同时，欢迎蒙古族牧民来林西卖皮毛、燃料，买日用品，进行贸易活动，请他们亲眼目睹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作风，使他们对我党逐步树立信任感。我们还派蒙古族同志给贺做思想工作，诚恳地希望他与我们合作。但由于他家里住的国民党代表的挑唆、煽动，他拒绝与我们谈判。林西的四周，仍经常受贺部的骚扰，连冬不冷、新林的二个区政府也一度被贺占去，并抢我地方政府枪支，捆打区干部和积极分子，又占了我五十家子一带地方，进行破坏活动。看来对他光靠劝说不行，于是我军决定给他一个还击，制止他的破坏活动。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春节前夕，一个霜气浓重的黎明，我军以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五十家子。贺的部队慌成一团，他的士兵由于我军的工作而不愿与我作对，战斗迅速解决，贺的两个连四散溃逃，被我们俘获不少。接着，他被迫退出大阪。

这一还击，使贺子章慌了手脚。八路军大兵压境，贺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心向我军，他的队伍的士气也十分低落。在此情势下，贺的子女也抓紧作其父的工作。同时，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内蒙古人民的热烈拥护。一九四七年四月，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承德举行扩大会议，将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迫于形势，贺终于同意和我们谈判。我方委派苏雷同志为党政军代表赴林东，和贺子章进行了具体谈判。经几番周折，谈判达成协议。贺同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

贺子章终于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这件事，影响很大，不但把东三旗问题解决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巩固并扩大了解放区。贺子章本人也参加了建设伟大祖国和我们内蒙古自治的

光荣行列，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是贯彻执行我党英明正确的民族政策的结果。

五、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援助下，把几百万军队从大西南调到了东北、华北、华中等地，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扬言三个月消灭我军。向我热河北部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是全副美械装备的第十三军，军长是石觉，属蒋介石嫡系。七至九月，敌人沿锦（锦州）承（承德）一线西进，先后侵占我朝阳、平泉、建平和热河省会承德市之后，又向北犯，侵占宁城、赤峰，向西又侵占隆化、围场等县。十月，我军被迫反击，在赤峰、乌丹间羊肠子河桥头狠狠敲了敌人一顿。敌人经受这次痛击，加之天气骤冷，不得不停止侵犯。但是，敌人已侵占了不少地方，我热河省仅剩乌丹、林西、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和扎鲁特旗等七个旗县，东西南三面临敌。

由于形势恶化，我军大部留在敌后，和各分区、专署、县、区党政机关一起开展了游击战。军区及省机关除留精干的指挥机构外，包括程子华、李运昌、赵毅敏等领导同志都撤到了林西县。万马千军云集一县，林西顿时热闹起来。为了实施我军战略方针，上级党委及时作了部署安排，压缩机构，扩大战斗力量。我们公安局与省级各机构合并。经过整顿，队伍更精干了。程、赵等领导同志亲自向干部、战士作报告，讲明形势，号召巩固和保卫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匪军的进攻。

六、严峻考验

敌人被迫停止侵犯，改换方法，派遣大批特务土匪潜入我地

区搞策反，组织暴乱等破坏活动。原来表面上服从我军的反动分子如奕相臣、于大头等陆续叛变，被编为国民党“林西支队”、“经棚支队”、“警察队”……。

这些人的叛变并不奇怪，这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但是，想不到我县支队三连也发生了叛变事件。原来三连有个排长叫叶金生，是伪军出身，他带人叛乱时，打死指导员、排长等十多人，叛变后全连大部分当了土匪，后被国民党收编了。

这件事，对整个林西震动很大，各地土匪汉奸等又疯狂起来，妄图配合蒋军十三军扑灭革命斗争的火焰。针对这种严重局势，我军一方面迅速开展了剿匪斗争，一方面派立场坚定、斗争性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共产党员干部加强对基层部队和地方部队的领导，同时对部队进行整训教育，启发和提高战士阶级觉悟。我当时（一九四六年九月）被派去担任林西公安队指导员。我年轻，没工作经验，感到责任重大，但有上级正确领导指示，有同志们的支持和老同志帮助，通过工作，顺利解决了部队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团结稳定了公安队，受到了上级表扬。我们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七、在隐蔽战线上

特务、间谍在根据地策动多起叛变事件，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因此我党及时加强了对隐蔽战线上的斗争。首先加强了公安局的领导，担任林西县第一任公安局长的是弓萍山，第二任是王辉，以后热河省公安厅又派海波和刘志中同志任公安局长。这些同志都是多年来搞保卫工作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

一九四七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强大的人民军

队掌握了主动权，开始战略反攻。热河地区也进行了局部反攻，并迅速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地区。接着，军区、省政府开始南迁。

敌人的末日越临近，也就越发疯狂。国民党军的残渣余孽、间谍特务、恶霸土匪，猖狂地向我党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反革命报复，用暗杀、暴乱、伤害等残酷手段，大搞白色恐怖，如：有的地主勾引国民党残匪将农会主任杀害；有的基层干部突然被绑架失踪；有的在押反革命罪犯企图劫狱武装暴乱等，公安队也发生过一个连叛变。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周密侦察部署，我们迅速破获了以“菲菲小姐”为头子的特务集团。林西发生的几起较大破坏事件就是她一手策划指挥的。

时隔不久，我们又彻底破获一起“黑尤暴动”案，在雀家磨房等处将十几名劫狱后妄图杀害我党干部的罪犯，依法逮捕归案。

在局长刘志中同志的指挥下，我们机智灵活，迅速而果断地解决了威胁后方根据地安全的“三连事件”，捕获了反动头目，缴来全部枪支武器，彻底干净地消除了内部隐患，巩固和保卫了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并用铁掌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解决“三连事件”的经过是这样：一天，侦察员回来报告：“他们的队伍架上枪，跑步去后院上操了。”刘志中同志和我立即带领战士迅速跑到三连住处，先缴了守卫的门岗枪支，冲进大院，收缴了所有枪支。收缴武器后，我镇定地走到过道口，命令：“一排长，把队伍带过来！”当队伍带到前院时，他们才发现枪支已全部被我缴获。我们的几十名武装战士，手持三八枪，威风凛凛，我们干部手提二把盒子，大张机头，义正容严。在这种情况下，十几个反动头子只好耷拉脑袋，束手就擒。

经过多次的较量，反动派“钻进来，拉出去”的伎俩，一次又一次遭到可耻的失败。连乔装打扮，假意参军混进来刺探情报的三个家伙，都为我们识破捕获。

八、迎接全国解放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军民一起，胜利坚持了林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蒙汉各族人民度过了不平凡的岁月。这里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普遍地建立健全起来，掀起了生产热潮。人民群众彻底翻身，作了国家主人。

土地改革的完成，使根据地迅猛扩大，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的信心更加坚定，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母送子，妻送郎的热烈场面感人肺腑。仅仅在我当时亲自参加土改的四区，一下子便组建起了一个整连的部队。广大群众踊跃交纳爱国粮，出人，出牲畜，出车辆运送物资，支援前线，迎接全国解放。

一九四八年底，经上级部门批准，以热北地区所属旗县，成立昭乌达盟，正式划入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从此，各民族人民以崭新的面貌，雄壮的步伐向前迈进，为建设新中国、建设内蒙古自治区，贡献力量。

一九八〇年春 写于乌海市

郭北宸在狱中

李丕才

一九三六年我初中毕业以后，在“绥远新闻社”做记者工作。“七七”事变后，坚决走上了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斗争。一九三八年，由于党的宣传教育和进步朋友的影响，初步认识了“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和“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理以后，就积极参加了范长江组织和领导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等抗日进步团体和革命新闻机构。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发动皖南事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共高潮。“记学”被封闭，“国新社”被迫迁往香港。我在陕坝被中统特务机关扣捕。

那时，陕坝的特务机关，一个是“中国国民党绥远省调查统计室”（简称中统）。头子是张庆恩、陈国兴，爪牙有张忠一、殷劲戈、张立德、尹燕英、张乃卿等。主要在国统区从事特务工作，间或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绥远调查统计室”（简称军统）头子为史泓、马汉三、爪牙有赵瑾璧、张德敏、杜长城、王希天、武子肃等。主要潜入沦陷区从事特务工作，间或参与国统区特工活动。

中统设有“陕坝博爱巷五号”、“陕坝督察处”、“张维世圪旦”、“刘七柜”、“李长胡圪旦”和“马柜”等监狱多处。

军统设有“陕坝孝义巷×号”监狱一处。

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八月间，我在“刘七柜”监狱被监禁期间、郭北宸、陈元夫也被监禁在那里，他们俩虽然都是政治犯，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有天上地下的差别。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面前，郭北宸坚持真理，英勇斗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成为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

陈元夫则丧失立场，动摇叛变，腆颜事敌，为虎作伥，变成臭不堪闻的人间丑类！

郭北宸同志当年坚贞不屈，英勇对敌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现在就我记忆所及，写出郭北宸在狱中斗争的一些情况，供研究革命史料之参考。

在巴拉亥被捕

郭北宸又名郭俊卿，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山西省左云县驻马堡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时期喜爱读书，但因家境贫寒，半农半读地勉强念了一年初中，就不得不忍痛辍学，谋求职业，以维生计。

在太原兵工厂做了一年多学徒，后因裁员被解雇，便辗转流落归绥（今呼和浩特），考入傅作义创办的“绥远省乡村工作人员训练所”，毕业以后，被分配在兴和、归绥等县农村，从事乡村行政工作。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郭北宸坚决走上了民族解放战场，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战斗。一九三八年在绥西五原县参加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身。历任安北县地下县委书记，

绥西地下特委组织部长，绥西地下特委书记等职。以“国民兵政训处”处员、“安北县小学”教员、“临河县民众教育馆”干事等公开职务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开展抗日活动。

郭北宸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上靠党的领导，下靠群众支持，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选拔优秀青年，转送延安学习；迎接上级派来的干部，加强地下工作，坚决与敌人作斗争。党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这期间，绥西的形势也很好。北路军总司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推动和帮助下，执行了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那时共产党人受到欢迎，广大群众得到发动，抗日烽火燃遍绥西，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指挥了著名的五原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一次痛击。

可惜，这种大好局面，没有多久，就遭到了破坏。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四〇年后，接连掀起反共高潮，绥西的形势，随之渐趋恶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也转变了政治态度，开始实行反共、分裂、倒退的政策，军政干部中的共产党人被迫撤走，特务头子张庆恩等接踵到来，特务机关和监狱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广大群众的抗日活动受到了压制。生气勃勃的抗日的绥西，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特务机关，特别是以张庆恩为头子的中统，一到陕坝，便把枪口对准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张挞伐，必欲除之而后快。

身为绥西地下特委书记的郭北宸，鉴于风云突变，忧心忡忡。正当他根据上级指示，东奔西跑，部署工作，以适应新的斗

争形势之际，也正是被叛徒出卖，中统特务机关撒开人马到处侦捕他之时。一天早晨，郭北宸护送几个战友踏上去延安的征途以后，又折返临河县黄河南岸巴拉亥地方，准备再营救陷入重围的其他战友。正在他一面考虑营救战友脱险办法，一面动手修补已经脱帮的鞋子的时候，一伙特务突然破门而入把他扣捕了。这就是当时特务机关所谓的“巴拉亥案件”。

抗争与“审讯”

郭北宸被捕后，敌人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把他连夜解往陕北中统特务机关，妄图通过审讯郭北宸，得到中共绥西地下组织和活动的情况，实现其一网打尽的阴谋。

经过特务们一番忙碌准备之后，审讯，在中统特务机关展开了。

狡猾的敌人，象迎接客人似的先摆好了一桌丰盛酒席。郭北宸一看到这种场面，就知道敌人的险恶用心所在。便暗下决心，宁死不屈，要与敌人较量到底。敌人请他喝酒，他不喝，让他吃饭，他不吃。敌人碰了钉子，便恼羞成怒，叫他交待政治立场和组织活动问题。

郭北宸从容不迫，义正词严地说：“大敌当前，抗日为重，我之离乡背井，抛妇摒雏，千里迢迢，来到绥西，就是为了抗日，中华民族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和人民一道抗日，就是我的组织活动。”

敌人领来一个叛徒与郭北宸对质，他怒不可遏，痛斥了叛徒的可耻行径。决计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敌周旋。他仗义直言地说：“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一心为民族，一心救中国，何罪之有”？“国民党大私无公，进行投降，进行分裂，进行倒退，一心害民族，一心害中国，罪不容诛”！

他接着说：“今天应该受审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你们审讯我是不义的、非法的、可耻的，人民不会饶恕你们，历史不会饶恕你们”。

敌人气极败坏，便动用酷刑，妄图把他压服。而他则已下定决心，要以死抗争。敌人吊打、压杠、老虎凳、灌凉水，……几乎把他们所有的封建法西斯刑罚都使出来了。

在敌人灌凉水时，他反击说：“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一名战士被日寇俘虏”，说到这里特务当即制止。他说：“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要讲总得从头讲起嘛”。接着就说：“日本特务机关吊呀、打呀，妄图从他口中获取材料，消灭游击队，真是残忍已极。但象你们这样虐杀抗日人民，则未之闻也，你们真比日本特务还残暴哩”！气得敌人左一壶凉水，右一壶凉水，灌得更加凶狠了。他曾以闭气、吸气的办法，抗拒灌水，以求一死，果然未几就死过去了。不料几天以后，又苏醒过来。他就进行绝食，以图再死。敌人仍想从他口中弄到重要材料，所以深恐他立即死去，就一再劝他进食。后来端去一盘饺子让他吃，他想，肚子困得久了，肠胃功能弱了，饱餐一顿，极易撑死，于是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狡猾的敌人看出了他的意图，未及半饱，就把饺盘撤去了。

“人不畏死，何必以死惧之！”一场审讯与反审讯的斗争，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坚真不屈，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郭北宸的名字，象史诗一样在绥西原野传颂不已。

严拒“规劝”

以张庆恩为头子的中统特务机关，对郭北宸在采取上述所谓“过激”办法失败以后，又采取了所谓“规劝”的办法，妄图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

郭北宸以宁愿死、不投降的态度，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敌人先指派了两个叛徒，以所谓“难友”的名义，前往狱中“规劝”。郭北宸一见面就对他们说：“不用说就知道你们是干什么来了，你们是来当说客的吧”。接着说：“还是不要谈这个问题了，谈谈别的吧”。他说：“死，对于我来说，已经构不成威胁了，前些时我已死过两次了。人不畏死，何必以死惧之。让那些以死吓唬人们的‘人’，还是趁早把他收起来吧！”

接着，特务头子陈国兴（系特务头子张庆恩的助手，时任陕坝中统室主任。张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的身份在幕后策划）亲自出马，前往“刘七柜”监狱，“规劝”他叛变投降。陈匪深恐正面“规劝”会碰鼻子，便采取迂回的办法，假惺惺地说：“你的妻女尚在沦陷区苦居，将来我们帮着你把她们接来陕坝与你团聚，享受天伦之乐。”郭北宸回答说：“个人事小，民族事大，在沦陷区受苦受难的人成千上万，早就盼望去解救他们，只有奋起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否则，便没有个人出路。”陈匪一听话音，毫无希望，只好碰壁而归。

最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获悉中统特务机关对郭北宸使尽一切招数毫无成效之后，决定亲往“马柜”监狱作最后一次的“规劝”。郭北宸在此之前，曾致函

傅作义，提出愿在下列三项原则的基础上，支持傅抗日到底。即：绝不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不脱离共产党组织；为抗日做伙马夫在所不辞。他听说傅要去，便准备提出更加坚定明确的条件，与傅谈判，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一九四三年初夏的一天，傅作义由于软硬兼施，均无所获，便亲自出马，带领二十来名随从，骑着自行车，来到禁闭郭北宸同志的“马柜”，对郭北宸进行“规劝”。郭北宸严正向他提出三条：

一、共同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二、不能共同组织，就把我送回延安；

三、既不同意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又不送回延安，那就把我公开枪毙。

傅作义一看仍无转机，就丢下点钱走了。据说，后来傅作义不只一次地在他的高级干部当中宣称：“我一生碰到过两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是王若飞，一个是郭北宸。”言外之意也是“赞赏”不已。

敌人的“三十六计”都使尽了，也没有把郭北宸这个共产党人征服。他们做贼心虚，卑鄙无耻，不敢公开处决，害怕人民知道，激起群众义愤，便使用最恶毒的暗杀手段，残酷地杀害了郭北宸同志。他象千千万万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献出宝贵生命的共产党员一样，将永远为人民称颂和怀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作者 =

页数 = 2 2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